

思想政治課研究

学术顾问:

吴 锋 邱伟光 夏国乘

编委会主任: 齐卫平

主 编: 曹景文

(双月刊)

总第 249 期 6 月 15 日出版

目 次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理论探索及其历史贡献

刘宗灵 严 静(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三维向度

李 阎(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海外认知与话语建构

——以《纽约时报》相关报道为例

赵庆寺 吕伟松(27)

希腊、奥地利、瑞士、比利时的毛主义运动

嵯明亮(42)

·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及激发策略

郭芙蓉 袁 芳 魏 冉(52)

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批判及其防范化解策略

王亚南(63)

定向·定位·领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新思想的三重契合

曾 骊(72)

· 思政课教学 ·

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在教学中的实现路径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张 彬 张青卫(82)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探究

邢 亮(92)

思政课教学讲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的若干思考

胡涵锦(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亲和力研究

——以北京科技大学“纲要”课为例

张北根(111)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探析

李 建 刘羽曦(12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研究述评

刘 攀(1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机理研究

邵龙宝(143)

·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文献 ·

关于学习

陈 毅(157)

论延安时期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思想的 理论探索及其历史贡献

刘宗灵 严 静

【摘要】 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其严密的纪律、强大的内聚力、坚忍不拔的战斗意志展现出了组织形态上的极大优势,而革命时期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核心要素的民主集中制,堪称个中法宝。延安时期,刘少奇一直秉持着负责任的精神、勇于担当的态度,持续地思考与发表他对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科学内涵与基本实践方法的探索和主张。他的理论探索极大地充实与完善了作为党的根本组织路线的民主集中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体在延安时期日益走向成熟与坚韧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延安时期;刘少奇;民主集中制

【基金项目】 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ZYGX2018010FRJH)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A81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特聘)、博士生导师;严静,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成都 611731)。

民主集中制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核心要素,并成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在历史上与国民党中央、地方实力派、日本侵略军、汪伪政权等各种反动势力斗争角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其严密的纪律、强大的内聚力、坚忍不拔的战斗意志展现出了组织形态上的无穷威力。因此,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建设历程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是党的组织根本,党的

政治路线也必须通过组织路线才能付诸实践。“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很多党员简单数字的总和,它是全体党员按照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个规律,就是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此即为党的民主集中制。”^①数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实践也已证明,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对抗既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斗争,决定了其组织路线必须将民主制与集中制良好地结合起来,仅仅依靠单纯的民主制难以对抗资本与旧统治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在坎坷曲折的革命进程中通过不断地摸索、试错与调适,较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明确规定,如“四个服从”、党内选举制度、党内请示与报告制度、党内决策制度等等。^②这些组织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规范,有力地维护了党内秩序的平稳运行与党组织力量的健康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之一的刘少奇,则在延安时期对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撰写了《民主集中制未被正确实施》《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党规党法的报告》《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论党》等一系列文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不断得到完善,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促进了党组织在延安时期走向成熟与强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对刘少奇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进行探究,发挥其价值意蕴,对提高党内领导干部政治素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学说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要以前人或他人的思想成果作为形成的材料或理论依据,刘少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考也不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谱系,是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主要来源。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章程时就明确提出,同盟内各级委员和领导人一律由盟员选举产生,委员须对盟员负责;同盟内部所有成员在政治上一律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凡加入同盟的盟员应无条件服从组织通过的一切决议并严守组织的秘密,违者“即行开除”,等等。^③其中已鲜明体现出了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若干内涵。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中统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但由于当时的工人阶级政党处于初创时期,更需要集中统一,因此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研究文章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恩格斯的《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一文,“各国民主主义

者的团结并不排除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相互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④而对于党的集中问题则有较多的论述,例如,1859年5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道:“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⑤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3年4月—7月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写成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也提到:“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⑥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对团体纪律的重视。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和集中问题,但他们没有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1905年12月,列宁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并主张在党内贯彻民主集中制。此后,列宁在实践和理论上迅速发展着民主集中制概念。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进一步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1906年4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联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此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派提交给大会决议草案中所包含的“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基本原则,最终被正式写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大会结束后,列宁在一篇文件中写道:“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⑦自此以后,民主集中制逐渐在俄共(布)中得到贯彻实施。共产国际成立后,民主集中制也成为加入该组织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行的组织路线。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后,民主集中制随即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正式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点写入了第三次修正后的党章,“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⑧自此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基本原则。在此后的革命阶段中,党的建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不断遇到曲折坎坷,以及各种的问题。在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虽然不少地方组织甚至出现纪律涣散、塌台崩溃与部分党员干部叛党变节的现象,但中国共产党仍坚定地迈出了向兼具活力、创造力与铁的纪律的坚强堡垒逐步转变的步伐,作为党内根本组织路线的民主集中制也不断获得完善。尤其是在长达十余年的延安时期,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自身力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完善,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

核心之一的刘少奇,对此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二、延安时期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思想进行理论探索的主要方面

作为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与职业革命家,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如何增强党组织的纪律性、凝聚力,如何做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首位全面系统阐释民主集中制科学内涵与内在逻辑的理论家,同时又是长期指导工人运动、党组织建设、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的革命实干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刘少奇根据革命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深切体会与认知。

在大革命时期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虽然两湖地区的工会组织普遍建立了起来,但如何在其中建立起合理的权力架构,实现工会的良好运行,以将工人有序地动员凝聚起来,避免无政府状态,却也是一个现实的难题。刘少奇在深思熟虑后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在集中工会权力以利统一指挥调度的同时,还应该注意维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使工会机关不至于变成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专制机构。例如,在决议作出前,所有工会会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一旦统一决议做出,任何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样,就既充分容纳了群众不同的意见、发挥了工会内部的民主,又可以一致地与敌人作斗争。^⑨

土地革命时期,刘少奇负责指导白区工人运动与党务工作,对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有良好的把握。在参与处理顺直省委事件的过程中,他就深刻认识到了家长式作风与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为此,刘少奇发出号召,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全体党员干部方向一致,反对和肃清党内存在的缺乏政治原则的意气之争。对于以往领导干部缺乏勇气公开承认错误的现象,刘少奇提出领导干部应当为着革命的利益,不隐讳自身问题并且有必要公开自己和党的错误,为党员和群众作表率,使全体党员可以更好地认清问题。^⑩这当中已然体现出了刘少奇对党内民主与党内生活方式的一些个人思考。

长达十余年的延安时期是刘少奇在党建理论上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经验教训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产生了相当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中除了论及党的政治路线、工作路线等主题的文字之外,他还结合实际工作重点阐释了党内的组织路线问题,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颇具创新而又全面系统的论

述,其思想精髓与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方法论角度阐述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充分发扬民主作风

在全面抗战前夕主持华北地下党工作时撰写的《民主集中制未被正确实施》一文中,刘少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严苛的组织纪律并不是维护组织巩固与团结的唯一要素,尤其是在针对广大普通党员的纪律建设问题上,如只讲严厉惩戒而不讲民主作风,只会给党的肌体带来严重伤害。他认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无论是破坏民主原则抑或是破坏集中原则都属于违纪行为,领导干部不能光注重后者。他结合对当时自己负责指导的地下党实际工作状况的考察指出,北平地下党纪律讲得最多,但却没有讲好。毫无民主的状况在北平地下党组织中普遍存在,如此不但令党内同志都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也导致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习气在党内盛行,还由此发出了“为什么北平地下党纪律讲得最多,但官僚主义却越多”的疑问。刘少奇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者的工作态度,要讲民主,就不能完全依靠“惩办主义”去治党。党的领导机关最好慎重使用纪律这个武器,坚持政治上、原则上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纪律惩办的方法,而应当多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⑩为改变平津地下党组织内存在的离开纪律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现象,他强调,领导干部首先要努力从政治原则上去处理一切问题,如此情况下组织与纪律手段的采用才是正确的。纪律手段在党内虽然是必要并且有时还应加强,但不到最后必要的时候不可轻易采用。^⑪这些论述为华北领导干部转变工作方法 with 作风提供了重要指南。

那么,在面对党内意见分歧乃至纷争时,领导干部在具体手段方法上该用什么替代单一的纪律惩办呢?刘少奇态度鲜明地指出,说服、教育、讨论乃至辩论,才应该是党员干部解决党内分歧、维护党内秩序的主要方法。他反复强调,对于党内的一切纷争,不能只用党纪处分的方式去解决,否则党内同志间不会得到谅解、合作与互助,同志中的团结也就不能巩固。同时领导干部的态度也很重要。党内负责者尤其不能因居领袖地位而自高自大,另一方面普通党员也不能将党内负责者“神圣化”,不能因为他们有缺点,就将其全部打倒、推翻,要明白他们也需要其他同志的帮助。这两种倾向都是华北党内与民主思想相背离的官僚主义错误思想,应当坚决摒弃。一切问题只要在“政治上原则上取得一致。纪律与法律手段尽可完全不用。”^⑫

在刘少奇看来,要真正实现党内的巩固与团结,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发扬民主精神,消除党员“精神上不可逾越的鸿沟”,使普通党员同志感到自己和领导者是一样的,是完全平等

的。他在此反复阐述,民主是集成的基石,真正的集中需要切实的民主,倘若普通党员同志的意见和权利不为领导者所尊重,就无法集中全党的力量,无法使党团结成一个完整的主体去战斗。^⑭毛泽东同志在这点上也曾做过相当精妙的比喻和阐释。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谈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时指出:“党性即普遍性,个性即差别性,普遍性建筑在差别性上。凡是党员所做的工作,均应有党性,有个性。不能设想120万党员,变成120万块木头,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就应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造的人。”^⑮这样,便能使党性和个性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现融洽的统一。

当然,发扬党内民主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广大党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并不是要取消领导干部本该承担的工作责任,民主集中制和个人负责制相辅相成,党内重要问题应用民主的方式决定,在具体工作执行中由领导者个人负责。机关单位都应有具体的工作秩序和纪律,机关负责人必须承担督促与检查工作的责任。^⑯

总之,刘少奇对于如何运用党纪去解决党内的纠纷、领导者应如何有效开展党内的工作、如何营建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供了睿智务实的解决方案。他针对党内组织秩序建设问题的思考与针砭,对于刚经历十年白色恐怖,力量受到大大削弱的党组织来说,是及时且合适的,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智慧,也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光辉。

(二)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为了适应党的政治路线转变,使全党有力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时代使命,必须尽快改变因受“左”倾路线影响而导致的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的情况。毛泽东在1937年10月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了党的组织力量落后于政治影响的问题,强调了当下要“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更是“要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要着力“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⑰为了适应发展党组织的客观需要,中共中央遂于1938年春做出了相关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全国各地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努力打破关门主义倾向,这已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⑱该决议下达后,各地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人数已经从全面抗战爆发之际的4万余人迅猛发展到超过50万人,党的组织

从之前较为狭小的圈子里彻底走了出来。^{①9}在此过程中,全国大量追求救亡与进步事业的各阶层纷纷涌入党内,使党的组织肌体得到极大扩张,逐步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性政党。但与此同时,由于组织的迅速膨胀与各色人等、各种思潮的迅速涌入,如何有效保持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与活力,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组织建设,成为摆在党的领导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刘少奇为此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尤其是在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作出了许多充满睿智的论述。

党的集中制往往要通过党的纪律建设与制度建设来实现。刘少奇提出,加强党纪的目的不在于制裁同志,而在于加强同志服从纪律、服从组织的精神。被纪律制裁的同志并非愈多愈好,为党纪所制裁的同志愈多,说明党内纪律就越坏。^{②0}党的纪律与党内民主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铁的纪律并非表现在党组织内部意见的同一性,而是虽各有主张,但仍能自觉遵守和拥护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这是因为,纪律只是为了实现党内力量与意志的集中统一,并非是为了压制同志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权利。因此,在刘少奇看来,民主与集中是互生互成的一对概念,集中是民主的结果,民主是集成的基础,没有充分的民主,也就不能有充分的集中。

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通过制定党内法规不断地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与内涵,不断细化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制度设计。例如,他在为六届六中全会起草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等决议案中规定,党员对上级领导干部有意见时应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可向有关党委提出意见,不得随意宣扬,恶意诋毁他人。党员应严守党的秘密,未经上级机关允许,任何党员不得泄露党组织尚未决定发表的决议。此外,还对党内申诉与控告的程序、原则等进行了说明。这体现了集中与民主两个维度在党组织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同时,作为党规党纪核心的“四个服从”也在此时正式提出。^{②1}

此后,刘少奇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中相继发表十余篇重要文献,进一步论述了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在《论党》一文中,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的意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尤其对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做出了精到而富有学理的阐述,此处略述一二。

何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即党的权力由党员群众赋予,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党员群众中产生,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都应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如此,党在行使各项权力时才能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不是领导机构和负责人的个人专断,而是具有民意基

础,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同时,刘少奇第一次在全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明确提出作为党内秩序核心象征的“四个服从”。这在党的组织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何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刘少奇在文中进一步解释道,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政党。全党上下无不遵守着统一的党章和党内纪律条例,一切事项都有统一的领导机关领导。也就是说,党内的民主制,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绝不是无政府式的混乱状态。在这里,民主集中制下的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在将党建设成为巩固、团结、活泼的坚强堡垒的目标下,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在《论党》中刘少奇重点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反对民主的专制倾向和极端民主化这两种倾向。他认为专制主义与极端民主化倾向相伴而生,专制越严重,民主便形同虚设,党员对民主的呼声更为强烈,更加容易演化为极端的自由主义。专制导致了极端的自由主义这一恶果的出现。这可以说是整个报告中最为睿智的阐述之一。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中国是经历了几千年皇权专制的宗法社会,民主生活形式相当匮乏,反映到当时的党内情形上,一方面就是民主生活不够丰富,容易出现负责人的“一言堂”现象,另一方面一小部分党员干部又缺乏责任与纪律意识,言行散漫且轻易违反党纪党规。这些都说明了缺乏政治、思想训练的党员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认识是不够的。刘少奇在根本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充满辩证精神的解读,批评了上述两种妨害党内真正统一团结的趋向。最后号召,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又要在此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②《论党》运用求真、务实的态度以及唯物辩证的方法,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与逻辑阐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在党内无出其右者。

(三)有效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路径:批评和自我批评

实行民主集中制,除了有实现集中统一全党意志与力量的目标,还有充分发挥党员个体创造力、积极性的诉求。后者更多地需要使用民主的手段去激发。在毛泽东同志“将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的思想下,^③刘少奇认为要提高党员个体乃至全党的工作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他看来有效实现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着力点,便是在党内启发、动员党员同志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此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观念,进一步指出有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这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路径。在这里,刘少奇首次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实现路径构筑在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上,为党

的根本组织路线找到了有力的方法支撑,这可以说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又一创造性贡献。

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与更好的完善党的工作,也是为了有效提升所有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这既体现了中共党人对中国文化中“自省”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现实需要。^⑭刘少奇郑重指出,“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几千年专制主义下的中国缺少民主的传统,普通民众全然不知“民主”为何物,更谈不上民主训练。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以民主的精神来教育中国的广大群众,以改造社会土壤,即使在党内也有实行民主教育的必要。^⑮正是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优秀中共党人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常见行为,塑造成了全党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其成为有效实行党内民主与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路径。

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刘少奇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对自身缺点和工作错误进行批评并虚心听取党内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万不可逞一时之快冲动暴躁,或对批评者采取打击报复。任何抑制下级机关批评,对下级和党员同志意见和建议视而不见,不让他人发表意见和建议都是不对的,都“会得到坏的结果”。^⑯同时他还要求地方党政负责人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机制,以在高度扩大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党的领导与全党行动的集中统一。因为过往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已证明:在敢于积极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领导人影响下,当地的党员和人民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会积极开展,党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⑰因此,在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进程中,作为“关键少数”的各地领导干部应勇于担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激发各级党员群众工作的活力、创造力与积极性。

弥足珍贵的是,刘少奇反对党员群众盲目服从各级领导干部,提出培养普通党员群众在党的大政方针指导下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独立创造精神。为了实现正常与健康的党内生活,党员群众必须坚持不懈地践行民主集中制,而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运用,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刘少奇本人在华北、华中、苏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负责指导党政军工作时,常常虚心诚恳地与下级深入交流,向党员群众了解情况、学习经验,并不时进行自我批评,真正践行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知行合一”的基本要求。^⑱

三、延安时期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历史贡献

整个延安时期,刘少奇一直秉持着对党负责任的精神、忠诚担当的态度,持续地思考与表达他对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科学内涵与基本实践方法的探索和主张。无论是从政治原则上出发的说服、教育、讨论方法,还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体实现途径,抑或是民主与集中在同一目标之下的辩证统一关系,都极大地充实与完善了民主集中制,使得经历了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十多年腥风血雨洗礼的党组织,在延安时期不断地得到巩固与完善,并持续地走向了成熟与强大。

刘少奇富含智慧与辩证精神的诸多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在新时代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无论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还是实施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都可以以贯彻完善民主集中制为抓手来着力推进。没有党内民主,党的建设就缺乏生机活力;没有党内集中,党的建设就缺乏效率力度。民主集中制堪称是党的建设不断顺利推进,以及持续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头活水。刘少奇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高度重视,认为他们应当多用说服、教育、讨论乃至辩论等方式去管控党内分歧、维护党内秩序,慎用“惩办主义”的方法去压服不同意见,要努力团结党内绝大多数人,以使党的意志真正地得以贯彻下去。我们新时代党内的领导干部应当更具深厚宽和的民主作风,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效能与水平也应当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提升。近年来,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传承、发扬宝贵历史遗产的前提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发扬党内民主,“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为此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坚持和弘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维护党内民主,过好党内民主生活,做到一切按程序、守规矩。^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与弘扬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基础上,将“一把手带头遵守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时代增强党内领导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杜绝党内既存的少数领导干部权力专断、违背民主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党内民主集中制思想遗产秉持的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的原则,无疑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践行与进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最后,就今天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而言,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路线,更是处处体现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世界所拥有的制度优势。为此,我们更应该充

分汲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建工作上的智慧成果,继承与发展民主集中制这一宝贵历史遗产,把我们的党真正建设成为能领导全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坚强堡垒,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发展民主集中制能够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以推动党、国家与人民的伟大事业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参考文献】

- ① 郑惠等编.中国共产党通志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85.
- ② 廖盖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增订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86.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72.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23.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5.
- ⑦ 列宁.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A]/列宁.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3.
- ⑧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44.
- ⑨ 刘少奇.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1926年12月)[A]/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
-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7.
- ⑪⑬⑭ 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未被正确实施(1936年11月27日)[A]/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2-23,25,24-26.
- ⑫⑯⑰ 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1937年5月17日)[A]/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5-36,36,67.
- ⑱ 郭德宏,刘晶芳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444.
- ⑳ 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A]/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9-60.
- ㉑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6-467.
- ㉒ 李君如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33-135.
- ㉓ 刘少奇.党规党法的报告(1938年11月6日)[A]/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0.

- ②⑦ 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A]/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61,364.
- ②⑧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9.
- ②⑨ 何益忠.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J].中共党史研究,2018(01):64-77.
- ②⑩ 刘少奇.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941年11月3日)[A]/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61.
- ②⑪ 刘少奇.论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11月)[A]/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47-248.
- ②⑫ 金冲及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21-438.
- ②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5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三维向度

李 阁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建设,回答了人们在民族解放和发展的紧要关头关心的文化动向问题,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具体道路和基本方针。在价值向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品格;在真理向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实践向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文化主张,而且贯彻落实为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共产党集体文化自觉,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建设开辟了新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化品格

【基金项目】河北省博士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文化动因及建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CXZZBS2020014);唐山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改革开放视域下我国文化安全的境遇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8C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阁,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保定 071002);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山 063000)。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政党从中淬炼精神并以此推进民族发展进程的制胜密码。在近一个世纪的砥砺前行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波澜

壮阔的奋斗奇迹,凭借的是涵育在由党引领的、在不同时期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文化之中的内在精神力量。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13年历史,更是一部先进的文化建设的历史,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具体道路和基本方针。鉴于文化与政治及现实斗争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充分估计到文化建设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1939年《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必须积极参加各方面文化运动,并且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力争取得对各种文化团体与机关的影响,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①这就在实际上将这些文化团体纳入了党组织文化领导和建设体系架构之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的深谋远虑。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形塑中华民族文化品格、淬炼精神风范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文化自觉的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弊端的过程中,运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价值向度、真理向度和实践向度三个层面逐渐聚焦观点,逐渐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形塑其文化品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开辟了新路。

一、形塑“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价值向度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执政时期,开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行全面考量。首先明确要在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区分的意义上凸显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文化的形成以激活中华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为外在表征,以构筑文化统一战线为路径。

(一)确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时首先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明确新民主主义文化坚决主张民族解放和独立,另一方面是基于长久以来党的文化在面向上受到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的现实,必须在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较的意义上突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一是针对传统文化中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不自主状况,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形塑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性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注

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办识字组,办学校,提高工农群众文化水平。面对旧中国广大农村文盲众多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曾经在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和识字班,使工农群众开始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先后建立起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 30 余所学校,^②着力培养各方面干部和专门人才。这种以“普及到每个人”为目的的教育实践,在文化的最基础层面改变着“只有地主有文化”的状况,着力培育着农民自己的文化。

二是针对西方文化总是伴随侵掠、殖民和奴役被压迫民族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形塑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文化。1937 年 7 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里要求“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做到“合于国防的利益”,必须“禁止汉奸的宣传”。^③这样一个宣传的基本原则有利于构筑全国文化界的联合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了一套与敌寇的灭华传言针锋相对的抗日宣传工作方法,使得反敌伪宣传成为“整个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④这是“服务于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个总的政治目的”。^⑤摆脱西方文化奴役,独立自主塑造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一个重要侧面。

三是清晰定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品格。由《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阐释可以看出,新文化应该有更科学的形式和内容。在毛泽东看来,无论形式怎样新,也应该是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无论内容怎样新,也应该是为中国人所认同的。因此,这个新文化必然是“民族化”的。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来看,主要体现在延安时期文化建设更多寻求形式上的创新,在文化的精神气质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十分坚持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内容鲜有好感。

(二)构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阵线

伴随抗日战争的深入,当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转向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文化战线同样面临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⑥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起着更为特殊的重要作用。

第一,根据地新文化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纸刊物书籍发行工作,始终“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另一

方面,中国共产党时刻注意避免“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总是致力于“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尽可能使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党组织注重吸收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重视文化人群体。当时的延安,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文化各界人士济济一堂。1939年元旦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人出面接待的延安文艺界人士多达一百人。之后陆续到达延安的文艺界人士,人数则更多。在延安出现的文学社团、艺术院校和研究部门、文艺机关单位、文艺报社有大约一百二十个,^⑧充分显示文化统一战线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⑨毛泽东表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总是以积极态度团结知识分子,鼓励其创作有利于中华民族革命事业的作品。

中国共产党以极强的政治远见在延安建构了一条无产阶级文艺战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党形塑这条无产阶级文艺战线的经典范本。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也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⑪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工作者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问题,^⑫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制。^⑬继而,毛泽东鲜明指出判断文艺作品既有“艺术标准”,更有“政治标准”,并尤其强调政治标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⑭同时必须讲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最后,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⑮从而使得文艺实现大众化的问题。毛泽东要求艺术不但在创作时要“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⑯而且这些作品还要拿到群众中去,使那些由于经济、政治、地域、民族等各种原因分散了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着艺术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毛泽东认为这就是艺术的普及工作,在此基础上力争再提高。

第二,党组织深谋远虑,到国统区打通宣传渠道,凝聚发展文化的民族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有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建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重点工作是大力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能够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公开出版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听到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抗日声音,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勇于牺牲的革命风范,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产生极大共鸣。党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将这份在国统区出版并发行于全国的《新华日报》打造成一张切实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中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使其始终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利益呼吁,为抗战呐喊的声音”,^①与延安发行的另一份党报《解放日报》交相呼应,吸引了大量国统区的民众及知识分子关注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政治诉求。中共中央致力于在国民党区域的理论、政治、学校、社会、文学、艺术等各个文化部门推广和深入抗战文化,以使包括国民党政府军队、党部、学校、社会的广大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思想有个根本的变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以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地位也得以提高。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党中央就开始布局打通到上海的宣传渠道。毛泽东、周恩来发电报给中央并转时任新四军相关领导,指示“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②避免动作晚了吃亏。他们嘱咐华中地区时任华中新华社、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华中文协常委、作家钱杏邨,中共上海文委书记梅益尽快到上海办报,并指示包括日报在内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都是当前最需要的。^③对国统区宣传工作的布局,显示了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设中的深谋远虑。

在环境恶劣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通俗化,赋予其中国化的民族形式。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于欧洲,如果不进行民族化的通俗性解释和宣传,那么就难以在中国推广,就难以赢得劳动人民。只有使它具备了“中国民族的形式”,才能使其成为“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旗帜”。^④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塑造党的领袖形象,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与声望”,^⑤通过对孙中山、民主人士和革命人士的纪念,展现中国共产党坚守民族大义的气度与胸怀、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及存异求同的诚意,凭借在国统区的报刊媒体宣传民主爱国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实现大众化,这些在客观上印证和呼应了其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气韵。

二、形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真理向度

中国人的思想往往受封建迷信观念影响颇深,针对这个现实,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科学性”。为此,党特别强调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重要,并由此推动解放区的科技水平总体上提高,尤其在农业、工业、医学、军工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一)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科学文化

就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在品格的真理向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形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昭示着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体现在以教条主义还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这个问题上。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②又要认识到此时的文化“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③而是现实地承载“反帝反封建”的使命。

其一,针对以“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形塑无产阶级属性、反映历史趋势和人民利益的文化。文化既是对民众进行教化的手段,也是完善人类生存状态的目的。当中华民族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不单是选择了一条能使中华民族实现成长成熟的路径和手段,也是选择了中华民族的理想样态和未来。共产主义不仅仅是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也是文化理想。相比之空虚空洞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所追寻和塑造的这个文化是具有无产阶级属性的,反映历史趋势和人民利益的文化。为此,中国共产党加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专门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为着掌握“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④学习就是必经之途。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又从“领导工作”“改善工作”和“建设大党”的战略意义上来谈开展干部学习运动的意义。为了领导人数越来越多的党员,为了克服“本领恐慌”,^⑤为着建设一个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得用“挤”的办法克服“工作忙”的困难,用“钻”的办法克服“看不懂”的困难,就一定能够取得学习运动的胜利。

其二,针对有物质、无精神的西方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形塑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列宁在《共产主义》中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⑥将实事求是和价值关照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讲真理。将实事求是延伸至价值领域,必须充分考虑人的需要。党在意识形态引领过程中,恰恰是充分理解和考量了群众的诉求和需要,才能够“投其所好”,提出那么多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信服的政策措施,才能够引领群众跟着走,取得说服群众、凝聚群众的效果。

其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向度。文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由发生学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初始逻辑。党倡导和引领的文化建设必然遵循着这个初始逻辑。

辑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首先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现实任务服务。这与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初始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给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真理性面向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打造具有真理面向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以最具牺牲精神的形象构筑文化灵魂。文化目的是为着构筑共同信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马克思将个人发展的类型分为“有生命的个人”“偶然性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阶段,最清晰地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马克思这句话强调了人的生命的重要性。这令人思考为什么有些人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却可以义无反顾放弃最可宝贵的生命。能够超越生命的只有精神。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以最具牺牲精神的形象构筑起文化灵魂。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不仅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场军事较量,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比拼。文化成为抗战的重要武器,在动员民族抗战、凝聚民族力量、鼓舞人民斗志、树立抗战信心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抗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文化建设实践中绘就的绚丽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遭遇的严重困难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反而使其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独特的精神气韵。

“整风”运动净化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环境。1942年春天开始至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为主要任务,以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为目的的整风运动。这场整风运动,是全党进行了实事求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使党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而且愈加成熟。党风、学风、文风的澄澈清明优化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环境,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深入人心提供了条件。

三、形塑大众性的理论特质——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实践向度

1840年以来的历史表明,“一盘散沙”“同室操戈”是中国屡遭压迫和奴役的内在原因之一。历史昭示出谁能让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起来,谁就找到了振兴中国的道路,谁就能取得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资格。中国共产党要身先士卒、担此领导重任,就要给自己的主张在言论上树立一个权威地位,鼓动和宣传是最现实的手段。

(一)确立群众史观立场的大众文化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组织的根本区别，^⑳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以最无私的情怀，敢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共产党之所以勇于并敢于发动群众，在于其性质和宗旨的无产阶级彻底性和真实的人民性。

首先，针对传统文化脱离民众，只为升官发财做打算的精英化倾向，中国共产党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形塑大众文化。党明确反对特权者的文化，有计划地对普通民众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国民教育。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有计划地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使得新民主主义的国民教育得以普及。194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文化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㉑陕甘宁边区延续了党办报办刊的传统，《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以及一些地方报纸不同程度发挥了组织边区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并且成为边区工作“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㉒陕甘宁边区坚持办识字组，秧歌、春联、歌曲、年画等艺术接续推行，文化建设成就卓著。

其次，针对为资本服务、与人民利益有根本冲突的西方文化，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形塑真正属于老百姓的人民文化。动员群众靠党的每一个战士。早在1931年《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就指出，“红军战士不但是战斗员而且也是宣传员鼓动员”。^㉓按照中央对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凡红军所到的地方，都会随时随地对当地的民众做尽可能充分的宣传，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红军，解释这个队伍奋斗的目标等等。对农民来说，仅靠呼吁和号召不行，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因此，党组织帮助当地民众做斗争，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消灭当地的民团与地主，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让贫苦农民得到实惠。

最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不单在于强调文化本身的大众性，更在于提醒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都应该接近人民大众，反映绝大多数人利益和要求，彰显人民民主的性质，成为一种民主的文化。党的宣传工作，虽然首要前提在于党自身理论的正确以及党员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工作，但由于这是一项将人们完全陌生的主义和理念灌输给群众的过程，因此仅仅靠党组织和数量有限的党员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充分发动群众。“一切我们党与苏维埃的口号，我们的政策，必须是有大多数工农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这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目的”。^㉔

(二)敢于发动群众,深深依靠群众

文化的品格和人的品格一样,是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既然如此,就有政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塑造文化的必要,与此同时,主体塑造文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塑造主体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支新生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不断成长壮大,除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样的主体条件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即文化思想塑造的行动条件。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将中华民族进行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厚植在广大人民中,坚信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这条充分依靠人民、发动人民的抗战路线与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而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根本不同。

第一,采用最贴近群众实际的宣传手段。就编译工作来看,一方面理论译著不做过高要求,以编译共产主义 ABC 的书籍为度;另一方面党校教本及普遍适用的党员教育大纲如《革命常识》《党务常识》等比较全面。此外,还涉及编辑宣传鼓动的小册子以及各种纪念日宣传大纲汇录。就出版工作来看,1941年5月16日,在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这个报纸的使命就是“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③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完全一致的。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团结”起来,既是我们的武器,也是我们的口号。1944年,陕甘宁边区干部已经有了“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在边区这样人口稀少、地域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解放日报》已经承担起组织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的“组织者”的角色,受到干部和农民的欢迎。《边区群众报》的发行比《解放日报》更广,受众也更多。毛泽东将办报纸当作与开会一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除了报纸,广播、歌曲、报告会、座谈会、讲话和谈话等等都成为文化传播的最直接手段,在把中国共产党文化理念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和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革命运动的“支柱”。

第二,将宣传工作融入现实革命斗争实践。一方面是以“认字组”、战士剧团等多种文化组织以及诗歌、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群众性歌咏活动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大众化方式与革命任务相结合,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行动中号召群众、砥砺精神、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好的学习方式、传播方式在实际中起到了扩大文化宣传、激发斗志、募集经费等作用。以红军长征为例,这个充满艰险、九死一生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战略大转移起初并不为人所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英文写成并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知道了中

国共产党以及这个党的鲜明性格和主张。这本书由上海复社翻译成中文本《西行漫记》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中国西北部境内这支被国民党报刊宣传为“草莽”的共产党队伍的声势和特色。两本书的国内发行量均不小。文化宣传工作在实践上的深入,为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光辉的著作、抗争的歌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激昂的口号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精神武器,发挥着激励引领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

四、余 论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是其可称道的宝贵财富之一。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同时也是其文化思想的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成就,使得文化建设与政治纲领的实施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从历史逻辑来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简单延续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进行着批判性地继承;从理论的逻辑来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高度结合;从实践的逻辑来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更不是描摹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而是实事求是坚守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并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并且影响着世界。这个文化对“革命为了谁”作出了民族性价值向度的明确回答;不计个人得失,遇到困难不妥协,血雨腥风不退缩,以星火燎原的志气、展现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以无私的情怀,贯彻三大优良传统作风,践行与时俱进的大众化品格。中国共产党形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启了先进文化建设的宏大篇章。

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理论和实践,使其更坚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以其作为观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工具的信念,从而找到了解除民族文化危机,通达民族新文化的道路。此外,坚持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与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相统一,在正确处理古今中外文化关系过程中把握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实施积极的知识分子政策,既是中国共产党形塑新民主主义文化品格的经验,也对今天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时代先进文化建设富有巨大启迪。

【参考文献】

- ①⑦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1,487.
- ② 胡光宇.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8.
- ③⑥⑨⑩⑫⑬⑭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8,708,620,618,705,704,533.
- ④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63.
- ⑧ 陈晋.毛泽东文艺生涯(1893-197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11.
- ⑪⑬⑲⑳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0,123,110,112.
- ⑫⑬⑭⑮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849,866,851.
- ⑰ 刘兴旺.1938-1947年《新华日报》发展的历史考察[J].福建党史月刊,2017,(1):60-63.
- ⑱⑲ 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23.
- 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89.
- ㉒ 刘兴旺.《新华日报》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媒体形象塑造[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5):61-64.
- ㉓⑳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8,352.
- ㉔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 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 ㉖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9.
- ㉗㉘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4-215,220.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海外认知与话语建构

——以《纽约时报》相关报道为例

赵庆寺 吕伟松

【摘要】《纽约时报》作为西方媒体的代表,影响着世界信息的生产和流向,其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报道,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的呈现,进而影响世界对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实际认知。本文以《纽约时报》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为研究对象,梳理其话语内容,从意识形态、战略竞争、政治极化、作者群体、媒体运营五个维度,分析其话语特征。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有益启示。新时代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建设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推进媒体的新闻自律意识,主动与西方媒体保持沟通;拓展与省州、国会对话交流机制,增进中美民间认知;创新传播路径,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重视智库培植,实现智库媒体资源优化配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纽约时报;海外认知;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赵庆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伟松,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1620)。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备受海外主流媒体关注。从“黄祸”到“红色恐怖”,再从“中国崩溃”到“中国威

胁”,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执政形象也一直抢占舆论场“主角”。海外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报道研究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顾耀铭曾指出:“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成为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相互制约影响的重要方式,传媒作为这种渗透的一部分,起着关键作用。美国在世界舆论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国际事务的报道评论,影响着国际社会的认知。”^①自李希光教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公开发表后,海外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引起国内学者关注。

在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环境下,海外主流媒体,尤其是英文媒体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平台。《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创刊于1851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50家报纸之一”,^②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读者群。《纽约时报》倡导中高层文化与消费归属感是报纸核心之所在,这使得它能够在强调多元性和政治正确的时代,成为保守重镇;也奠定了它在突发新闻、国际局势与政治报道方面不可撼动的声誉。此外,《纽约时报》在美国还被称之为“精英报刊”;^③凭借其150多年来所秉持的严肃客观和权威信誉,它曾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并在读者群中享有很高的忠诚度,在国际舆论场的报道素材也是其享誉全球的重要因素。^④

目前学术界针对《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研究论著较少,但关于涉华报道研究论著已取得一定成果,对于研究的开展具有一定促进意义。郑州大学潘志高就《纽约时报》1993年至1998年期间,以“人权”“西藏”“台湾”“经济”等影响中美交往关系的重要议题进行量化分析,作者认为《纽约时报》均采用负面话语报道中国,认为需要创造条件让美国媒体记者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等路径,改善中美两国之间关系。^⑤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00—2003年期间《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报道及报道呈现的国家形象,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实际状况和传播策略进行研究。^⑥浙江大学程早霞在《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前〈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探析》一文中指出,在此期间内《纽约时报》的涉藏报道反映出美国的国家利益,且意识形态差异没有成为中美发展的阻力因素,得出结论:美国认同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⑦清华大学史安斌在文章《断裂的新闻框架》中,针对《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扶贫减贫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纽约时报》就中国“扶贫”和“人权”议题存在偏见,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迫在眉睫。^⑧华中科技大学徐明华在文章《西方媒介话语中中国形象的“变”与“不变”——以〈纽约时报〉十年涉华报道为例》中,作者以两次党代会(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跨度,认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形象建构:“变”在于

中国国际形象影响力的提升;“不变”之处在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⑨

总体上来看,学界针对《纽约时报》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报道开展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某一事件或某一时段的研究,考察时间选取相对久远。其次,研究角度大多从单一学科出发,跨学科领域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搜集《纽约时报》涉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报道,结合传播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知识,尝试分析《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报道,探究报道话语特征,并就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提出启示。

二、《纽约时报》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的话语内容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辉煌,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取得重大成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议题开始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

在文本选取过程中,笔者通过 Factiva 数据库,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中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为关键词,在《纽约时报》中检索,通过文本阅读筛选出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相关报道。经统计发现,《纽约时报》在此时间段内累计报道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议题合计 586 篇,所涉及主题多元丰富,主要集中在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和执政能力等四个方面的报道。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认知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报道是《纽约时报》关注的重要议题,其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报道和评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它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宣传领域与时俱进,通过利用创新政治宣传的方式,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例如,文章《中国政治宣传探索新花样:动画视频和说唱音乐》(Propaganda With a Millennial Twist Pops Up in China)对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正面肯定,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突破彩色海报印刷僵硬的老式宣传手法,采用新手段来提升共产党海外形象,可以帮助在全球“传播中国声音”(to help spread Chinese voices around the globe);但媒体作者在标题处使用“propaganda”(宣传)一词,却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⑩根据英文释义,Propaganda 指“宣传一种不公正的信息,主要用于影响听众和进一步制定议程,通常是通过有选择地陈述事实”(Propaganda is an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objective and is used primarily to influence an audience and further an agenda, often by

presenting facts selectively), 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宣传方式所取得的创新,体现了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明显的负面倾向性评论。其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式。《纽约时报》认为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体现和保障。例如,文章《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崇高地位比肩毛泽东》(China Enshrines ‘Xi Jinping Thought,’ Elevating Leader to Mao-Like Status)中评论:“习近平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这个目标有助于巩固军队建设、做好国内监管,更好发挥在国际事务中作用。”^⑩(Restoring China to Greatness is a central message of Mr.Xi’s philosophy. That goal already has guided Mr.Xi’s policies of building up the military, strengthening domestic controls and raising China’s profile in global affairs)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认知源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它们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取得的进步表示肯定。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评价

《纽约时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予认可和赞许,认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纽约时报》仍会以负面报道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困境挑战加以报道,借此强化渲染“中国威胁论”。其一,对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的报道。《纽约时报》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召开,多次刊文评析十九大会议的相关方针政策及其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前景。通过分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安全”(Security or Safety)一词的出现次数(共计 55 次,比 10 年前的报告多出两倍),得出“中国社会进入了比以往需要更加公平的法律制度和更清廉的政府形象的新阶段”的结论;同时被注意到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与污染和类似问题相关的“生态”(Environment)一词的次数也大大增加。文章《成为“大国”的雄心》(Rising Ambitions to Be a ‘Great Power’)中写道“冷战后中国‘韬光养晦’政策但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谦虚的中国也在随之改变”(Hide our strength and bide our time was the policy Deng Xiaoping laid down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t that modest has lifted as China has grown stronger and more vocal)。^⑪很明显,《纽约时报》在报道的过程中,采用一种刻板的思维模式看待发展中的中国,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政策措施。其二,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和外交等问题上的负面报道相对较多。例如,《纽约时报》曾发表题为《美菲巩固军事同盟,警惕中国在南海扩张》(As Duterte Courts China, U.S. Says Don’t Forget Your Old

Friend), 文章中使用“防止中国在南海的侵犯行为”^⑬ (Prevent Chinese aggres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等充满偏见的短语,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别国的威胁。文章《“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中国暴露军事野心》(China's 'Belt and Road' Plan in Pakistan Takes a Military Turn),把惠国惠民政策说成一种军事扩张。^⑭ 总体而言,《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表示赞扬,尤其随着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世界各国和众多媒体的关注和认可,但在中国内政外交等问题上,《纽约时报》依然持批评与质疑的态度。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评析

《纽约时报》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报道主要围绕共产党反腐运动、共产党思想建设、共产党组织建设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腐运动。腐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严厉惩治腐败问题取得的成果深受西方主流媒体好评。例如,文章《习近平宣布建立超级机构,应对三大风险》(China Unveils Super-agencies to Fight Pollution and Other Threats to Party Rule)中说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宣布建立新的超级机构来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新机构的设立对于共产党面临的三大潜在危险‘金融鲁莽’(financial recklessness)‘环境污染’(environmental pollution)‘官员腐败’(official corruption)具有重要作用。”^⑮ 另外,在文章《十九大开幕,习近平欲重塑中国政治》(As Party Gathers, Xi Jinping Displays a Firm Grip on Power)中指出:“自上任以来,采取了比之前领导人都要严格的反腐败措施,并领导了对二百多名副部及以上级别官员的调查”(Since he took office, Mr. Xi has removed officials for corruption and disloyalty more senior than previous leaders dared take on, and overseen investigations of more than 200 officials at the vice-minister level or higher)。^⑯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党的思想建设一直是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实现伟大复兴的思想旗帜,西方主流媒体赞誉这些思想让中国迅速发展,逐渐恢复其古代的光辉灿烂;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它们也将我们党的思想建设曲解为一种形式主义,一种“麻痹民众的政治宣传”。《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大学里的毛泽东思想课》(Mao101: Inside a Chinese Classroom Training the Communists of Tomorrow)中,用“mandated regime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⑰ (政府强制的意识形态教育课程之一)来描述这一门课程,并且认为这

门课的开设是“这些课程枯燥且没有意义，是用来麻痹民众的政治宣传”(the courses dull and irrelevant, numbing propaganda),用“ideology”带有贬义词性的词语表示意识形态,也充分反映出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的狭隘视野。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方面。《纽约时报》发文《习近平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之路》(How Xi Jinping Made His Power Grab: With Stealth, Speed and Guile),连续使用三个消极负面的形容词,“隐秘”(Stealth)、“迅速”(Speed)、“狡诈”(Guile),试图借此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机构选举、政策制定。^⑧《纽约时报》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China's Leader Says Party Must Control 'All Tasks', and Asian Markets Slump)文章标题使用“Must Control”一词来表达“强调党的领导”,显然是带有一种强制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把党的领导看作是一种对于被领导者的“控制”(control);其中使用“毫不掩饰地为自己的政策辩护”(an unabashed defense of his policies)、“作为报复”(apparent retaliation)等歪曲事实的词语和信息来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⑨笔者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发现,从“腐败问题”到“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纽约时报》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方面的关注较多。整体上《纽约时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表示一定的肯定,但怀疑和曲解等负面话语的报道仍然存在。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的评估

《纽约时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方面的报道中,肯定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进步,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文章《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Xi Jinping Reminds China's State Companies of Who's the Boss)中,赞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有企业取得的显著成绩,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政策制定,^⑩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正是因为坚持国有制的主体地位,党领导的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Party leadership and building the role of the party are the root and soul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ose state-owned companies—which dominate industries as disparate as bank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resources—command nearly 40 perc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asse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government's tight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纽约时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进行了正面积

极的报道。

根据上述《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和执政能力建设等角度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中国共产党报道话语、报道基调的中立性和客观性都有了明显改善,它们看到了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发展。但由于《纽约时报》站在西方的政治立场,体现的是西方价值中心论,它们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报道中的观点必然存在偏颇之处。

三、《纽约时报》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的话语特征分析

建构主义学者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观念既可以具有合作性质,也可以具有冲突性质。”^②观念在媒体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的话语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差异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建构作用。《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的话语建构,既受到中美意识形态结构性差异的影响,又是中美战略竞争动态性演化的结果。作为美国政治评论的重要平台,它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冲击。作为一家影响较大的主流媒体,出现的负面话语报道也与报纸作者群体偏见以及媒体自身运营策略息息相关。

(一)意识形态结构性差异、美国话语霸权下,中国特色话语力量薄弱

作为民族主义色彩极其强烈的国家,美国视自己的使命为“世界的灯塔”以及“领导世界维护人民和自由国家的权利”,^③将本国的价值观和理想看作是一种“普世价值”,长期将对华意识形态的输出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其中,美国白宫直接管辖的新闻署(USIA)在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运输过程中“功不可没”。美国新闻署通过编织和传播信息,推进各国对美国的政策、观点的理解,以此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诋毁美国的“敌人”,宣讲美国梦。^④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认为“权力是一种意志强加”,^⑤媒体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今天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美国政府已经把“反共产主义”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认为“需要全面地反击、遏制共产主义,并重申民主、自由的传统与原则,将共产主义遏制在始终只能防守的阶段”,^⑥对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普世价值”渗透。此外,麦卡锡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即罪恶”的固有思维仍影响着新闻媒体行业,美国政府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坐标进行国际舆论‘倒灌’,借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合法性进行攻击。”^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决

定谁是说话的主体以及如何来说。”²⁷国际上话语权源于国家实力,国际传播具有强烈政治色彩。虽然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但仍处于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

(二)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被美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小,“美国战略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焦虑,美国不仅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影响不断消退,也担心军事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更恐慌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受到冲击”。²⁸2017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也带有“警告色彩”,这份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该报告33次提到中国,并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²⁹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立森(Graham T.Allison)曾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来比喻当前中美两国面临的紧张局势。他指出中国的崛起造成了全球力量发生结构性变化,威胁到守成国美国,中美目前冲突丛生,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边缘,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³⁰中美两国竞争领域和深度的不断拓展,致使双方被媒体引入战略竞争的话语陷阱。《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主流媒体代表,借机制造出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负面舆论。

(三)美国政治极化,现代媒体介入政党政治,传媒成为政治的战场

“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在美国政治生态中表现明显,“西方社交网络提供了一个让人有机会传播政治极化主题的场所”。³¹随着媒体报道逐渐渗入到执政党领导中,政党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也显得“亲密化”,媒体和政党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媒体监督成为束缚政府官员和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有效手段,媒体也成为政党之间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媒介,政党也利用现代媒体来扩大自身的宣传影响效果。美国选举,上至总统选举,下至州议员选举,无不通过媒体拉近民众,媒体的报道也就和政府决策和施政息息相关。国际社会中的一切行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一个国家的媒体行业,也必然是为国家的发展而服务。光明日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薛福康谈及美国媒体时指出:“媒体称之为是美国的第四权力,它与三权分立的政权关系既合作又制衡,共同维护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³²《纽约时报》在美国影响深远,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其西方资本主义色彩浓厚,他们也常常为了“讨好”执政党的统治需要,而把中国政府一些方针政策“怪异化”。

(四)西方媒体群体对中国缺乏了解,报道主观色彩浓厚。

媒体特性论决定了它注定负面的天然倾向性,³³《纽约时报》文章信息主要源于驻华机构的记者、特约记者、时政评论人、教授专家、匿名信源及一些政客。鉴于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差异,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存在一定问题。首先,西方媒体群体对中国报道会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把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传播看成是一种“政治宣传”。其次,西方媒体群体缺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知识,作者群体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制定一些相关政策规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因素,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和固有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导致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的文章出现主观色彩浓厚,存在误导性和偏见性情况。再次,美国主流媒体为了满足各界人士的需要,在报道时力求做到“多元化”,忽略信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较少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等正面新闻的专题报道,也很少直接向中国政府或有关部门搜集资料书籍或者亲自调研考察,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以试图达到抹黑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目的。

(五)媒体商品化运营特点,过分独立性和言论自由

美国媒体属于财团且大部分新闻媒体都是私有企业,这使得美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堪称财团话语权的延伸,这些美国媒体不仅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享有独立性和言论自由。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指出:“有争议的的新闻的确有助于提高报纸销量,同样,那些不引起争议的报道很快被人们遗忘。媒体是商业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必须忠实地报道新闻,但是编辑们要把新闻编辑成读者爱看的报纸,发行商要把报纸卖出去。”³⁴发行销售量全美排名第三的《纽约时报》常常为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从而在进行新闻报道选择和撰写过程中,从利益角度出发,只考虑文章“热度”,“标新立异”而忽略文章报道的真实客观性。除此之外,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Amendment I)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以下事例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³⁵这成为媒体存活发展的一张护身符和挡箭牌,给予它们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所谓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因此,《纽约时报》在文章标题拟定及文章内容报道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出现脱离“中立性”的行为,为获取更多的新闻阅读量和利益,再加之宪法给予的“法律保护”,也必然会使得它们在报道过程中,以独特视角和夸张话语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行报道。

四、《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 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启示

国际形象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自我设定的一厢情愿,也取决于外部世界的互动认知,是构建主体与目标群体密切互动、相互构建的结果。从表面来看,国际形象是在国际舆论环境下的海外认知与评价,然而究其实质,国际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的塑造与传播。要把中国共产党执政优势转为话语优势,完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不断推进媒体的新闻自律意识,主动与西方媒体保持交流;拓展与省州、国会对话交流机制,增加中美民间共识;创新传播路径,增强跨文化能力;重视智库培植,实现智库媒体资源优化配置等多个维度,做好我国对外宣传工作。

(一)完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既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⑥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升国际话语权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为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话语体系,对于实现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创造性文化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传统文化创新话语也是千载难逢的时代际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素养,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要在话语自信的基础上做好话语创新,讲好“中国故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却易陷入西方语境之下,这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巨大挑战,中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美国主流媒体时常用西方话语框架内的“民主国家”“专制国家”来衡量中国,我们需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框架,既要解构“西方话语”,又要建构“中国话语”,提升中国特色话语自信,用中国话语把中国故事说清楚。

(二)推进媒体的新闻自律意识,主动与西方媒体保持沟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指出“新闻自律是对话语权的保护”,^⑦他认为新闻自律不光是媒介从业人员内化于心的一套行为准则,更是新闻界内部对自身职业的一种行为约束。《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都来自美国主要的

政治研究人员、大学教授、时政评论员和驻华记者,他们大多数都有着很高的学历背景和新闻编辑经验,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报道文章的撰写,信息不论真实与否,报道立场不论客观中立与否,都会给媒体群众带来深刻印象。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掌握理论技能的专业队伍,让他们成为《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文章撰写者,更要做好媒体队伍的“入门教育”和“继续教育”。对于中西方媒体队伍编辑过程中出现的思维差异,也要注意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相关编辑和学者的沟通,对媒体队伍进行全方位的教育,以积极合作的方式主动接触媒体,理解满足海外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正当工作需要,尽可能为海外主流媒体提供更多参观采访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新闻报道编辑中,实事求是、客观中立,形成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正确价值引导。同时,对于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负面报道,我们也要做到“不失语”“不失态”,在国际社会上合理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纠正那些“不符实情,颠倒黑白”的言论,加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并将其有效传播。做好海外媒体新闻记者的权益保障工作也是主动与美国媒体交往的重要途径。目前对于海外媒体记者来华报道相应的细则规定尚不明确,相关部门也还未做好针对海外媒体记者来华采访的机制方案。因此,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基础的同时,我们还要以真诚友好的态度来展示中国形象,从而相信我们会有更大的可能性以获得公正客观的报道。

(三)拓展与省州、国会对话交流机制,增进中美民间认知

随着中美商业往来的增加,中国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第三大市场。尽管存在贸易摩擦和关税,中国在2018年仍是美国商品出口的最大市场。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增加了72%,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⑧中国要积极与美国各州开展经贸合作,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经贸合作促进两国的交流融合。中国与美国各州的关系十分重要,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融洽,也有利于助力解决彼此间的共同难题,如气候变化、消灭贫困等。同时,要积极加强与美国国会之间的交流。比如建立国际律师团队,通过律师团队之间的合作交流,可以把中美之间的现实问题通过律师团队,提交美国司法部,两方共同找到一个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案。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拓展更多合作领域,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交流机制,增进中美民间共识,巩固中美两国和谐发展的社会基础。

(四)创新传播路径,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

我们正处在智媒时代,媒介理论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出“媒介即信

息”,^⑨但媒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日常现象罗列,人们开始依赖媒体,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所言,“媒体变成了人们情感诉求、价值传递和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⑩现代传媒通过对事实有选择性地传达,达到舆论的效果。因此,要科学利用传媒来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由于中西方在思维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在对外传播,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阻力。文化差异和冲突必然存在,文化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有效性。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要想突破冲突就需要相互认同,要放大相似点,缩小分歧点,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近目标文化和目标受众,在跨文化交流之间,找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实现其精准传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关于话题议题的设置,针对不同的群体,分散传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报道,议题内容不局限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也可以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帮助海外群体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高中国和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同时也要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在传播领域的作用,做好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从而塑造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

(五)重视智库培植,实现智库媒体资源配置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通常扮演着影响决策和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角色。智库与媒体在引导舆论、营造决策氛围方面具有共通性。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8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显示,美国在全球5743家智库中拥有1871家,在智库数量排名前十国家中,美国智库数量比其他九国数量总和都要多,堪称“智库大国”;相比之下,中国拥有568家智库,位列第三,但不论是数量还是智库建设来看,中国都不及美国。^⑪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充分肯定智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重视智库培植不容小觑。智库与媒体把握时机,资源融合是彼此良性互动的基础。媒体作为智库的对外联系窗口,二者间互动性体现在,智库需要媒体为决策者和受众方宣传其最新研究成果搭建平台,提供分析和数据,以此来丰富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增强舆论引导效果;媒体需要借助智库的专业知识对时事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此外,积极开展研讨会、圆桌会议等论坛活动,也是加深智库媒体之间的融合互动的有效渠道。

五、结 语

从近十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数据来看,《纽约时报》分别就中国

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的评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评析等角度进行报道,虽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但它们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党,质疑和曲解的负面话语报道仍然存在。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的话语建构,既受到中美意识形态结构性差异的影响,又是中美战略竞争动态性演化的结果。作为美国政治评论的重要平台,它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冲击。作为一家影响较大的主流媒体,出现的负面话语报道也与作者群体的偏见以及媒体自身运营策略息息相关。这些报道的负面话语会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塑造良好的执政形象带来一定阻力。

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洞悉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海外认知,通过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主动与美国媒体交往,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拓展与省州、国会对话交流机制,增进中美民间共识;创新传播路径,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重视智库培植,实现智库媒体资源优化配置,对提升我国对外宣传工作质量,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 ① 顾耀铭.我看美国媒体[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
- ② John C.Merrill and Harold A.Fisher.The World's Great Dailies:Profile of Fifty Newspapers,New York:Hastings House Publisher,1980,p.138.
- ③ Abbas Malek.News Media and Foreign Relations: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New Jerse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7,p.227.
- ④ 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201.
- ⑤ 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 ⑥ 刘继南.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 ⑦ 程早霞.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前《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探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115-123.
- ⑧ 史安斌.断裂的新闻框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与“人权”议题的双重话语[J],新闻大学,2019(05):1-12.
- ⑨ 徐明华.西方媒介话语中中国形象的“变”与“不变”——以《纽约时报》十年涉华报道为例[J],现代传播,2016(12):56-61.
- ⑩ Propaganda with a Millennial Twist Pops Up in China[N].The New York Times.Jan.3,2017.

- ⑪ China Enshrines. 'Xi Jinping Thought,' Elevating Leader to Mao-Like Status[N].The New York Times.Oct.25,2017.
- ⑫ Environment,Security,Power:What China's Changing Vocabulary Reveals About Its Future [N].The New York Times.Oct. 20,2017.
- ⑬ As Duterte Courts China,U.S.Says Don't forget Your Old Friend[N].The New York Times.Jul.17,2019.
- ⑭ China's Belt and Road'Plan in Pakistan Takes a Military Turn[N].The New York Times.Dec.20,2018.
- ⑮ China Unveils Super-agencies to Fight Pollution and Other Threats to Party Rule[N].The New York Times.Mar.14,2018.
- ⑯ As Party Gathers,Xi Jinping Displays a Firm Grip on Power[N].The New York Times.Oct.18,2017.
- ⑰ Mao101: Inside a Chinese Classroom Training the Communists of Tomorrow[N].The New York Times.Jun.29,2018.
- ⑱ How Xi Jinping Made His Power Grab:with Stealth,Speed and Guile[N].The New York Times.Mar.8,2018.
- ⑲ China's Leader Says Party Must Control 'All Tasks',and Asian Markets Slump[N].The New York Times.Dec.19,2018.
- ⑳ Xi Jinping Reminds China's State Companies of Who's the Boss[N].The New York Times.Oct.14,2016.
- ㉑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 ㉒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2.
- ㉓ Nicholas J.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㉔ Max Weber,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82.
- ㉕ Andrew J.Rotter, The 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to Southeast Asia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 ㉖ 金家新.美国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与策略[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2):90—105.
- ㉗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4—56.
- ㉘ 赵庆寺.“新冷战”话语的演化逻辑与应对策略[J].学术前沿,2018(11):28—39.
- ㉙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㉚ Graham T.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M].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First Edition(May 30,2017)
- ㉛ 全燕.西方社交网络的政治极化与算法传播的角色反思[J].社会科学,2018(10):183—191.
- ㉜ 薛福康.既合作,又制衡,共同维护政治制度[M]// 顾耀铭.我看美国媒体,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
- ㉝ 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 ③④ 肖欣欣.世纪末的一场对话——中美主流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座谈纪要[J].国际新闻界,2001(01):5—12.
- ③⑤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EB/OL].<https://constitutioncenter.org/media/files/constitution.pdf>
- ③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 ③⑦ 张国庆.媒体话语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01.
- ③⑧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19 State Exports Report [EB/OL].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2019_state_export_report_0.pdf
- ③⑨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Reprint,1994.
- ④⑩ Todd Gitlin,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Oakland,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
- ④⑪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https://i.aliresearch.com/img/20190201/20190201163616.pdf>

希腊、奥地利、瑞士、比利时的毛主义运动*

嵯明亮 摘译

【摘要】20世纪60-70年代,受国际诸多因素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和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运动”,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毛主义政党,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在国内政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这段历史虽不经常被人所提及,但却是一种历史事实。虽然总体上欧洲各国毛主义运动持续的历史时间较短,且各党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梳理毛主义运动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具体脉络,是我们今天思考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我们纪念和缅怀毛泽东这一历史伟人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毛主义;希腊;奥地利;瑞士;比利时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嵯明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一、希腊

希腊的毛主义运动产生于军事独裁时代,即通常被称为“上校政权”时期,这个政权的统

* 本文摘译自罗伯特 J. 亚历山大 (Robert J. Alexander) 所著《发达国家的毛主义》(Maoism in the Developed World, 2001)一书。本文主要介绍了希腊、奥地利、瑞士、比利时等四国毛主义运动的简要情况。摘译部分包括书中的第 97-101 页、第 55-57 页、第 159-161 页、第 59-63 页。

治开始于 1967 年的军事政变,最终于 1974 年被推翻。在此期间,在希腊至少成立了四个毛主义组织或政党。我们现在无法获知他们中的哪些组织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承认。与多数国家的情况相类似,希腊毛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内部分歧和分裂不断。但不管影响力度有多大,希腊毛主义者影响的主要群体是学生。

在军事独裁时期,采取亲苏联立场的希腊共产党(KKE)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党内分裂,结果产生了两个独立的政党,其中一个通常被称为“外部势力”。在整个军事独裁时期和随后的民主时期,两个政党各自独立开展运动。正如有些人所预料到的,这场分裂促进了希腊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义倾向的发展。

(一)希腊马列主义组织

希腊历史最久远的毛主义组织是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成立的“希腊马列主义组织(OMLE)”。莫里斯·古德布姆(Maurice Goldboom)在 1968 年指出,“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与官方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产生联系”。在随后的几年中,希腊马列主义组织的分裂又产生了另外两个组织。

1978 年,乔治·库苏拉斯(D. George Kousoulas)指出,“希腊马列主义组织经常批评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与华国锋站在一起,反对‘四人帮’”。希腊马列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斯蒂奥伊斯·曼努萨卡斯(Steois Manousakas),官方期刊是《莱科·德罗莫斯》(Laiko Dromos)。1981 年,乔治·库苏拉斯指出,“希腊马列主义组织于 1979 年分裂为多个组织,这场内讧一直持续到 1980 年”。

(二)希腊共产党(马列主义)

希腊共有两个组织使用“希腊共产党(马列主义)”或“KKEML”这一名称。其中稍早的一个组织成立于 1969 年,由希腊马列主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该组织于 1972 年 4 月召开第一届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我们必须明白,当前的斗争是真正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即由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所领导的全世界马列主义者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流的斗争……今天的修正主义者首先是新资产阶级,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捍卫者”。

在该组织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因此 KKE(马列主义)不可能在希腊出版任何公开的杂志。但是流亡海外的党员们出版了《人民之声》《复兴》以及《反抗》等杂志。

一大批希腊共产党(马列主义)党员遭到政府逮捕,他们连同其他两个共产党组织的成

员和其他政治犯被关押在莱罗斯岛(Leros)集中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期刊《国际评论》指出,在监狱中被捕的党员们被称为“复兴主义者”,由之前他们出版的《复兴》杂志而得名。《国际评论》杂志认为,“这群人士受到旧斯大林主义策略的束缚,没有兴趣去研究和讨论新形势,忠诚于新的‘麦加’城——北京”。

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希腊共产党(马列主义)开始公开出版月刊《红旗》(Kokkini Simaia),并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1974年11月,该党“合法地”召开了第一届党员大会。决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参加下一届议会选举”。关于该党是否真正在后独裁时期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提名了候选人,以及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不得而知。

这一支“希腊共产党(马列主义)”的领导人是萨科斯(Zachos),即使在毛泽东逝世后,该党依然坚持忠诚于中国政府。在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继任者时,该党还曾向中方表示祝贺。

另一支使用“希腊共产党(马列主义)”这一名称的组织成立于1976年11月,是从希腊马列主义组织分裂出来的一个政党。该党批判“三个世界”理论是修正主义,并在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后站在了阿方一边。

(三)希腊革命解放阵线

另外一支从希腊马列主义组织分裂出来而成立的毛主义党派是“希腊革命解放阵线(EEAM)”,成立于1973年春天。乔治·库苏拉斯指出,这一政党是由“反对希腊共产党机会主义路线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者组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导致1956年后希腊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退步”。他指出,该党领导人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并且认为苏联领导集体已经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希腊革命解放阵线”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学生,出版的杂志名称是Neoni Agones。根据有关报道,这一杂志由于“缺乏经费”而于1975年停刊。

在独裁统治结束后,“希腊革命解放阵线”开始开展公开活动。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该党在希腊极左翼谱系中仅仅成为一种次要的存在。

(四)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

独裁统治结束后产生最大影响力的希腊毛主义组织是“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EKKKE)。该党是由在东柏林地区读书的一群希腊学生于1970年建立的。1974年,该党在主席克里斯托斯·比斯蒂斯(Christos Bistis)的领导下开始在希腊国内开展活动。到1975年时,该党已经被认为是希腊定位最为清晰、力量最大的“极左翼”组织。根据有关报道,该党“有着毛主义的政治倾向,致力于成为希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党的中心”。到

1980年时,东德地区的共产党认为该党拥有500名成员,具备动员8000人的“潜在能力”。

“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群众基础是高校学生。在1975年的雅典和萨罗尼卡高校的选举中,该党分别获得16053中的630票和7227中的225票。

与其他的毛主义政党不同,该党参加了1977年的希腊议会选举。该党候选人获得总票数中的11657票,占总票数的0.23%。然而,乔治·库苏拉斯在随后的评论中指出,“无论是议会选举,还是市政选举,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都没有真正得到过选民的重视”。

“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在毛泽东去世后依然忠诚于中国共产党。该党支持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于1978年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得到中共一名政治局委员的接见。

乔治·库苏拉斯在1981年指出,“亲华的‘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当下正处于混乱的状态,于1980年发生严重分裂”。至于此次党的领导层分裂的原因或分裂的实质,我们没有更多的相关材料。

(五)其他毛主义组织

东德的德国统一工人党(SED)的资料中还提到了希腊的其他一些毛主义组织。其中一个“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该党成立于1976年11月,领导人是伊萨克·乔丹尼蒂斯(Isaac Jordanidis),他之前是希腊共产党组织成员、党内的反对派。该党的中央刊物是《人民道路》,拥护“三个世界”理论,1977年12月乔丹尼蒂斯率团出访北京,得到李先念的接见。乔治·库苏拉斯1987年曾评论该党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有限”。

东德人提到过的其他毛主义组织还有“无产阶级左翼团体”(成立于1975年)、“希腊布尔什维克”(成立于1973年)、“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运动”“希腊马列主义团体”(成立于1972年)以及“希腊政治移民马列主义组织”。

二、奥地利

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成立的奥地利共产党一直在本国左翼政治谱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大部分政治舞台被社会民主党人所牢牢占据。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控制奥地利的部分领土,奥地利的共产党人们开始享有一定的政治威望,并且获得了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但在二战后的历届选举中,其支持率从未超过5%。

随着1955年条约的签署和外国军队的撤离,奥地利共产党(KPO)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分裂——先是1956年由于苏联入侵匈牙利而导致的分裂。随后是其他各种形式的派系斗争

所导致的分裂,包括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导致该党的青年组织遭到镇压,并将该党最著名的领导人厄恩斯特·费歇尔(Ernst Fischer)开除出党。

奥地利共产党本身在国内政治影响力较小,而党的领导层中毛主义者的分裂是上述派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奥地利马列主义党

1963年,奥地利共产党中的亲华力量逐渐形成,随后这股力量的主要领导人被排挤出党。1966年5月,毛主义者建立了该国第一个毛主义政党——奥地利马列主义党(M-LPO)。首任总书记是弗朗茨·施特罗布尔(Franz Stroble),党员人数超过500人,出版杂志是《红旗》(Rote Fahne)。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奥地利马列主义党都忠诚于中国的反对派,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该党是否获得了中国方面的“特许”。丹尼斯·L·巴克(Dennis L. Bark)在1973年写道,“奥地利马列主义党相信奥地利共产党未能理解‘列宁主义和平相处政策的本质……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认同、遵循和捍卫的,也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等投降主义者和反革命主义者曾经错误运用并将继续错误运用的政策’”。

在亲华政策方面,该党支持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初访华。

在此期间,奥地利马列主义党也非常同情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权。1973年7月,弗朗茨·施特罗布尔应邀访问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马列主义党自身也难以摆脱分裂的危险。1968年,该党的部分成员退党,宣布成立“奥地利马列主义者革命工人联盟”。这一新成立的组织的主要活动似乎是出版了一本月刊,名字叫《为了人民的力量》(Für die Volksmacht)。

(二)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联盟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联盟”超越奥地利马列主义党,成为奥地利主要的毛主义组织。该党成立于1976年,出版日报《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和月报《共产党员》(Kommunist)。在中国的“四人帮”被打倒后,该党向中国共产党致信,对“四人帮”进行批判,并高度赞扬华国锋。

1978年1月,该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沃尔特·林德纳(Walter Lindner)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该党“将反对两大超级大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奥地利的行为”。1978年9月,该党与土耳其工农党签订联合声明,主张共同保卫柬埔寨

寨。他们在声明中指出，“受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煽动，柬埔寨正在遭受越南的攻击”。

1979年1月，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格拉茨、林茨、萨尔茨堡、茵斯布鲁克、克拉根福特等地组织了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示威行动，并在维也纳组织了一场群众集会，到苏联大使馆前游行抗议”。在随后的一年里，该党还组织了声援在奥外国工人尤其是沃拉伯格的土耳其工人的示威活动。

1980年，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联盟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分裂。中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林德纳会集召开了“国内代表特别会议”，参加者是来自维也纳、格拉茨、萨尔茨堡等地的代表。该会议通过的声明指出，“就在本次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出现分裂，中央委员会中的右翼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篡夺了党中央的关键部门。我们退出组织，与党内修正主义者和清算主义者划清界限，是保持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工人阶级革命党性质的唯一路径”。

然而，党内反对沃尔特·林德纳的力量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组织。他们于1980年3月8日发表声明，谴责林德纳集团是“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们也召开了自己的“首届国内代表特别大会”。

此后两个组织均保留着“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名称。但是弗雷德里克·C·恩格尔曼(Frederick C. Engelman)认为，反对沃尔特·林德纳的组织“似乎成功地维护了奥地利马列主义组织的合法性”。我们无从得知究竟两个组织中的哪一个获得了中国方面的支持，甚至连中方是否对奥地利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也不清楚。

三、瑞 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当该党以合法身份再次在瑞士政坛亮相时，已经改名为瑞士工人党。该党依然宣称忠诚于苏联共产党，尽管内部有些人士是亲华的。而且到1968年底，该党被认为“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深受内部理论争论的影响，这种争论产生的根源是中苏两国分歧”。该党在1968年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立场强硬。

1963年，瑞士工人党中一股亲华力量脱离组织，成立瑞士共产党(KPS)。至少在成立早期，该党主要局限于法语区城市比尔、沃韦和洛桑。虽然该党宣称有300名党员，但美国国务院认为“实际活动的党员可能只有几十人”。

虽然该党在总体上倾向于中国的立场，但在其活动的最初几年里，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

中方的立场和观点。1964年9月初,瑞士共产党的报纸《星火报》(L'Étincelle)发表的一篇文章质疑中国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文章指出,“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列宁一直讲我们决不能低估对手的实力……中国同志所主张的即使爆发核战争,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继续存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在1964年9月5—6日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瑞士共产党公开谴责南斯拉夫政府指出:“铁托的工人自治政府的经济学是一种奇怪国家的资本主义。”而且宣布美苏两国最近达成的协议是“卑劣的欺骗”。

瑞士共产党继续对中方立场持谨慎态度,并显然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持保留意见。1965年8月,《星火报》发文批判“亲华的立场、力量和知识分子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与此同时并没有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者”。

1975年,同样使用“瑞士共产党”的这个名称的另外一个政党成立了,该党是由源于“瑞士共产党(马列)”的一个组织和位于苏黎世的另外一个主张上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合并而成。这个“瑞士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哈拉德·弗里奇(Harald Fritschi),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是《红旗》,在苏黎世出版发行。

“瑞士共产党(马列)”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由一个脱离于最早的瑞士共产党的毛主义团体组成。他们先是创建了“瑞士共产主义者组织(马列)”,主要的活动基地是在洛桑州。1972年,“瑞士共产主义者组织(马列)”大会决定成立“瑞士共产党(马列)”,宣称该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大会宣布,成立“瑞士共产党(马列)”标志着“瑞士无产阶级为赢得权力,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该党出版月刊《十月》(Octubre)。1973年4月《十月》同时以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出版,主要是为了纪念斯大林。其中主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纪念斯大林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瑞士共产党(马列)与新成立的瑞士共产党争论不休,指责瑞士共产党是由“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寄生虫构成的”,而瑞士共产党反过来批判瑞士共产党(马列)是“无用的政治煽动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者”。

瑞士共产党(马列)于1977年12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了该党的第一部正式纲领。在大会接近尾声时,该党发布公报指出,党纲的通过“标志着党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地革命实际相结合和探索本国实现社会主义、建立红色瑞士等工作上所取得的成果”。公报

同时指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当前面对的主要任务……苏联和美国等两个超级大国是当前革命的主要敌人”。

瑞士的第三个毛主义团体成立于 1979 年，取名为“瑞士共产主义者组织(SKO)”，是由苏黎世、巴塞爾和法语区的一些地方性团体混合而成，党主席是尤格·斯托克林(Jurg Stocklin)。

毛泽东逝世后，上述三个毛主义政党均宣布支持中国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赞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其中瑞士共产党(马列)还曾于 1978 年 6 月率团访华。

埃里克·沃尔德曼(Eric Waldman)在 1987 年指出，“其他共产主义组织，例如瑞士马列主义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组织，在 1986 年都没有任何活动迹象”。

四、比利时

尽管欧洲的第一个毛主义政党在比利时成立，但在几任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毛主义政党从未发展成为比利时左翼政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革命力量。最初的毛主义政党主要集中在本国的法语区，很快就被激烈的派系斗争所困扰，分裂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小团体。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新的毛主义政党出现在比利时佛兰德语地区，但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官方承认。

(一)比利时共产党(马列)

比利时共产党(马列)是由比利时共产党(PCB)中的持不同政见成员于 1963 年在雅克·格里巴(Jacques Grippa)的领导下成立的。格里巴在比利时共产党里虽然居于次要位置，但他却是十分重要的人物。该党自成立后很快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被认为是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欧洲地区最大的、最重要的毛主义组织”。该党活动的核心区域是比利时法语区的博里纳奇煤矿区。

比利时共产党(马列)掌握着比利时——中国协会，并成立了一个青年团体——比利时共产党(马列)青年团。其出版的理论周刊《光明》(Clarte)不仅载有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世界其他地区毛主义政党的主要信息来源。

20 世纪 60 年代，比利时共产党(马列)广泛参与了反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斗争。而且参加了政府选举，1965 年该党共获得 23903 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 0.5%。

然而，该党很快遭遇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并于 1967 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叛党行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出版物《世界展望》(World Outlook)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称“去年 6

月,当大部分华隆人(Walloon)离开时,党内的格里巴集团遭遇了一场自我削弱的内部分裂,他们指责领导人格里巴盲目支持中国的刘少奇。10月,又爆发了另外一场党内争论。中央委员会的5名委员,包括前参议员、1921年比利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亨利·格里纽尔(Henri Glineur),通过了一份题为《向隐藏在党内的假革命分子的总司令部开火》的文件,开除了格里巴及其两位支持者。而党内忠诚于格里巴的残余力量又以牙还牙地将对方的支持者开除出党”。

很显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比利时毛主义者队伍的分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格里巴的反对者指责他在这一运动中支持反毛力量,而且还指出“早在几个月之前,格里巴的名字及比利时共产党(马列)等字眼已经从中国新华社的报道中消失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由于这场分裂,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似乎正处于滑落为一个小党派的危险边缘……格里巴派党员在比利时议会中没有自己的席位,在政坛上处于‘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况……格里巴派党员在意识形态上模仿中国的立场。这种好斗性对比利时选民没有什么吸引力,即使是在传统的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也是如此”。到1973年,同一消息来源评论说,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仅仅是“过去自己的一个影子”。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内部问题,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依然存在着,并继续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到了20世纪70年代,该党的领导人是第一书记费尔南多·列斐伏尔(Fernand Lefebvre)。

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于1977年1月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列斐伏尔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政治斗争,领导人民群众建立反对两大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其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发生的事情似乎并没影响该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度。列斐伏尔分别于1977年4月和1978年8月率团访华。

1978年12月,该党与另外一个小型毛主义团体,即“共产主义斗争”进行组织合并。但是合并后的新组织依然自称“比利时共产党(马列)”,机关刊物是《共产主义者》(La Voix Communiste),并且继续严格遵循中国的路线政策。这一点体现在该党谴责国内的另外一个毛主义组织——比利时工人党参加了1972年12月抗议美国在欧洲部署新的核导弹的示威活动。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到1978年时,比利时共产党(马列)约有成员“几百人”,“依然有效

地运行着自己的宣传机构”。而到了 1980 年时,据说该党“只有几十名党员”了。

(二)一切权力归工人——比利时工人党

比利时出现的第二个毛主义团体,也是比比利时共产党(马列)影响力更大的组织之一,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的学生抗议运动,它的名称就是“一切权力归工人”(AMADA)。该党是之前在鲁汶大学就读的佛兰德学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的。该党获得的主要支持来自佛兰德语区的工人,并在安特卫普的工人尤其是码头工人中建立了群众基础。该党公开出版两份周刊,一个是佛兰德语版的《一切权力归工人》(Alle Macht aan de Arbeiders),另一个是法语版的《工人大众》(Tout le Pouvenir aux Ouvriers)。

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不同,“一切权力归工人”参加议会选举。1977 年 4 月,该党获得 24000 张选票,占总数的 0.7%,而在 6 个月之后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的选票增至 45000 张,占总数的 0.8%。

鉴于在选票方面所取得的相对较好的政治成绩促使该党转变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党。1979 年 11 月,该党召开党代表大会,有 208 名代表参会。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和章程,文件共计 79 页,并包含 183 条内容。新政党被称为“比利时工人党”。

“比利时工人党”公开宣布其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民主权利,保持工人就业,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统治,实现佛兰德、布鲁塞尔、瓦隆等地所有工人阶级的大团结”。该党宣布,“反对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尤其是苏联最近主导的扩张主义行为”。

马腾斯(M.Martens)认为,该党的“意识形态”是“反对冒险主义和暴力行为,但是工人阶级必须用相同的暴力手段反对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行为。当所有其他的手段都无济于事时,只能毫不迟疑地采取暴力的手段”。

虽然 1978 年时“全部权力属于工人”被认为是一支“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组织”,但它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官方认可,即使到 1979 年该党的几位领导人访华之后,也同样如此。

(三)比利时其他的毛主义组织

德国统一工人党(SED)在 1977 年还提及比利时其他较小的几个毛主义组织。它们是“吕特共产党(马列)”,出版刊物是《吕特共产主义者》(Lutte Communiste);“比利时马列主义共产党联盟”,该党成立于 1974 年,在比利时法语区和布鲁塞尔都有支持者;“社会主义党”(Groupe Pour le Socialisme)。关于这几个组织,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

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及激发策略

郭芙蓉 袁 芳 魏 冉

【摘要】重要他人是指与个体的生命有交集,并能深入到个体生活中去而对其产生积极影响的人。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的角色行为还存在一些不足:对重要他人概念有了解,但对做重要他人的价值感体验不深;做重要他人的意愿较强,但实际行动不足,如师生间交往呈“弱关系”样态,给予学生的社会性支持还不多。教学任务较繁重、科研压力较大、考评机制不太合理等是影响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可从精准供给课堂教学、构建“我-你”型师生关系,发挥强关系的价值引领作用以及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价机制等方面激发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他人角色行为。

【关键词】重要他人;角色行为;高校思政课教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微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微传播机制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6YJC710009);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研究项目“人为什么需要道德——道德价值问题学理追问及实践教学优化”(项目编号:sztsjh2019-4-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郭芙蓉,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袁芳,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合肥 230009);魏冉,石家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石家庄 050035)。

随着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师”)这一职业群体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光明日报刊发教育部的权威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11月,我国高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的总人数已达“10万+”。^①这支被亲切地称为“引路人”的队伍,其重要他人的角色行为表现如何?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本文从重要他人的理论出发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他人角色行为进行调查。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问题的提出

“他人”是泛指除“我”之外的一切人,与“你”“我”面对面的语境相比,“他人”与主体“我”的距离稍远。“所谓重要他人,是指对个体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②研究表明,重要他人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学业成就、人际交往、自我概念发展、道德品质养成等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学者吴康宁在《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将重要他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互动型重要他人,指在日常生活中与个体有交往并能直接深入个体生活中,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第二种是偶像型重要他人,主要是基于个体喜爱、崇拜和尊敬心理而形成的,对个体的影响一般是间接的。本文主要是从互动型重要他人的角度来研究高校思政课教师。也就是说,在诸多“他人”中,思政课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他人是与学生的生命有一定的交集,并深入到其生活中而对其发生积极影响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及发展,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③相关职能部门也出台了很多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文件和政策。《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坚持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积极为这支队伍成长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④这些重要论述和改革举措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思政课教师的社会角色寄予厚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思政课教师要做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学界对重要他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教师这个重要他人角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一般集中在中小学学段。研究大学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的相对较少,且主要还是泛泛来谈大学生成长成才与周围诸多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大学生学习质量受到这些重要他人的影响,如“专业课教师提供学术支持,辅导员提供心理支持,成长导师提供成长经验,同辈群体可以相互激励和传递经验,家庭成员通过学习期待可以增强学生学习动力。”^⑤还有的学者认为“同辈群体、辅导员、专业课教师 and

父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均有显著影响。”^⑥专门研究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这一社会角色行为的成果较少。

二、研究方案设计与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高校思政课教师对做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角色的认知状况如何?第二,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的现状如何?第三,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的实现?

由此,将高校思政课教师这个群体本身对重要他人的角色认知、行为、影响因素三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其中角色认知主要考察高校思政课教师对重要他人概念的了解程度、对重要他人角色行为与职业价值感的关系的理解认识;角色行为主要考察师生间深度交往状况、教师支持性行为表现,这种支持性行为主要指向思想、学业、爱情、人际交往等问题;角色实现的影响因素主要考察代际差异、性别、科研压力、教师沟通能力等。见表1。

表 1: 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问题研究的测量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角色认知	概念本身了解程度
	作用及与职业价值感的关系
角色意愿	做重要他人的意愿
角色行为	师生深度交往状况
	支持性行为表现
影响因素	年龄代际差异、不同性别的情感表达差异、科研任务挤压、谈心能力不足、职业倦怠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高校思政课教师对重要他人这一角色的认知、意愿、行为表现及影响因素,同时以对学生端的30个结构性访谈为辅,印证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现状。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09份,回收问卷209份,回收率100%。调研对象中,男性占37.32%,女性占62.68%,教龄在10年以上的占66.02%,10年以下占33.98%。理工科院校教师占26.32%,文科院校的占31.58%,综合性院校的占34.5%。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对重要他人角色的认知、行为表现及影响因素

(一)对重要他人的概念有了解,但对它的价值感体验不深

做学生生命成长中的重要他人本应是教师这一职业的价值追求。在调研中发现,不同教龄、不同性别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对这一概念还是了解的。大约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表示对这一概念了解,占比 51.2%,但了解程度不一。在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发现,42.58%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对重要他人的角色价值感体验不深。然而这种价值感的体验是需要教师在重要他人这一角色行为的实践中才能获取的,因此,这也间接说明教师重要他人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在幼儿、小学和中学阶段,师生交往时间长,接触频繁,对彼此的了解深,信任度强,这些都有助于这一学段的教师重要他人角色的实现。而在大学阶段,由于大学生思维活跃、追求个性、情绪情感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教师的重要他人育人作用发挥有一定困难,这也会导致教师自我效能感不高。一些高校思政课教师就表示,与专业课教师相比,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匮乏”的是“没有自己的学生”。

(二)对做重要他人行为的意愿较强,但实际行动表现还不足

能否做重要他人关系到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有研究提出成为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他人的强烈的意识和渴望,会促使教师进行能力和素养的培养,促使教师对学生的成长发展有高度的责任感,抓住机会对学生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促使教师体会到自己的重要性。^⑦调研发现,高校思政课教师对于做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的情感期待强烈。有 86.6%的思政课教师明确表示“应该去做学生的重要他人”。刚入职一年多的思政课教师 HWJ 说:“选择教师这个行业,本身也是出于教书育人,引导学生成长的责任感,做思政课教师之后,更加期待能够通过成为重要他人来获得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学生对我们的认同,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工作认可,更是对思政课的认可,能成为学生的重要他人,给我带来与思政课一体的荣誉感。”

尽管高校思政课教师做重要他人的意愿较强,但是实际行动却还不足。依据互动型重要他人的概念与特征,本文采用师生间交往深度与社会性支持两个维度,来考察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的角色行为。

1.师生间交往呈“弱关系”样态

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提出弱关系这一概念,认为强关系表现为支

持的持续时间长,涉及情感程度深,彼此亲近、互惠程度高的一种关系样态,反之则是弱关系。弱关系有利于信息的扩散,强关系有助于价值观的引领。^⑧借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采用人际互动状况评判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实现程度。

在被问到“你如何评价你与学生们之间的人际距离状况?是远还是近?是一般朋友,还是联系较多的朋友,还是其他?”这些问题时候,绝大多数思政课教师认为自己与学生之间的人际距离较远。“好朋友”的回答占 13.4%，“一般朋友”占 33.97%，“熟悉但不亲密”占比 46.89%。但“完全是陌生人”占较少,仅为 5.74%。而在被问到“教学期完成后,会不会还有学生跟老师保持持续性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多数思政课老师表示,与学生持续性的联系比较少,仅与个别较为主动的学生还有联系。见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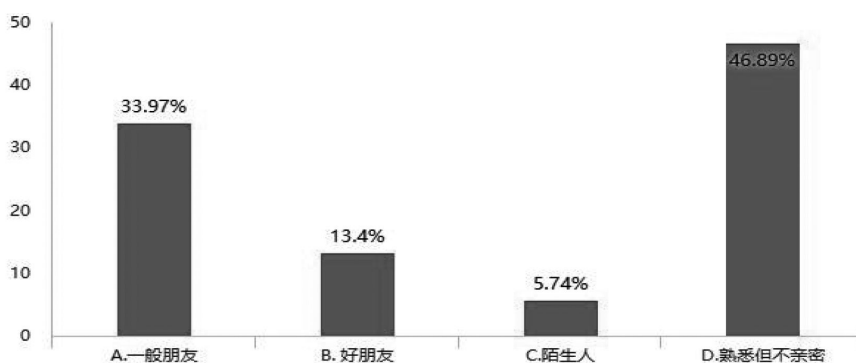


图 1:师生交往的亲密程度

2.教师给予学生的社会性支持还不多

在对教师的访谈中,多数人提到与学生交往中,会给予社会性支持,但仅限于主动寻求帮助的学生,而这部分学生的人数相对很少。

当被问:“除了课堂教学,您会经常主动有意识地走近学生的生活,了解并帮助他们解答价值观、学习、爱情、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困惑或是生活上的困难吗?”回答“偶尔几次”的占 35.89%、“不经常”的占 31.1%。见图 2。

在对大学生的访谈中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多数受访大学生表示在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价值困惑时,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去找思政课老师谈心解惑。究其原因,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专门去找思政课教师谈心,找父母就可以解决;有的人对思政课教师不太信任,认为即便去找思政课老师谈心,老师也不一定会顾及他的情绪反应;还有的人认为她(他)与思政课教师没有熟悉到可以像跟好朋友那样交心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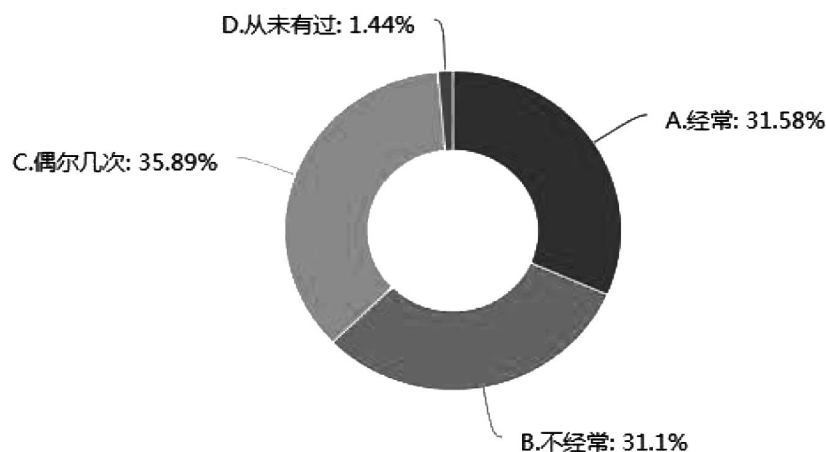


图 2: 思政课教师给予学生的社会性支持的情况

可见,从给予学生的社会性支持来看,高校思政课教师离重要他人的角色期待还有较大的距离。

(三)影响高校思政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的因素分析

做重要他人应是教师自觉的职业价值追求。调查中发现,影响高校思政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教师教学任务较繁重,与学生深度交往的精力受限。衡量重要他人重要指标之一是看其交往深度。思政课教师本身的科研任务繁重,大班制授课,学生人数相对较多,使得教师难以有多余的精力与学生深度交往。在问卷调查中,反映教学任务繁重的教师占 56.46%。有的教师就感慨:教学班挺多,有时候还要跨校区上课,难以再有精力去做学生的重要他人。

第二,考评机制重科研轻教学,且教学评价缺乏区分度。部分高校还是以科研中的课题和论文为主要职称晋升和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而针对思政课教师的教学业绩考核,大部分高校还是以同质化的教学工作量的完成程度考核教师的教学业绩。有的受访者认为“教学再好,也达不到学校要求的指标,年终照样扣钱。”这也导致教师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科研之中,而对于如何走进学生生活,切实做好重要他人投入的精力不足。

第三,代际差异影响思政课教师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前的教育对象都是刚刚成人的 00 后,发展心理学认为,自青春期开始,人生开始了第二次诞生,个体的人格独立和尊严诉求越来越强。随着心理成人和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会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遇到问题,往往更愿意选择向同辈群体倾诉。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趋于成熟和定型的阶段,00 后大学生有时也会表现出对权威话语的不信任,甚至拒斥。随着更多年轻的面

孔加入思政课教师队伍中,因代际差异导致融入困难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第四,部分大学生对于思政课的价值认知存在误判。调研中发现,与专业课的“职业”功能相比,部分学生对思政课的价值排序相对靠后。他们更愿意把精力用在专业课的学习上,认为这是他们踏入社会的“立身之术”。带有这种错误认知的学生对思政课和教师会有一定的疏离感。M-9:“我觉得专业课让我学到很多我很感兴趣的东西,思政课就是去辅导我们思想想法之类的,相比而言重要性不高。”

四、激发高校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的策略

(一)精准供给,增强思政课课堂教学主渠道的育人效果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指出,讲好思政课是思政课教师首要的岗位职责。讲好思政课,最重要的是站稳讲台,课堂教学是直面和影响学生思想实际的主渠道,也是教师发挥重要他人作用的主阵地。

00后的大学生群体尽管年龄、社会角色较同质,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差异。分类教学是精准供给有效的方式。其目的就是找寻学生的实际需求,因为“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只有与学生的需要和特点耦合了,才能被学生接受和内化,否则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⑩高校教务部门可以按照不同院系、专业、学科进行分类排班,使教师能够长期跟踪对接相应的院系,更好地精准把握教育对象身处的院情、业情、学情或人才培养目标等,使教学内容和方法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人生价值”主题的教学中,可以组织开展“寻找未来的自己”的移动课堂活动,通过寻访本院或本专业的优秀校友,听他们讲求学或创业的故事,加深学生对人生价值真谛的理解。在“道德与法律”专题的教学中,可以多搜集一些学生未来所要从事职业的道德与法律规范,更能满足学生对课程的期待。

除传统的课堂讲授之外,教师还可通过深度融入学生翻转课堂准备过程,发挥重要他人的影响作用。当前部分思政课教师对如何开展翻转课堂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比如将翻转课堂简单地理解为师生角色的互换,即将翻转内容及要求布置给学生后就了事,只等着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上台讲课即可,对整个翻转准备过程采用放羊式管理方式。事实上,高质量的翻转课堂离不开教师的内容设计、全程跟踪以及精细化的指导。教师全程融入翻转课堂的准备过程之中,能及时帮助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师生共同努力,最后才能呈现精彩的翻转效果。这其中师生深度互动,能够为思政课教师发挥重要他人的育人作用创造契机。

(二)树立“我-你”师生交往理念,发挥强关系价值传递作用

关系哲学大师马丁·布伯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他”关系,另一种是“我-你”关系。在“我-他”关系中,人把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当成是与我相分离、相对立的对象和客体,并用理性和因果性把他们放到时空网络中把握,以我为中心,利用他们满足我的需要。而在“我-你”关系中,我与你不是分离的,而是结为一体,于是,我便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来建立关系,也不会用理性来分析你的价值,而是以我整个的存在,全部的生命来与你相遇。^⑩虽然这一理论带有浓厚的宗教哲学色彩,但是却给世俗世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树立“我-你”师生交往理念,能够去功利化地与学生交往。

思政课教师要常怀一颗关怀的心,不断提升自身的关怀素养。“如果所关怀的对象是人,关怀过程有利于其最佳发展可能性的实现,包括以关怀性为核心的道德理想的成长”。^⑪诺丁斯的关怀理论认为关怀有两个环节:第一步是接受对方,不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对方,之后是关怀者的动机能量流向被关怀者。也就是说,思政课教师要主动地融入学生的生活世界,积极关注学生的存在,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咨询,要对她(他)的需要及时做出回应。在这样交往理念的基础上,才有望打破“弱关系”,形成“强关系”。

但是强关系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有赖于教师持续性的努力,比如建立良好第一印象,那么绪论课一定要精心准备,它不仅关系学生对教师的第一印象,也关系到学生对课程的第一印象。在后续的师生相处中,教师还应该学会适当自我暴露。根据欧文·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论,“前台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存在,人们所扮演的通常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和社会化的自我;后台活动则破除了条条框框的限制,是自发性自我的暴露。”^⑫如果说课堂教学更多展示的是教师的前台行为,那么后台行为的自我暴露会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一个生活中更真实的“老师”,这种真诚能够带来信任,增进情感。“约哈里窗口”的人际互动理论指出,向他人适当地进行自我表露有助于提高人际互动效率,是最为有效的办法。M-12说:“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说学生跟她的一些事,我就觉得这个老师给他们的感觉一定很好吧,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心事跟你说。这种信任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呢!”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可以通过QQ空间等自媒体发布一些自己的生活趣事、感悟、教学心得等,让学生了解一个立体的多面的老师,这有助于打破学生对思政课教师的刻板印象,为师生深度交往破除某些观念障碍。M-12说:“很少看见老师会发‘说说’(QQ空间一种自我表达的功能),嘿嘿,我现在手机还有老师拍的X工大的照片、心理咨询证书以及空间里记录孩子的成长,真好。”

强关系的构建,教师还要善于捕捉课堂内外学生成长中的思想细节,敏感地关注学生思想动态,热情地开启马丁·布伯式的“我-你”对话:“在那里每一位参与者真正心怀对方或他人的当下和特殊的存在,并带着在他自己与他们之间建立一种活生生的相互关系的动机而转向他们。”^③当然细节的捕捉和对话更多地应该发生在课堂之外,27.2%的思政课教师认为重要他人的作用发挥不可能仅仅通过课堂教学就能实现。66.99%的人认为应该结合课内与课外。尽管对于思政课教师来说,面对的学生众多,每一个“你”不一定都能顾及,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放过或错过任何一次与不同生命的美丽相遇。

(三)完善评价机制,将重要他人行为纳入思政课教师考评中去

能不能发挥重要他人的作用,除了依靠思政课教师自身的觉悟之外,还需要政府和学校能够制定更合理、更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平衡教学与科研考评占比,制定有合理区分度的教学考评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④当前高校应适度减轻思政课教师的科研压力,提高评价中教学和教学研究的占比,让认真教学的思政课老师有地位、有尊严,让他们不再为生存而浮躁焦虑,能够安心育人。

其次,将思政课教师重要他人的育人行为及实效纳入业绩和职称评聘考核中来。有的思政课教师希望学校能对老师完成重要他人角色付出的劳动,在评奖、评优、职称晋升等方面予以政策性支持,如立足课堂教学的同时,也应考核思政课教师进班级、进宿舍、进社团、进网络等实际情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重要他人角色行为的评价,不能只是在行动的量上设定指标,而更应该关注行动的质的方面。毕竟思政课教师所带学生较多,并且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遇到困惑需要思政课教师的介入。

再次,进一步完善荣誉表彰制度,激发思政课教师做重要他人的荣誉感。“荣”字原初是用来表示植物的名称,后引申出繁荣、光荣等意思。“誉”是称扬、赞美之意。荣誉作为伦理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主要通过外部的奖赏对个体进行精神激励。高校应该结合学生、专家和同行评教的结果,完善荣誉制度。如设置“最美思政课教师”“最受欢迎的思政课教师”“最美重要他人”等奖励,并通过线上线下两条传播渠道,对优秀事迹进行大力宣传,重塑思政课教师的校园影响力,增强学生对思政课教师的信任,也提升思政课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五、余 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政课的改革,提出课程思政、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等改革举措,并制定一系列惠及思政课教师的政策,为教师安心育人提供了越来越好的外部环境。

新时代这支“10万+”的教师队伍如何由大到强?如何带来育人新面貌?如何增强思政课教师自身的获得感?需要思政课教师发挥重要他人的作用。既需要教师沉下心来来认真思考如何用理性与情感与学生展开“我-你”的生命对话,在交流中春风化雨,也需要高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认真落实改革精神,制定出符合思政课教师职业特点和岗位实际的评聘标准、教学评价制度、奖励政策,持续不断地优化重要他人作用发挥的外部环境。

研究中也存有一些不足:

第一,本文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反映的问题也许还不够全面、客观和深刻。第二,对重要他人的核心素养的讨论还处于经验判断的阶段,如情怀深、责任感强、有仁爱之心、同理心、较强职业认同等,但事实上,对这个问题还需从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提炼概括。第三,在评价机制的完善方面,提出将重要他人的育人实效纳入思政课教师考核中去,但是对于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衡量指标还未展开充分的论述。以上不足,还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予以完善。

【参考文献】

- ① 邓晖.“引路人”数量破十万,发展中的问题如何解决——高校思政课教师发展状况调研[N].光明日报,2021-01-28(15).
- ②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44.
- ③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08/14/content_5421252.htm.
- ⑤ 才立琴,范乐源,田小静.重要他人视域下的大学生学习质量支持系统研究[J].现代教育科研,2020(1):116.
- ⑥ 朱苇苇.重要他人理论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9(10):113.
- ⑦ 韦月桂.教师专业发展终极目标:成为学生成长的重要他人[J].基础教育研究,2014(6):19.

- ⑧ Granovetter,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1380.
- ⑨ 王爱菊.教学冲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4-25.
- ⑩ 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6:6-7.
- ⑪ 朱小曼,侯晶晶.关怀德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88.
- ⑫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7.
- ⑬ 马丁·布伯.人与人[M].张健,韦海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30.
- ⑭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EB/OL].<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6-30/9225704.shtml>.

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批判及其防范化解策略

王亚南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从逻辑、方法和价值等维度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不同程度的否定和扭曲。这种对历史价值和合理性的否定,一定程度上弱化民众的政治信仰,消解民众的价值追求,也削弱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防范化解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之道在于三个方面,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构筑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基;推进“四史”学习研究,凝聚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掌握舆论引领主导权,打造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新阵地,从而实现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本质特征;防范化解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消费主义视域中人的精神困境及出路”(项目批准号:17FKS028);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7YG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亚南,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201620)。

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无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否定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将历史看作是偶发事件的堆砌,对现有历史结论表现出否定性、随意性和臆断性的态度,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极大的危害。有学者指出:“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但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问题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刺耳的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的泛起,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①因此,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从理论上进行深刻批判,剖析其否定历史的虚无本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特定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在实践中真正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内在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虚无主义(nihilism)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雅各比的书信中(1799年),后因尼采称之为“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而被定义于价值范畴的虚无。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西方各国,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与较量,一种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伴随着现代社会转型呈现出来。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身就是否定一切与其不相适应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套合理化体系的过程,“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②由此可知,虚无主义的否定历史不是简单抹杀过去的一切,而是为了确保理性、科学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否定传统中那些不理性、非科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表现为价值、信仰,存在于文化、思想观念之中,要想彻底清除这些传统的影响,必然会对记录、承载它们的历史进行虚无化,因此,对历史的否定已经内生于虚无主义的逻辑之中。不但如此,当现代社会的人们逐渐习惯用理性精神、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时,自然会对不理性、科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视为“无”,这种把解决不了的问题视为“无”的做法也加剧了人们漠视传统、遗忘历史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虚无化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虚无主义引发的必然产物。

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逻辑因现代化而生,在有关现代化道路、模式、前景等问题探索中展开,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究竟在何种范围内适用、又有何种程度的拓展可能、发展前景如何等问题的反思,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自觉与自省。但随着理性与科学变成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后,人的碎片化的生存境遇和无根性的思维范式,使得西方现代文明逐步走向没落。尤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虚无主义已经泛化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工具,理性、权威、整体被解构为非理性、去中心、碎片化,多元、差异成为虚无

主义的核心主张。鉴于虚无主义泛化虚无的意义和作用,从虚无的对象上看,它从否定前资本主义的某段历史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即“虚无主义是和西方现代性终结紧密相连的,将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没落,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观的颓废,泛化为整个世界存在意义和人类基本价值的消弭和否定。”^③从影响范围看,也不限于资本主义世界,它与资本同步扩散并影响到其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并且创造着一种把本国传统价值和历史虚无化的虚无主义思潮。

回顾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演变,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华文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碰撞。从实践结果看,在交锋与碰撞中,西方现代文明往往把自己定义为文明、先进的一方,而把中华文明定义为野蛮、落后的一方,这种不对等的文明关系设定,本身就先入为主把西方现代文明作为最高标准而贬低中国固有的文化与价值、否定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同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长期存在的一种视传统价值和历史文化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错误认识,随着西方现代化观念、标准的嵌入,导致有关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思想、价值先验优于本土观念,进而质疑中国本土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并对中国确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采取不同程度的虚无化。丑化党的领导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执政、扭曲党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正是在这种文化碰撞中生成和传播。

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绝、历久弥新,就在于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坚持兼容并蓄,从而更好地消化、吸收、改造、提升自我。当我们不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是现代化的桎梏,能够正确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汲取更多积极因子助力现代化,构建一种与西方现代文明包容差异、互鉴共存的关系,也就找到了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出路。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

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研究”之名,反思中国近现代史,形成所谓创新性历史结论。而这些结论无论在认识本源、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立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特质,全盘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等,不但混淆了民众对近代以来顺应历史发展大势、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认知和判断,而且还削弱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因此,必须在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深刻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习惯于从历史细节中臆断出普遍性结论,他们拒绝“宏大叙事”、聚焦个别案例,这就容易造成历史观的混乱、历史认识本源的颠覆性错误。历史虚无主义一开始就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细枝末节的铺垫与堆积,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就体现在细节的罗列上。诚然,历史的面貌的确需要无数细节呈现,但是这些细节不等于历史本身。而且,这些历史细节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则是一种阐述历史的微观视角,微观视角下的历史呈现出细节化、具体化、碎片化的特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和完整了某些历史片段,对于还原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其关注点过于细小、偏重细节,反而割裂了与整体的关联,削弱了细节原有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运用普遍联系的、运动的、发展的方法探求历史规律、展现历史原貌,否则历史就像是“盲人摸象”被分割成毫无内在联系的故事,沦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④总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于所谓历史新研究,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碎片化、具体化的历史细节中虚无出一种另类历史,他们用个人情感代表家国情怀、用个体记忆代替民族整体记忆、用娱乐化的方式消费历史和亵渎历史,真相被遮蔽、历史被虚无,模糊民众的历史认知,淡化民族精神,削弱理想信念,破坏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共同思想根基。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价值中立”,通常他们会无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以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为依据,以抽象的、超越阶级的人性论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鼓吹“告别革命”,从而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不会脱离现实谈论超阶级的人或者人性,因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⑤处于阶级社会里的人不可避免具有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超越阶级的、没有阶级立场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人都是归属于一定阶级的人,人性自然也是具体的、现实的,毛泽东对此也明确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⑥阶级分析法则是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钥匙,因为不触及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不厘清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正是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揭露了剥

削的实质,为摆脱资本、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指明了方向。

因此,“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⑦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出发把握客观历史规律,实现历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从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违背历史本质和规律,历史在这种抽象人性论的畸形表达中,被神秘主义或者宿命论所遮蔽,无法从现实触及其内在本质,从而抹黑党史国史,娱乐消费正史。

再次,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以人的主观意识作为认识历史、评判历史的逻辑起点,在他们的视域中,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表象,构建历史的标准也完全取决于自我的主观意识,明显带有极强的主观唯我色彩,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历史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就是承认并把握其客观规律,但历史虚无主义却否定历史客观规律,认为历史只是人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从而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他们还根据虚无历史的需要进行历史评价,人为拼凑、曲解、乱用各种史料,情绪化、片面化地评价历史。这种以各种“加工过”的史料为依据,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得出所谓新的历史结论,从而达到虚无历史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感觉论为其认识依据,以主观臆断的推理逻辑为认知路线,以怀疑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改造前提,其根本置换历史事件的生存场域、荒唐揣测历史主体的真实意图、胡乱填补历史描述的逻辑空场、故意涂抹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等为改造手段,以理性外衣和虚假求真态度强烈抨击和恶意否定真实历史,并建构其所谓的真实历史。”^⑧这种从主观臆断出发、否定历史价值及其合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严重干扰民众的历史认知和批判,动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基,而且恣意抹煞民族精神和中华文明,破坏社会安定团结,阻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⑨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主观臆断探究历史发展趋势,抓住细枝末节构造虚假结论,脱离人民立场忽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现实性,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昭示了其别有用心

三、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诉求

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特色与优势,尤其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创造性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方案与智慧。然而,国际舆论社会各种质疑、否定之声仍然甚嚣尘上,这表明如何实现现代化,东西方两种文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纵观西方国家的崛起,普遍以殖民掠夺、武力侵略以及不平等条约铺路,只不过是现代西方国家以所谓“文明”为借口,构建的全球体系和国际秩序实质仍然是人类历史上野蛮征服的极端反映。而中国的发展,走的是完全不同西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其他谋求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可能,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而不同、共享共荣,尊重每一种文明、维护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权益,为日益狭隘的世界发展格局找到了新的出路。遗憾的是,西方社会的某些政客和媒体往往无视这种变化的趋势,一味怀抱“文明冲突”,深挖“修昔底德陷阱”,妄想通过虚无和否定特定历史,继续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强势。

正是在中西两种文明交流交锋交融的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成为西方反华力量推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拙劣武器。西方反华力量从未放弃对中国的价值渗透。他们或是通过拉拢、组织某些特殊经历的人撰写所谓的“回忆录”或“人物传记”,利用大家猎奇的心态,向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散播我国领导人的不实谣言;或是以学术研究、合作交流的方式,培养一批亲西方的“学术代言人”,大谈西式自由、美式民主,按照西方思维方式批评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他们借历史虚无主义之口,输入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虚无的是与其自身政治立场和核心价值不一致的特定历史,否定的是已经形成一定共识和基础的主流历史认知,这种“意在沛公”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明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⑩在历史虚无主义拒斥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价值导向下,势必会干扰国家的长治久安,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蒙上阴影。因此,要在东西方文明互鉴中,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反动和价值反叛属性,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立场、价值诉求保持必要的警醒和批判。

总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次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较量,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又一次改变,但不论何种改变,最终都是让身处在文明中的人类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单纯比较哪种文明孰优孰劣并不具有现实意义,用所谓先进文明取代、淘汰落后文明也不是文明互动的主流。因为世界日益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文明冲突作为文明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相交相融才是各种文明互动的大势所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彰显了新的文明类型的崛起,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好的实践回应和批判。

四、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历史虚无的逻辑和唯心史观以及其所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已经在当前思想场域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众的政治信仰,消解了民众的价值追求,也削弱了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好理论武器,构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基,推进全社会“四史”学习,凝聚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掌握舆论引领主导权,打造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新阵地,从而实现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有机统一。

(一)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构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以“价值中立”“人性”为尺度,限制了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历史规律、历史主体等核心问题上的深入探索,这种先天缺陷反而确证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而且运用普遍联系的、矛盾的、发展变化的辩证法深刻批判其形而上学方法论的错误,通过科学的理论甄别,牢固树立起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基。因此,“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①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解读历史、批判现实、构建未来的重要作用。

其一,坚持普遍联系的方法克服历史认知碎片化,从而形成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与结论;坚持矛盾对立统一克服片面性,扬弃历史虚无主义逻辑思维中的片面性、单一性,从而对历史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诠释,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坚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克服历史的虚无,运用阶级分析、人民主体性等科学方法,创新历史规律的

整体性建构,破除历史虚无迷津。其二,坚持正确的历史思维,面对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既要关注历史现象的正反两面,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既不能只突出成绩忽略问题,也不能无限夸大问题抹杀成绩;既要尊重规律的普遍性,又要考虑规律发挥作用的场域、背景、边界的特殊性。唯有此,才能达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目的。

(二)推进“四史”教育研究,凝聚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习惯性地选择虚无,即但凡涉及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历史素材都要质疑、否定,忽略历史进程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选择与阐释上断章取义,拼凑出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结论,美其名曰“还原历史”。因此,在任何时刻决不能放松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同时,还要始终掌握理论解释的主动权、主导权,凝聚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合力。

其一,以“四史”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抓住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坚决抵制、反对在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通过深入广泛学习宣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真切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深刻领会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⑫旗帜鲜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其二,多举措强化“四史”学习效果,推动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实施,全社会尊重英烈、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开始走上法治化轨道。事实证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需要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因此,实现学术研究与理论学习相通、思想宣传和解释问题相辅、学术话语与社会热点相融、传统媒体与移动媒体相映,增强全体民众对“四史”学习的政治自觉,提高“四史”学习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和影响力,凝聚全社会合力形成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武器。

(三)掌握舆论引领主导权,打造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新阵地

面对多元社会思潮在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扩散与传播,如何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和水平,既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冲击,夺取话语主导权的现实选择。只有打造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新阵地,才能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让正确的声音盖过错误的声音,才能增强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心,才能牢牢掌握正面宣传的领导权。

其一,强化媒体正面宣传的责任,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等出现的新变化,

传统媒体、新媒体、主流媒体、自媒体都应该增强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社会职责,实现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主导。其二,加强媒体深度融合,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实现主流媒体与移动传播互补,拓宽传播的渠道,扩大社会知晓度。其三,丰富和完善传播内容,要在议题设置、内容供给上发挥思想性与引领性的叠加效应,把握好时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做好“怎么讲、讲什么”,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才能真正提升话语传播效力。

简言之,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虚无化思维和唯心史观,歪曲历史、蛊惑人心,混淆了人们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已在意识形态领域显示出巨大的破坏作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通过各种自然、社会现象把握规律,也只有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研究中的贯彻和运用,才能更好地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唯心主义,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实现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①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
- ②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6,739.
- ③ 程馨莹,卢黎歌.近年来国内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研究综述[J].思想教育研究,2014(7).
-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4.
-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0.
- ⑦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
- ⑧ 蒋明伟.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范式:从理论批判到社会批判[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07).
- ⑨⑩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4,113.
- ⑪ 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N].人民日报,2015-8-1.
- ⑫ 赵卯生.新时代持续推进“四史”教育的科学路径[J].人民论坛,2021-2-25.

定向·定位·领航：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新思想的三重契合

曾 骊

【摘要】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总体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同步发展的。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重契合问题:第一,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之特”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向的契合;第二,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之变”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契合;第三,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之新”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的契合。重视并审视三重契合,有利于整体上认知新思想的特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定向;领航;契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领航的研究”(项目编号:19JD710053);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浙江‘三个地’政治资源优势活化思政课教学的体系探索”(项目编号:jg2019030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曾骊,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310018)。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也实现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充盈中,再一次迸发出巨大的

理论能量,迎来了新时代发展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从各方面阐发若干见解,开展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研究。然而,阐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新思想的三重契合”,首先需要明白,真正伟大的理论总是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和时代解答。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启发、如何与之契合,需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点和现实逻辑,如何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航标,关键在哪几个方面内容实现思想契合。笔者认为有三重契合可论,第一,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之特”,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向的契合;第二,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之变”,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契合;第三,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之新”,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的契合。这三重契合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基础,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其契合的具体形成及发展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呈现更大的丰富性和现实性特征。

一、“学科定向”与“道路之特”的契合

(一)何为“道路之特”

道路之特,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有别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指有别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性的改革开放浪潮考验下,英美一些国家和地区繁荣之后又陷入停滞甚至后退。只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持续上升,并且跃居全球第二经济体,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窃以为有“四特”可说:

一特: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转变。新时代按照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要求,从物质富裕到精神富有,需要逐步培养中国现代化强国进程中需要的现代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新时期,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富起来的时期,是快速走出贫困落后状况的重要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更注重“强起来”,需要新的精神气质,即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智慧,逐步树立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角度,就是从物质脱贫到精神脱贫,这个精神脱贫明显滞后物质脱贫,精神需求迎来趋势性转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实必要性、重要性。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扫除了血缘宗亲制度,20世纪70年代的改

革商品经济推动了个人的独立性及平等权利的生成,21世纪的户籍制度从家庭为本位走向个人为本位。当今中国正沿着这一方向,公民逐步平稳、有序、人道地演进成现代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角度理解,就是公民意识“民主、平等、竞争”这些核心要素的形成和培养。

二特:充分释放国家与社会、地方、个人三对关系的积极能动作用。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既要坚守“大政府、强政府”的优势,也要构建“大社会、大市场”,形成“大国家”“大社会”双重格局。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持续做大做强公营企事业同时,不断发展民营经济。不少民营企业在这一背景下快速生长起来。如立足市场竞争胜出的联想集团,推进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投身“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红豆集团,以实业推动中国创造走向世界的浙江吉利控股有限集团公司,以产业模式变革的新经济代表阿里巴巴集团等。现在我们常用“五六七八九”形容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①从学科角度讲,技术的发展明显快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从技术发展视角看,经历了石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五个时代都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也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明显落后于科技的飞速发展。

三特:合理控制社会变革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在保持社会稳定可现可控的前提下变革社会,在社会创新过程中保持社会历史的连续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角度看,中国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不同于苏联、东欧激进式休克疗法,我们则是渐进式变革。下一步路径的选择依然是渐进式的变革。例如农民工进城,他们依然保留着原有土地和农村习俗之间的权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容许国家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人员“停薪留职”,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上千万公营企事业职工“集体下岗”,也是在作了相当丰厚的补偿后,地方政府及其城市社区展开了浩大的再就业工程加以补救。^②近几年,国家出台政策激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亦如此。

四特:在世界性普遍交往中,“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发展自己也推动整个全球社会的进步。在国内,授人以渔,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7亿多人脱离了贫困,成为全世界解决贫困问题的最大“脱贫明星”。在国际上,中国道路成为发展样本,中国智慧引领世界。如,据2020年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达9.4亿,中国网络应用继续位居世界首位,电子商务继续走在世界前

列。一个小小的“淘宝村”，从2009年的3个迅猛发展到2020年的5425个，数字经济推动“三农”发展，探索了新的中国方案，发掘了电子商务在创业就业、减贫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淘宝村为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经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英国《经济学人》、印度《经济时报》等都纷纷发文发声，认为中国淘宝村对其他国家农村发展具有推广和借鉴意义。

（二）“道路之特”对“学科定向”的启示

学科定向就是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方向。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建立以来，方向始终是明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学科定向也是变化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学科定向是有层次的，大方向和小方向需要衔接、细化，不是千篇一律的；学科定向是抽象的、战略的，也是具象的、丰富的；学科定向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具体的、演绎的，接受社会浪潮的清洗。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深刻改变了中国面貌和深度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经历百年变革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继而挺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实践呈现，也是中国理论自立自强超越地域性进而世界化的最新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定向上，需要确定新的方向，在解答世界和人类问题进程中，将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学科“之特”是从特殊到一般，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正是学科需要从理论高度概括，具有普遍意义，对中国乃至全球具有指导意义，这就是学科努力的方向。然而，跨越理论和实践、跨越全球的鸿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向需要完成新时代的“三化”系列转换：

1.推进中国化，学科方向的转换。更多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结合，在坚守中国文化自信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正在扩大对世界的引领，从以西方为主导，转向由西向中的转换。

2.推进时代化，学科内容的转换。更多与中国伟大的现实实践相结合，总结、提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从而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3.推进大众化，学科时空的转换。更多与对象范围相结合，正在实现时空的三个转换：从直面当代中国转换到当代世界，从直面历史经验转换到时代需求，从直面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转换到全球理解和欣赏的多元话语。

三大转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直面的空间、时间、人间的转变问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

二、“学科定位”与“发展之变”的契合

(一)何为“发展之变”

发展之变,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在发展变化。发展需要变化,需要更多以人民为中心的变化,需要有获得感的变化,需要走向世界的变化,这就需要有智慧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解体和剧变,社会主义进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和现实危机,但经验和教训让后人深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变”与“不变”,有四对关系可以解读:其一,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的是内涵的丰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变的是主线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十次党代会,报告标题都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二,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的是阶段性特征,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不同历史阶段贯通着中华民族一致的精神;不变的是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其三,针对社会矛盾,变的是主要矛盾,化解“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钥匙在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不变的是基本矛盾。其四,现代化目标,变的是实现目标的步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步走”到十九大“两个一百年”安排;不变的是现代化道路,十八大之后建设现代化目标最具情感的表达就是“中国梦”。四对“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开启了中国大众、国际友人对泱泱中国的认同性。

当前,发展之变体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三个飞跃。一是实力的飞跃。无论是经济、科技、文化、国防,都显著增强。二是政治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制度和道路的自信,为全球提供了制度和道路的示范。三是视野与胸怀的飞跃。参与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已经逐渐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纳入了联合国决议。

社会的发展之变,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学科也获得了重要进展。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圣西门描述历史事件引入阶级斗争概念,时代精神主旋律也开始由政治平等、民主革命、经济和政治霸权转向中国主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建立新时代背景下的科学世界观,都是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二)“发展之变”对“学科定位”的启示

学科定位就是坚定认识和确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领域、高校育人育才中的指导地位。这种定位是体系性的,全面的。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学科定位不仅仅是指导思想上的定位,更是方法、方向、内容、指导地位上的定位。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量变”,这些量变积累的能量,虽然未能引发将社会推向更高层次的“整体质变”,但使社会产生了阶段性部分质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工作实践角度看,需要我们提炼、总结、升华治理经验,指导新的实践。

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定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科学。”当时这一段表述的学科定位由二个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大学科归属是马克思主义;二是该学科需要整体性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学科定位”与“发展之变”同向同行,实现学科“优先、优质、优势”发展,从国家层面看,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学科自身来看,应当自我反思、自我总结、自我加压,思考如何发展成为优质学科;从其他学科视角看,要处于引领学科发展的优势地位。

巩固该学科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六个方面的引领:

1.引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时代领航行动”的首要标志,就是既要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引领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坚实的学科和学理支撑,辩证地解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论难题,为大学生一生成长奠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础。^④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民情党情国情世情,积极帮助大学生释疑解惑日常学习和生活实践中的困惑与难题。

2.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无论在研究和教学上都要坚持不懈引领人民大众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紧密联系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正确回答他们遇到的人生幸福、事业成败、道德法律等问题,教育引导他们科学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3. 引领保障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既具有学术属性,又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与实践问题,抵制与批判各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地意识,引导社会、高校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理论共识,确保国家、社会、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4. 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时代领航行动”的主要任务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主动对话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理论共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全过程,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形态。

5. 引领中国特色智库咨询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该引领各类智库建设,积极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应当成为党和人民的智囊和智库,勇立时代潮头,关注现实变化,应对各种挑战,科学辨析和回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为党、国家和各级政府著述立论,建言献策。

6. 引领全球哲学和社会科学潮流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既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理论。立足全球学术前沿,关怀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扩大国际学术理论交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走向世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向世界,服务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进步。

三、“学科领航”与“内涵之新”的契合

(一)何为“内涵之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八个明确”清晰阐明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十四项基本方略”具体谋划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重大时代命题。

内涵之新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二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贯穿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始终；三是体现了新时代改革发展的要求，围绕新目标、新矛盾，抓住了改革发展的关节点。内涵之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全方位思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还要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内涵之新视角看，中国治国理政方法实践实现了三个飞跃：改革战略思维的飞跃，具体方法道路的飞跃，政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的飞跃。

（二）“内涵之新”对“学科领航”的启示

领航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更好地引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作用。^⑤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社会不再是静态的、传统意义稳定的社会，是流动的、发展的。传统习俗的崩解，新的公序良俗的形成，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学科的领航。领航既要思想路上的领航，需要思维方法上的领航，还需要内容实践上的领航。

从学科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实质是缺位、错位、无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政治态势看，内涵之新为我们这个学科指明方向，勇当阵地坚守者，预测监测政治态势和发展趋势；要从追赶者、解释者，变成领跑者、创新者；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势者变为主导者，要更前瞻和引领。从这三方面看，才迎来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春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再出场”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为什么领航

首先，从政治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指导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是中国社会演进过程中节奏最快的时刻，也是变革最深的时刻，变革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超越经济社会的限度，超前领航，成为指导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精神力量。从十九大到2050年，我们确立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中国人民物质脱贫任务已经完成，而精神脱贫成为当务之急，以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和状态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学科领航。

2.领航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学科角度看,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为一级学科,自身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提出和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地位的形成,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育教学实践看,教育教学是动态的、变化的、层次的,教育教学对象是有差别的。从网络到课堂,理论常常滞后实践发展,学术对实践研究跟踪不足,热点焦点关注不够,教材创新不足,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因此,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航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为领航创造了条件,学术研究的拓展,特别是打破学科界限的整体性研究取得明显进展;^⑥学科在人才培养、学位建设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彰显了学科的生机和活力;学科师资更加凝聚,研究、教学、传播队伍力量日益壮大。

3.领航的路径

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学科,将学科、学术、学者、学风、学生紧密联成一体,在“五力一体”上下功夫:

对学科建设的领导力——关键。这是政治领航的问题,在国际国内风云深刻变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复杂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先要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要自身建设好,要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力支撑,还要发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功能。

对学术研究的主导力——基础。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进行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实践经验总结。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是要与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就是要与当下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相结合;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青年学生,这种理论武器就体现在具有说服力,能解疑释惑。

对学者的向导力——主体。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样化,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做相应的引导。而首先需要引导思想政治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产生内生性认同。从学科内容解读、分析阐述、认同现状入手,对教育教学生成方法、入脑入心探讨,形成一套规范。避免学科“失语”、教材“失踪”、论坛“失声”,实现在交流交锋交融中不缺

位、不越位、不错位。

对学风的传导力——保障。学风生命力在于具体化,在于正视历史条件,正确分析现实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去实践、总结、传播,不断成熟和丰富,践履于日常生活世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更要增强亲和力、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学生的引导力——目标。用价值核心内容铸魂育人,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在原理掌握基础上,自觉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明白立场、情怀的持受,是立场、观点、方法、信念的统一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学内容。站在“两个一百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必然发生新的变化,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都在增加,需要重视和审视“道路之特”与“学科定向”、“发展之变”与“学科定位”、“内涵之新”与“学科领航”之间的三重契合问题,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的问题域以及与新思想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研究中,这些契合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急或缓地不断变化,深刻影响甚至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图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实践中,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整体上梳理和审思三重契合问题,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质性深化和功能性拓展。因此,只有立足整体进一步加强对三重契合的充分关注和深刻把握,才能在新时代的背景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认识和关切,深化学科服务人才培养的意义和作用。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谱系、内容图景,促进了两者之间定向、定位和领航的三重契合,从实践和思想上进一步宣告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

【参考文献】

- ① 曹鹏程.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不会变[N].人民日报,2018-10-24(5).
- ② 胡承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特”[J].观察与思考,2017(3):5-16.
- ③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奋斗,2019(7):1-9.
- ④ 张耀灿.推进综合改革创新,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J].中国高等教育,2015(11):1.
- ⑤⑥ 骆郁廷.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作用[J].中国高等教育,2015(20):27-30.

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在教学中的实现路径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张 彬 张青卫

【摘要】 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是高校思政课教学需要遵守的一个基本规律。政治性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注意名正言顺，学理性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注意以理服人。政治性体现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受动性，学理性体现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能动性。高校思政课教师上好思政课的关键是在教学内容符合政治性的基础上讲出学理性。通过做好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大事小情和技术进步，高校思政课教师就能在适应教学受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教学的能动性。

【关键词】 政治性；学理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积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KS015）。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张 彬，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青卫，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401）。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办好新时代的思政课应坚持的“八个统一”。“‘八个统一’的论述，为我们抓好思政课建设和搞好思政课教学，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导”。^①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不仅需要深刻领会“八个统一”的理论内涵，更需要将“八个统一”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在这“八个统一”中，“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作为第一个统一和其他七个统一是“1”

和“0”的关系,做不到第一个统一,其他七个统一都将失去实际意义。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重点把握第一个统一,要想在教学实践中做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在教学内容上要注意符合同一性质

教学内容是否符合思政课的課程性质是判断高校思政课教师能否上好思政课的根本标准。学生在评价一位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时主要以讲得是否有意思为标准。讲得有意思等于讲得好吗?显然不是。讲得有意思只是高校思政课教师上好思政课的充分条件,讲课内容符合思政课的課程性质是上好思政课的必要条件。思政課的性质确实比较特殊。作为政治课它肯定不属于政治学范畴,所以它的教学内容的重点并不在于向学生阐述民主、选举、国家、政党、公民等这些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然而思政课作为政治课,其教学内容又与政治学密切相关,不仅与政治学,还与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心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因此,一些高校思政课教师误以为思政课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在课堂上讲与思政课相关的内容就不会偏离思政課的課程性质。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

思政课虽然教学内容比较庞杂,但却有一条鲜明的教学主线贯穿其中,这条教学主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主要是向学生讲明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主要是向学生讲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学生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主要是向学生讲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主要是向学生讲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主要是向学生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进展。虽然五门高校思政课都有自己明确的分工,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高校思政課的性质和目的,划定了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边界。任何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真正上好思政课,就需要积极围绕思政課的性质和目的组织教学活动,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政课,鼓励各高校结合社会现实和本校实

际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政课改革,但是各高校的思政课改革如果不注意守住思政课的“初心”,“百花齐放”的改革可能就会异化为“群魔乱舞”的表演,高校思政课很可能就讲成了历史课、心理课、成功学课或通识课等等。守正才能创新,高校思政课改革要想守正就需要紧紧围绕思政课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具体到每门思政课来说,五门思政课虽有明确的分工,但教学内容又有很多交叉的地方。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意把思政课与哲学、历史、心理、政治等人文课程区别开来,又要注意把自己所教的思政课程与其他四门思政课程区别开来。每门思政课程的教师应明确自己所应重点讲授的内容,相互之间要有明确的区分度,相互区分的最好办法就是吃透教材,根据教材明确各自所应重点讲授的内容。

2018年版高校思政课教材是党和国家集中全国最顶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组织编写的。虽然教材难免存在各种复杂的问题,但它肯定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确定自己课堂教学内容的基本遵循。现在很多高校的思政课都采取专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未尝不可,但要注意专题的选择应该体现新教材的精华,明确新教材的哪些基本内容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完成的规定动作,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再去谋划自选动作。规定动作体现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自选动作则体现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如果认为专题教学可以完全脱离教材,只讲自己认为容易讲的、喜欢讲的、擅长讲的或者学生愿意听的、喜欢听的、容易接受的内容,也就是只有自选动作而无规定动作,虽然这样做可能老师教得非常轻松,学生也听得非常欢喜,但也只能说明课堂效果好,并不等于思政课上得好。

思政课的性质不仅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边界,也决定了思政课的教学难度。思政课作为政治课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价值引导。显而易见,知识传授易,价值引导难。现在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而且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是由他的成长环境、社会经历、信息来源、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对大学生的价值引导,高校思政课教师只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许多因素是高校思政课教师掌控不了的。思政课作为政治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上好思政课,肯定需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能够系统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很容易断章取义、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现实相结

合,既能够用生动的社会现实解读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能够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透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思政课作为政治课是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公共课,与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所属的专业课相比,与英语、高数等知识性、应用性很强的其他公共课相比,与学生专业无关、又给人感觉无用的思政课自然难以引起学生应有的重视和兴趣。如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的意愿和积极性,是摆在高校思政课教师面前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虽然思政课的政治性决定了思政课教学有边界有难度,但并不等于思政课教学就难以有所作为。因为“政治性是思政课的本质属性,学理性是思政课的基本属性”。^② 政治性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注意名正言顺,学理性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注意以理服人。政治性体现了思政课教学的受动性,学理性则体现了思政课教学的能动性。上好思政课的关键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性质的基础上能够讲出学理性。讲出学理性可以使高校思政课教师适应边界,克服难度,就像花样滑冰运动员一样,在限定的滑冰场内随心所欲地演绎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舞蹈。

二、在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做好“两个分析”

高校思政课与高中思政课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其学理性更强。高中思政课由于有高考的现实压力,教师的教学重点自然会放在知识点的讲解和应试上。考试考什么肯定就要重点讲什么,甚至干脆让学生死记硬背,至于学生到底理解了没有,能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则不是高中思政课教师考虑的重点。高校思政课由于没有了应试的压力,教师没有必要再把重点放在知识点的讲解上,而应放在突出课程的学理性上。这里的学理性,并不是指给学生讲解一些高深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而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现实,指引学生认清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提高教学的学理性,需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要想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当然需要看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浩瀚如海,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就有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计划出70卷。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简化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也有10卷,而且每卷都是大部头。不仅数量惊人,打开其中的任何一本,其阅读程度之难也是令人畏惧。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的,新的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例如:《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等。如果说只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的全

部经典著作才算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恐怕没有几个教师能够做到。即使能做到,也不等于就具备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反而有可能会陷入本本主义的窠臼。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像一棵不断成长的、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枝叶越长越多,但根茎却只有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有很大差别,但他们的思维逻辑却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来说,要想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最重要的不是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体的话,而是应该学会像他们一样思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继承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并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上,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内容。科学的实践观就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棵大树的根茎。高校思政课教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也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在日常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可以做到得心应手、以不变应万变。例如,人的本质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第一章讲人生观。讲人生观首先需要讲清楚人的本质是什么,而讲这一问题则必然要讲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点,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这句话如果只是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就很容易让学生误解。难道马克思的意思是说,我不跟别人来往,我就不是人了吗?我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难道就是由我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吗?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就需要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去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正是人的实践活动使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一个人考上大学就与同学、老师结成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大学毕业后到了工作单位又有了同事关系、业务关系,结了婚又有了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等。但是社会关系只是人们进行活动的舞台,而社会关系如何转化为一个人的本质,就在于个人如何活动。处在同样的环境,由于个人的活动方式不同,个人的命运也就不同。一个杀人犯说自己社会关系不好,比如,出生在普通家庭,没有考上好大学,没有找着好工作,老板不重视自己,同事不关心自己,所以他仇恨社会,所以他杀人。这种解释显然是狡辩,是愚蠢的表现。社会关系的的确有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但要

说社会关系把人限制得一点选择都没有,显然也是夸大其辞。

人的活动不仅决定了人的社会属性,也决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和心智属性。猴子只能采摘野果,而人呢,却可以种植水果。正是通过生产劳动,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又产生了社会属性和心智属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心智属性也就越来越完善和发展。所以,人性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一个人的实践活动方式越多样化,他的人性就越充实完善。有的学生觉得大学生活没意思,有的学生失个恋就要死要活,这些其实不是心理问题,而是人性不充实、不完善的表现。如何使自己的人性充实完善起来呢?就是让自己活动起来,而且要各种各样的活动。多读书、读好书,可以优化自己的心智属性;到社会上兼职打工,多与优秀的人一起活动,可以优化自己的社会属性;注意养生、生活规律,可以优化自己的自然属性。过去我们常说一个人“没人性”,是说这个人太坏;而现在我们了解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再说一个人“没人性”,是说这个人太懒,不愿动。所以,通过丰富学生的活动,学生的人性丰富起来了,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这样向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会让学生觉得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用。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突出教学的学理性,关键并不在于在教学过程中引经据典,而是对理论能够做出精准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既要注意科学阐释理论的精神实质,又要注意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解答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困惑,也就是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要紧密结合。很多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观点加例证的方式。先陈述一个基本观点,然后举一个具体的事例。这样做虽然有理论有案例,但是没有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给学生的感觉就是食之无味,也没有什么启发。就好像炒菜,把需要炒的菜都洗好切好放在了一个盘子里,却少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下锅炒。所以,最能体现高校思政课教师理论水平的,并不是看这位教师引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列举了多少案例,而是看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水平。

三、在教学积累上要注意持续“三个关注”

(一)持续关注学术前沿

时代在发展,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过去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

林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便于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因此,他的这一著作对于我国高校思政课教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以斯大林的观点为基础构建的教科书体系“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发展史中一次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深刻内容”;“没有贯彻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是一个东西的原则”;“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和科学认识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没有充分体现哲学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和创造性思维方法的性质、意义”。^④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认识。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就需要了解和掌握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例如,2018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单列一章来讲,要想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首先需要讲清楚价值的内涵。

在2018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对价值的定义是:“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是客体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⑤这一定义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观点为其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特性,但并没有充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价值问题的深刻认识。有的学者指出,旧哲学看到的只是物对人的有用性即“事实性价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揭示出价值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范畴——从人的生存意义到体现于社会关系的价值”。^⑥正如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⑦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性价值”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经济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通过分工劳动和市场交换,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马克思正是在分析商品二重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把抽象劳动称之为“价值实体”。正是在“价值实体”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结成经济关系。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础。

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又形成了人伦关系和情感关系。在通过经济活动满足个人基本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个人还需要处理各种层次的人伦关系,包括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在处理这些层次的人伦关系的时候,需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明确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当通过传统习俗、

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方式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道德与法律不仅是指引人们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也是建立在人伦关系层面上的社会性价值。正如习近平所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⑧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除了进行物质交换、行为评价外,还会进行情感交流。每个人都想通过社会交往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得到别人情感上的认同,于是就形成了情感交往关系基础上的审美价值。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把价值分为“事实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两种价值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劳动价值通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最终通过他人的购买和消费变为现实。子女孝顺父母的这种伦理价值,通过子女打电话关心问候父母、购买赠送父母喜欢的生日礼物等具体行为化为现实。审美价值通过消费书籍、音乐、电影、旅游等文化产品,与人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生活感悟等行为得以充分实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真实意蕴,再去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逻辑上更通顺,说服力也更强。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高校思政课教师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学术前沿,有助于思政课教师深入透彻地理解教材中的基本理论观点,有助于思政课教师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讲解教材中的重点难点。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想吃透教材、做好学理分析,就应该时刻关注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前沿。

(二)持续关注大事小情

许多高校思政课教师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惑:自己下了很大的功夫备课,对理论作了精辟的分析,也举了许多经典的案例,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却发现自己虽然讲得慷慨激昂,学生却是平静如水。许多高校思政课教师不禁感慨学生是一代不如一代,思政课越来越不好上。其实问题并不出在学生,而是因为思政课教学的学理性要想得到充分体现,不仅需要关注最新的学术前沿,也需要关注最新的社会热点。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注意用新近发生的国内外热点事件讲解理论,用理论解析新近发生的国内外热点事件,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又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魅力,从而热爱理论,爱上思政课。例如,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虽然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给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抗疫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党在抗疫过程中的坚强有力领导、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全国人民自觉在家隔

离等),所取得的成效以及通过与国外抗疫的举措和成效进行对比,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民族精神中的四个伟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教学内容提供了生动的素材。由于这些事情都是新近发生的大事,每个学生都会有强烈的在场感,高校思政课教师通过结合这样的大事来讲课,学生很难做到无动于衷。

大事要关注,小情也不能忽视。大学生在校园里面临着学习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人际交往能力差、自制力较弱经不起社会不良诱惑等各种现实问题。思政课所讲授的内容看上去都是些非常宏大的理论问题,似乎和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毫无瓜葛。实际上,宏大的理论问题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提炼出来的,反之,它也可以还原为现实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完全可以结合学生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小问题讲解宏观的理论大问题,并为学生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指导。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这部分教学内容就可以结合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来讲,“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部分教学内容就可以结合学生如何提高创新能力来讲,“掌握道德修养的正确方法”这部分教学内容就可以结合学生自制力较弱经不起社会不良诱惑的问题来讲。其实,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表面上看是心理问题、能力问题、情商问题,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人生观问题、理想信念问题、价值观问题,这些问题正是高校思政课教师所要讲解的问题,所以高校思政课教师不应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布道者,而应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贴心人,这样学生自然就会亲其师而信其道。

(三)持续关注技术进步

我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说法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非常适用。高校思政课教师与其他课程的教师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教学重点不是传授给学生具体的知识,而是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要影响学生的灵魂。但是“工程师”这一角色常常被高校思政课教师所忽略,时代的发展使思政课教学的技术含量日益凸显。过去,技术的进步主要是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教育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现在,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过去,高校思政课教师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就可以在课堂上完成教学了,后来可能需要加上翻页笔,现在可能需要加上智能手机了。

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思政课教学影响最大的两个变化就是“个人赋权”和“权威消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使大学生

获取资讯越来越便捷,而且使官方媒体、学校课堂不再是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思政课教师需要结合最新的资讯来讲解课程内容,然而在利用新技术获取新资讯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师可能还不如学生,甚至需要向学生学习。在信息匮乏和流动不畅的年代,权威的声音是学生对某个问题作出判断的主要依据;然而在信息爆炸和传播迅疾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学生更愿意以自己从新媒体上获取的信息为依据对某个问题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现在的高校思政课课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是思政课教师的一言堂,要给学生发言的机会,听取他们的观点。当高校思政课教师给学生发言的机会后,会发现学生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非常有见地,甚至对思政课教学都会有很大的启发。过去,许多高校思政课教师也会在课堂上找学生发言或回答问题,但由于课堂人数比较多,每次课能够参与的学生非常少。过去,高校思政课教师对学生的学业考评只能通过结课后的期末考试,对学生的平时表现则难以评估。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把智能手机利用起来,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学互动和考评的工具,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现在许多高校的思政课教学都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教学改革,熟练运用智能手机上课在不久的将来或许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想做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需要注意在教学内容上符合思政课的课程性质,在教学方法上做好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在教学积累上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关注大事小情、关注技术进步。做到这三点不仅可以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改善思政课的教学效果,也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① 刘建军.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八个统一”.教学与研究[J].2019(07):14.
- ② 金国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实现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19(09):14.
-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④ 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3-68.
- ⑤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6.
- ⑥ 鲁品越,王珊.价值是负载于客体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精髓[J].湖北社会科学,2015(05):20.
- ⑦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2.
- ⑧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01):6.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探究

邢 亮

【摘要】“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是高校有效开展“四史”教育、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新时代深化学校思政课改革的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的出台、高校数量充足且结构合理的思政课教师队伍、系统完善的思政课教学实施体系,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师资队伍和制度机制保障。“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要融入思政课课程体系,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融入思政课内容体系,有机渗透到思政课必修课程教学内容;开展“四史”教育专题培训,发挥思政课教师的关键作用;开展专题教学研究,以教学研究的高水平促进“四史”教育的高质量。

【关键词】“四史”教育;高等学校;思政课教学;贯通融合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高校思政课与专业课立体化协同育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CSZJ28)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邢亮,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烟台 26402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①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围绕“四史”教育“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的要求。中宣部、教育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实施方案》明确了高校要“确保学生至少从‘四史’中选修一门课程”。思想

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四史”教育是高校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性的重要途径。探索“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实践模式,是高校提升“四史”教育效果、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一)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是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政治责任和重要历史使命。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教育学生,武装头脑,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贯通起来,同开展“四史”教育结合起来。高校开展“四史”教育,需要发挥高校的教育优势和课程特点,针对学生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需求,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才能做到系统化、常态化和全覆盖、有成效。课堂教学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广泛有效地开展“四史”教育,需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利用思政课教学的特点和优势,把“四史”教育与思政课教学贯通融合,开设必修课程,融入教学内容,做到“四史”教育全覆盖、系统化、效果好。

“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是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我国高校现有思政课的课程体系虽然包涵“四史”教育的内容,但系统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四史”教育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对标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任务要求,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和中宣部、教育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实施方案》部署,高校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推进“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课程体系,推进“四史”教育内容融入思政课内容体系,推进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将“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促进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推进“四史”教育的有效开展,这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然选择。

(二)高校有效开展“四史”教育的需要

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是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必然选择。从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开展

“四史”教育主要有如下阵地:思政课教学阵地、历史专业教学阵地、新闻舆论宣传阵地、校园文化活动阵地、党员教育培训阵地、现场教学实践阵地、网络媒体信息阵地等。从这些阵地开展“四史”教育目标的明确性、内容的系统性、渠道的稳定性、师资的专业性、受众的广泛性来看,思政课教学具有系统性、稳定性、专业性与广泛性等特点,不仅是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开展“四史”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只有守住主阵地,用好主渠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主渠道畅通、多渠道并行,“四史”教育才能扎实推进、卓有成效。同其他教育阵地相比,发挥思政课教学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是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必然选择。

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有利于“四史”教育提质增效。一是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作为思政课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可以利用思政课成熟、完善的教学实施体系,有利于“四史”教育即时开展、有效推进。二是“四史”教育内容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有利于“四史”教育滋兰树蕙、润物无声。思政课必修课程不同程度地涉及“四史”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只有结合“四史”教育相关内容,才能讲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讲好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法治精神,讲清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选择与人民的选择,讲明国际国内形势与国家政策策略。三是思政课作为公共必修课程,“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有利于提高教育的覆盖面和有效性。与其他专业课程或宣传渠道受众面只有相关专业、部分学生不同,思政课是公共必修课程、铸魂育人的灵魂课程,受众面是全体在校大学生,授课内容有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的标准要求。“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有利于增强“四史”教育的大众性、内容的系统性、学习的必要性,提高学生对“四史”教育的认同感、学习的积极性、教育的实效性。

(三)高校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需要

思政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才能赢得学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群体,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③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想性、理论性与亲和力、针对性,做到“八个相统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学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思想理论基础,需要开展“四史”教育提供历史文化根基。开展“四史”教育,是高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教育系列重要论述、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举措,是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三观”、牢记初心使命的重要途径。“四史”教育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学体系,把“四史”教育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不仅是高校有效开展“四史”教育的需要,也推动了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

“四史”教育的有机融入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高校思政课的改革创新需要“适时”与“契机”,需要问题导向推动、需求导向拉动和时代要求驱动。“四史”教育的有机融入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更好地达成育人目标提供了新的契机。一是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新的视野。“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史育人,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做到“四个正确认识”,坚定“四个自信”。二是丰富了思政课课程体系与内容体系。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和中宣部、教育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实施方案》的部署与要求,从2021年秋季开始,高校要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这将推动高校进一步完善思政课课程体系。同时,根据“四史”教育内容,思政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予以适当调整、充实,实现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与“四史”教育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

二、“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可行性

(一)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方案为“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策依据

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我们党高度重视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四史”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与学习,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刻阐述和全面总结。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一起作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内容。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④ 2021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把“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开展“四史”教育,是事关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高校开展“四史”教育已经纳入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整体设计与实施规划。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高校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把加强“四史”教育作为构建理论武装体系的重要举措。中宣部、教育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实施方案》提出高校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确保学生至少从‘四史’中选修一门课程。”2020年,教育部已正式启动“四史”大学生读本编写工作。可以说,“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了顶层设计、政策要求和推进时间,为高校开展“四史”教育、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二)数量充足且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提供了师资保证

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思政课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中承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中坚力量”,^⑥主要职责是引导大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三观”,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情怀,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思政课教师仍是关键。

“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教师队伍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提供了师资保证。一是思政课教师队伍政治过硬,开展“四史”教育值得信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人格要正、自律要严”的基本要求,^⑦指导学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国家、省市和学校对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加大建设力度,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懂马列的人讲马列提供了政治保障。二是思政课教师队伍结构合理,开展“四史”教育能力胜任。根据现有高校思政课课程设置,担任思政课教师的学科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教育学、法学、历

史学等学科门类,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不同程度地包涵“四史”教育的内容,为“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了能力保障。三是思政课教师队伍数量充足,开展“四史”教育游刃有余。教育部明确高校思政课师生比为1:350,近年来各省市和高校加大了引进、培育思政课教师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提供经费支持,明确推进时间,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引进数量显著增长,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提供了组织保障。总体来看,“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思政课教师队伍政治素质优良、能力完全胜任、数量能够保障、教学条件具备。

(三)系统完善和成熟科学的教学实施体系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提供了制度与机制保障

我国高校经过长期建设形成了完善的思政课教学实施体系。我们党一贯重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不断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持续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在思政课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课程教材、课程评价、队伍建设、教学实施等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善、成熟科学的教学管理和运行体系,使高校思政课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为“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提供了制度与机制保障。

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有利于“四史”教育广泛深入迅速有效地推进。开设思政课是我国社会主义大学的特色和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探索建设,已经形成了系统科学的课程目标、课程体系、内容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和师资体系,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有序、系统科学、稳定有效地开展。“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开设专门的“四史”教育课程,把“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课程体系。二是渗透到现有思政课教学内容,把“四史”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内容体系。“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渗透到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借力思政课系统科学的教学体系,“四史”教育能够迅速开展、全面推进、系统实施,做到方法更科学、效果更显著、评价更到位,实现开展“四史”教育、深化思政育人的目标。

三、“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实践理路

(一)开设“四史”教育的选择性必修课程

提升对“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⑧高校开展“四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来讲“四史”教育目标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引导学生了解“四史”的演进过程,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严密的历史知识逻辑体系的支撑;二是把握“四史”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属性,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三是引导学生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正确认识”提供学理、学术与学科支撑。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要做到“四史”教育进思政课堂、进思政教材。一是开好“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按照中宣部、教育部《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要求,高校要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确保学生至少从‘四史’中选修一门课程”。《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实施方案》从2021年秋季开始实施,高校要整合全校教育资源确保按时、保质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并纳入思政课教务管理系统,规定课程的学时、学分和开课学期。二是编好选好“四史”教育教材。教育部已正式启动“四史”大学生读本编写工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将于2021年春季学期全面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高校要结合“四史”教育内容和思政课程特点,编写“四史”教育校本教材、辅助教材和课程大纲。三是围绕“四史”教育目标开展集体备课。开好“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起好步、开好头非常关键,同时“四史”教育本质属于意识形态教育,需要思政课教师爱岗敬业、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需要组织思政课教师统一备课和集体攻关,逐步探索开好“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的成熟经验与有效模式。

(二)发挥必修课程优势开展“四史”教育

“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内容体系与课程体系不可替代。根据中办、国办和中宣部、教育部的文件,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把“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课程体系,是高校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保证了“四史”教育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应该看到,“四史”教育课程定性为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程,“确保学生至少从‘四史’中选修一门课程”,从选课机制上不能确保全体学生选修全部“四史”教育课

程,不能确保“四史”教育的覆盖面和系统性,需要新的学习机制来弥补解决。因此,除了开设“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外,将“四史”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既充实了思政课必修课程的教学内容,解决了“四史”教育的覆盖面和系统性问题,又做到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这是“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应然选择。

将“四史”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各门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还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相关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其教学内容内在地包涵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主要内容是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与“四史”教育内容休戚相关,不联系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共党史,就讲不好理想信念问题;不联系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就讲不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了解近现代的国史、国情,认清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其教学内容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四史”教育的内容。“形势与政策”主要讲授最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策略,真正讲深讲透形势与政策也需要运用“四史”的大历史观和宏大背景来进行深刻分析。把“四史”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一是深入研究思政课必修课程和“四史”教育的内容体系,寻找教育内容的共同点和适时渗透的切入点,把“四史”教育相关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相关章节,使之成为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根据思政课必修课程和“四史”教育的内容特点,开设“四史”教育专题。专题教学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四史”教育专题既作为思政课必修课程的教学专题,又突出“四史”教育的主题,使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既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又与学习“四史”教育内容相结合,增强教育的学理性、历史感和有效性。

(三)开展思政课教师培训,发挥教师在“四史”教育中的关键作用

办好思政课的关键在教师,“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的关键仍然在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教育者先受教育”。^⑨“四史”教育课是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都很

强的思政课,又是新开设的选择性必修课程,无论是专门引进的“四史”教育专任教师,还是从原有教师中调整而来讲授“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的教师,抑或从“四史”教育课师资长远建设规划考量,都需要开展“四史”教育能力提升的专门业务培训,以提升“四史”教育教学水平。同时,思政课必修课程教师学科专业背景不尽相同,“四史”教育的意识和能力千差万别,要胜任把“四史”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开展教育教学的任务,必须对思政课教师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对标“六要”要求将“四史”教育能力纳入思政课教师的系统培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学,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六要”的建设要求,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是完善“三级”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基本形成了国家、省和高校三级联动的思政课教师政治与业务培训工作体系。要不断完善培训内容体系,把提升“四史”教育教学能力纳入思政课教师的业务培训中去,开展专题培训或综合培训,切实提升教师“四史”教育课程的讲授能力和把“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教学的实践能力。二是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提升思政课教师开展“四史”教育教学的能力。国家和省级教研课题的申报、教研成果的评审、教学比赛的开展等,要把“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能力与要求列入其中,树立明确的教学与教研导向。高校和相关学会要举办各级各类“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经验交流会、现场观摩会、理论研讨会等,推进“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研部要组织集中备课、集体攻关与教学观摩、教研活动,不断探索“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模式。

(四)开展思政课教学研究,以教学研究的高水平促进“四史”教育的高质量

教学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教学研究是有计划、有目的、主动探索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规律、原则、方法及有关教学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活动。育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之一,“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讲求方式方法。需要思政课教师结合教学实践,加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教学研究,做到认识规律与运用规律相结合、探索方法与讲究方法相结合,以高水平的教学研究促进“四史”教育的高质量。

开展“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规律与方法研究。加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研究、探索开展“四史”教育规律与方法要视野高远。一是历史教育的视野。“四史”教

育教学要讲清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四史”教育教学研究,坚持“四史”教育教学研究的真实性、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效性的统一。二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视野。“四史”教育不是单纯的历史知识教育,而是渗透在“四史”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教育,通过“四史”教育引导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坚定“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的视野。开展“四史”教育选择性必修课程,高校职能部门要研究如何“确保学生至少从‘四史’中选修一门课程”的选课机制,思政课教师要研究“四史”教育内容融入思政课必修课程内容体系的切入点,实现有机融合、有效教育。我国高校思政课普遍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政课教研部承担,开展“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理论研究,需要落实好四项工作:建立“四史”教育研究机构,打造研究平台,推进专题研究,促进教育教学;组建“四史”教育研究团队,成立研究专班,推进深度研究,提高教研水平;打造“四史”教育研究的“计划产品”,制定研究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根据培养目标和时代要求定期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计划产品”,避免思政课教师在教学研究上的单打独斗;推进“四史”教育教研与教学实践的有机统一,定期开展“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的观摩会、交流会、研讨会,使“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成为常态。

【参考文献】

- ①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1-09(1).
- ② 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7.
- ③⑦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 ④ 翁铁慧.加强历史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N].人民日报,2020-09-18(09).
-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2).
-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R].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2020年第46号.
- ⑧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96.
- ⑨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

思政课教学讲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新表述的若干思考

胡涵锦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新表述”,也就是把原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的变化,但是有着重要的内涵要求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深化,思政课教学内容不断作出相应的变化,是思政课教学发展的“常态”。思政课教师应不断增强“与时俱进”意识,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及时地融入教学活动中。结合思政课教学内容,深刻理解和注重发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所蕴含的“变”与“不变”、“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思想意蕴,并就思政课教学中如何讲授“新表述”,做一番深入的教学方法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思政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胡涵锦,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为《建议》),有着许多重要的论断和要求,需要我们学深悟透、弄懂做实。其中,《建议》的第二部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

目标”中,明确提出了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①这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作出的新表述,也就是把原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的变化,但是有着重要的内涵要求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如何在思政课教学实际中,全面、准确地讲授好这一新表述,是需要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的。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辩证统一:党的创新理论话语表述变化发展的基本依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和命题提出,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考察期间的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和确立,既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③我们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所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战略步骤,都是基于当下具体的客观实际,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都是为了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④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⑤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遵循,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客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同样,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据此,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从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也就是要把握好“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辩证统一。实践在变化,认识在深化,理论表述不可能“一劳永逸”,定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予以不断凝练和提升,进而呈现为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我们在每一个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一定要从当前的、现实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的这一教诲,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当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要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运筹帷幄”“谋篇布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建议》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个“全面”,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辩证统一思想深刻体现,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及时的。实践在发展、理论在深化,“一成不变”的思政课教学是不存在的。而及时地将与时俱进的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思政课教学中,是思政课教学的一种“常态”,深刻体现了思政课教学的基本特征和属性。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增强“与时俱进”意识,及时地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融入日常教学中。

二、深刻理解“新表述”所蕴含的 “变”与“不变”、“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思想意蕴

学习领会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作出的新表述,我们既要认识到新表述中的“变”,也要深刻理解其中“没有变”的要求;既要关注到有些内容的表述“没有变”,也要深刻理解其中有“变”的内涵。

(一)深刻理解“新表述”所蕴含的“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思想意蕴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变”了,但其地位作用以及协调推进的要求没有变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在开启历史发展新征程中,我们要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虽然有了新的变化,但依然是我们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依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⑥同时,我们要关注到,《建议》依然重申和强调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协调推进”的要求,并明确作为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变”了,但“一个目标,三个举措”的逻辑框架以及内在相互关系没有变

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有了新的变化,但“1+3”的逻辑框架,

即：一个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的架构没有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战略举措，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都不能缺、一个都不能少。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虽然有了新的变化，但其内在的相互关系没有变。“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⑦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因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⑧

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变”了，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的要求没有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顶层设计”，形成了一个诸多要素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我们要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表述虽然有了新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呈现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有机统一的要求没有变。《建议》的第三至第十四个大部分，着重阐述了实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12条重要举措。在第一、第五、第六等重要举措中，都有着“战略”上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学习领会五中全会精神，除了总体上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外，还应把握一系列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重大战略，其中包括：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以及一系列区域性重大战略，进而促进举国上下发展整体性推进。

（二）深刻理解“新表述”所蕴含的“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思想意蕴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个“全面”作出了新的表述，其余三个“全面”则沿用了原先的表述。我们在学习宣传中要深刻认识到，虽然有关三个重要举措的文字表述没有变，但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这三个重要举措的内涵是有新的要求的。初步概要地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

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⑩在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令,不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强调,要“提高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⑪2020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十四五”开局之年提出八项重点工作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强调要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⑫

2.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将基本建成。与这一目标相适应,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首先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实践中贯彻落实好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一个坚持”。这“十一个坚持”,既是重大工作部署,又是重大战略思想,必须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尤其是在“十四五”时期,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贯彻落实好这一实施纲要,就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3.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建议》指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进一步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坚持“全面”是基础、“严”是关键、“治”是要害。在发展的新阶段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要求,就是要推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在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思政课教学中深刻阐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变”与“不变”、“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思想意蕴,是一个基本要求,并不局限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也不是局限于个别的某一两门课程,而是对所有思政课教学都有这样的要求,在讲授党的创新理论的同时,应注重对学生科学思维方式方法的培养。

三、思政课教学中如何讲授“新表述”的理路与思考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了新表述,那么,原先的表述还要不要讲?如果还是要讲,又如何讲呢?

就历史逻辑、理路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思维要求而言,尽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了新的表述,但对原先的表述不能“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而是应该对学生讲清楚实践基础上理论发展的过程。显然,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讲”,而是在于“如何讲”。这也就是说,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要处理好新表述和原先的表述之间“孰先孰后”的问题。

就教学谋划和设计而言,大致可以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按照现有的教材(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顺序,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先讲授一遍,然后“补充”说明一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这一部分的内容有了“新表述”,并就此做进一步的阐释。二是在讲解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内容时,“先声夺人”“开门见山”,先讲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新表述,讲完以后,再“回顾”一下原先“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孰先孰后,原先教材内容和五中全会新表述内容,都要平衡协调好。既不能因为教材内容中原先表述相对熟悉,从而讲得“头头是道”“面面俱到”,而对五中全会“新表述”的内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也不能因为五中全会的“新表述”有“新鲜感”,所以就“林林总总”“滔滔不绝”,而对原先表述误认为已“过时”,就“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有了新表述,那么,这个新表述包括哪些基本的教学要求和内容呢?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目标,由原先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思政课教育教学,对于这个新表述,应该讲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什么样的程度?原先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教学逻辑体系,是分三个目,分别讲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以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现在要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新表述进行讲授,是否也可以依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教学思路,也分三个目,分别讲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目标”以及“路径”呢?

由于阐述新表述的新编教材还未出版,而现实中的教学进度还应照常进行,因此,尽快确定相关的教学内容,时不我待。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照三个部分来作讲解,规范、权威的内容,集中在第二个方面,即有关“目标”方面的论述,也就是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第一大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第3个要点,“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九个方面所作的明确的论述。值得关注的是,十九大报告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要求的论述,是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逻辑框架来谋划的,也就是依次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这五个方面提出了目标要求,^⑬而五中全会提出的九个方面,虽然有些内容也可以与“五位一体”来“对号入座”,但其要求和外延显然要丰富得多了。

总体来说,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目标要求,目前是有章可循的,而关于“内涵”和“路径”等问题,目前尚无“现成”的材料,亟须我们思政课教师和专家学者从总体上予以研究,确立一个基本内容。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有了新表述,而且在教学过程中这个新表述出现多次,那么,如何处理好“详讲”和“略讲”的关系呢?

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一个相同的范畴和命题,在不同章节内容中重复出现,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里主要探讨同一门课程中的重复问题,暂时不探讨不同课程中也存在的重复问题。)仍然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现有的教材中,明确提出、集中阐述,并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标题的,是第十一章。但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关的内容,却早于第十一章出现,例如,第八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八个明确”中,有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就占了三个,可见其分量是十分厚重的。问题在于:作为“先于”第十一章而是在第八章出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否先是“笼统”地,或“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提一下?还是就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详尽的讲授?当然,这里也涉及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何时“出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如果第八章已经把有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都讲了,那么,第十一章又如何来作专门的教学处理呢?这也是一个严肃的教学逻辑问题。

类似的问题在“概论”课的第九章中也有呈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表述,与十九大提出的“新两步走”战略,是紧密相关的。《概论》第九章的第二节,“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主要就是论述“新两步走”战略。而这其中的第一步,就是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表述紧密相连。那么,在第九章中是否要提新表述?如果要提,如何提?再进一步说,如果第九章已经有所涉及了,讲到第十一章了,又如何讲?这些都需要通盘考虑!

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而引发的思政课教育教学中问题,还包括,有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什么还要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统筹推进”,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协调推进”?如果已经讲授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如何讲授独立成章的“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教学内容呢?如此等等,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进行赘述了。

推而广之地说,在思政课教材中,出现内容“重复”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教师来说,不是去“修改”教材,或者说是简单地进行“避让”,而是如何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认真做好有效的教学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说,为了教育教学的完整性,同一个范畴和命题必要的重复还是需要的,但讲解的角度,相对的广度和深度则是可以作不同处理的。总之,与时俱进的

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的思政课教学,内在的要求和鞭策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也应与时俱进地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4.
- ②③⑥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2,24,25,23-24.
-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3.
- ⑤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 ⑦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2-3.
- ⑨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扭住关键鼓励探索突出实效[N].人民日报,2020-7-1.
- ⑩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15.
- ⑪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N].人民日报,2020-11-3.
- 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0-12-19.
- ⑬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亲和力研究

——以北京科技大学“纲要”课为例

张北根

【摘要】近年来,全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高校“纲要”课亲和力还有待提高。影响“纲要”课教师亲和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专业能力、知识面、教学内容时代化和生活化、课堂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教师的职业责任感以及人格魅力,都是影响亲和力的重要因素。北京科技大学“纲要”课自2007年开始改革以来,亲和力得到了学生的首肯,但影响亲和力的因素,诸如教师的言行举止、与学生的沟通、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教学时使用幽默桥段和网络语言、案例教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内容的充实等,还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亲和力;实效性

【基金项目】北京科技大学2019年教改项目“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亲和力研究”(项目编号:JG2019M5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北根,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083)。

“纲要”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本科课程设置的四门必修课之一。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文)。新课程设置方案由此从2005级学生开始试点;从2006级学生开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普遍实施。此后,一些高校开始关注和思考“纲要”教学改革问题,目的是增强教学的

实效性。而提高“纲要”课的亲和力,是提高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一、“纲要”课亲和力的涵义及提升亲和力的背景

亲和力,比喻使人亲近、愿意接触的力量。亲和力最早是属于化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特指一种原子与另外一种原子之间的关联特性,但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人际关系领域,指某人对另外一人具有友好的表示。亲和力的狭义概念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在所在群体心目中的亲近感,其广义概念则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对所在群体施加的影响力。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有学者认为高校德育亲和力是指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素质,通过优化德育环境,创新德育观点和德育内容,改进德育方法和德育评价机制,在德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亲近与结合的力量、一种心理需求能力、一种感染、凝聚、吸引、感召的力量;^①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吸引、亲近、融合教育对象的倾向或特征,以及教育对象对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产生的和谐感、亲近感。^②

而“纲要”课亲和力,是指教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持续优化教育过程,促使“纲要”课产生吸引力、感召力,让学生对“纲要”课教学活动产生和谐感、亲近感。^③亲和力所表达的是教师与学生心灵上的通达与投合,是一种基于教师平等对待学生的恻隐怀柔。真实的亲和力以教师善良的情怀和博爱的心胸为依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特殊秉赋和素养。

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这一观点后,教育界就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作为一种知识,通过学习和掌握这一知识就能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品格。于是教育者开始通过理论化、系统化的文本教学方式,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培养他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格。这样的文本灌输方式,不仅局限了“纲要”课教育的发展,也不能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纲要”课教育出现效用缺失。“硬性”的灌输理论难以传递下去,影响学生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和人格发展。

“纲要”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和方向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其服务的方向和半径,同时又反过来指导“纲要”课教学的议程设置,在其影响下缺少生活化,不够接地气,话语缺少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生动关照,无法满足大学生的内心需求,很难完全打开大学生的心扉,只会与大学生的现实需要“脱节”。由于“纲要”课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抽象晦涩,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又主要以朴实无华的方式进行理论解读,这样很难满足大学生的“胃口”。^④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纲要”课教师拥有掌握资源的优势。而在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下,学生获取的资源途径多样,削弱了教师的权威性。学生由于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易彰显自我个性,追求个性的不同。^⑤教师应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利用多媒体和网络用语教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纲要”课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大学生心灵的陶冶,精神境界的提升。^⑥

自从人类进入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元化。从个人价值看,除了传统的优秀价值观之外,还出现了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负面的思想,这些消极、腐朽的思想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提升“纲要”课亲和力能够帮助学生辨别是非,更加深入地理解及吸收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在面对多元文化时能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及价值选择,自觉形成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符合的价值观。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式需要不断改进。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用全新的、适合大学生的教育形式,使“纲要”课更加贴近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从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就成为当务之急。^⑦

大学生好奇心、求知欲强,但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价值观不成熟,情感心理不稳定;信息接收来源于移动互联网,形成碎片化、不成体系的知识结构,因此,急需通过提升亲和力,提升“纲要”课教学的实效性,帮助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系统的知识体系,发展其精神,提升其人格,照亮他们的人生。

“纲要”课教学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蕴含着育人和化人的双向功能,亲和力是促进“纲要”课教学成熟的重要因素。“纲要”课亲和力的提升,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可亲、可近的环境,学生乐于接受主流价值观,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的调和导向功能,产生正效应。“纲要”课教学实效性体现着内在教化力量的外显,亲和力是提高其实效性的重要源泉。提升“纲要”课亲和力,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又近了一步,学生会主动参与到教育实践中,呈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氛围,“纲要”课教学目标和结果的契合度就会得到提升。^⑧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纲要”课面临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陈旧、学生主体意识增强、社会思想多元化、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等新情况,因此,若要“立德树人”,发挥引领力的作用,必须提升亲和力,弘扬主流价值观。“纲要”课亲和力的提升,个体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学生的趋近感和参与意识就会提高。在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亲和力的感

召,会让学生在无形中产生愉悦的体验感,能够激发主体意识。

自“纲要”课在全国普遍开设以来,为增强课程吸引力和感染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问卷式教学、问题引领式教学、学生课前演讲与教师课上讲授相结合、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人物和事件点评、学生讲台授课、渗透联系教学、合作学习教学、建构主义教学、引导和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典型对比、联系实际、情感体验、历史对话、隐形教学等等,取得一定的效果。从国内“纲要”课教学同行的多次经验交流来看,总的来说,“纲要”课相比其他3门思政课,因其相对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其教学效果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肯定,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够,学生的抬头率还不是很高,人文精神的强化和人格的提升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其根源在于“纲要”课的亲和力不够。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⑨ 习近平的讲话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指明了方向。包括“纲要”课在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在“立德树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提高“纲要”课亲和力是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一环。

2017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陈宝生在答记者问时谈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亲和力不够、针对性不强”。因此,提高“纲要”课亲和力是高校思政课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纲要”课教师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进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善用高新技术手段、重视课外实践活动,努力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

三、提高“纲要”课亲和力的途径

提升“纲要”课亲和力可从通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进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善用高新技术手段、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着手。

(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教师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职业道德发生了转变。有些教师理想信念不坚定,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对我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缺乏自信;过分注重个人利益,教育意识淡薄,道德水平下滑,社会责任感减弱,逐渐形成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灰暗心理,缺乏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有些教师受到生活的压力,再加上科研和教学任务繁重,形成了职业倦怠心理,对学生缺乏关爱和关心,不愿意与学生沟通,不能平等地对待学生,缺乏亲和力。

“纲要”课教师提升亲和力,表现为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优雅的谈吐和大方的举止。在自觉自愿组织开展“纲要”课教学活动时拥有热情与激情,并作为自身价值去追求、去投入、去亲近、去奉献的动力,并将其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和使命,运用新方法、新载体,寓教于乐,增强学生愉悦体验,达到学生亲其师、信其道。^⑩

大学生思政教育离不开真理本身和教师富有亲和力的言传身教,离不开教师对真理的笃信以及追求真理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亲和力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获得的能力,在日常工作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亲和力。

首先,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素养。有些“纲要”课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没有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导致课上对基本理论的讲解不准确、不清晰,逻辑混乱,似懂非懂,无法吸引学生进入中国近现代史学习的佳境,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系统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教书育人,作为传道者的教师首先要“明道、信道”,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较高的政治素养,正确传道授业解惑,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针对性。“纲要”课教师的亲和力体现在所授课程既能展现理论的深度,又有人性的温度。理论知识经过教师的加工,基本原理可以变成生动的道理,进而吸引学生自觉主动地去了解、认同、信仰。教师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孜孜不倦地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不断积累、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将经典理论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理论功底扎实的“纲要”课教师可以用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人

文性和生动性,来打动、吸引和塑造学生,从而获得学生的欣赏、赞同和跟随。^⑪

其次,教师应加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军事学、外交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理论的学习,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达到知识的科学迁移,举一反三。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宽阔的教师自然谈不上有亲和力。教师授课时不仅具备本专业知识,而且应该博览群书,努力拓宽知识面,在讲授过程中旁征博引,给学生一种徜徉在知识海洋里的愉悦感。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文化学研究的是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与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军事学的研究任务,就是通过对战争和国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战争和国防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不断探索,预测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克敌制胜的原则、手段和方法。分析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提出国家防卫的原则、目标和措施,为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国防的准备与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及其影响下的精神功能和行为活动的科学,心理学包括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其研究涉及知觉、认知、情绪、思维、人格、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人工智能、IQ、性格等许多领域,也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家庭、教育、健康、社会等发生关联。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⑫以上这些专门知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方法的改革紧密相连,亦即与包括“纲要”课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课紧密相关,必须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教师只有具备丰富、渊博的知识,授课时才能对知识运用自如,而不是将中国近现代史讲成了干巴巴的时间、地点、背景、经过、结果的集合体,如此方能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亲和力。

再次,教师要多关爱学生。教师对学生的爱是一种大爱,主要是对学生生活的关心和学业的指导,在学生有困难的时候热心帮助。教师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力做到

育人和教书的融合。在言传身教中以良好的道德情操感染学生,帮助学生分析社会热点和理论难点,解除学生的各种思想、学习和生活困惑,走进学生的生活、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引导学生笃信和追求真理和人格,修身养性。今天的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作为教师,只有展现强烈的亲和力,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感受教师的关爱,才能不断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培养出更多的社会上需要的优秀人才。^⑬

(二)改进教学内容

必须以学生为本,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而实现这一转化就必须根据教材内容抓“重点”确立转化切入点。“纲要”课的教学重点是“两个了解”和“四个选择”,即了解国史,了解国情,懂得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和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是提升“纲要”课亲和力的重点内容;根据教学经验抓“难点”构建转化突破口。例如,根据教学经验,在讲授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以评估国民党抗战的状况为突破口,充分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根据学生思想实际抓“热点”寻找转化结合点。^⑭例如,在讲授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发现学生讨论的热点问题是“列强东来到底给东方人民带来了近代文明还是灾难?”教师应该以马克思的两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作为分析的基本素材,论证列强东来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灾难,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东方各国的发生和发展。

在体系转化过程中,一方面针对问题设计个性化教案,精选教学案例,合理使用多媒体,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度高的教学辅助环节,倡导师生心灵互动,另一方面要与传授理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将教学内容扩展到学生实践活动,这是提升“纲要”课亲和力的重要方法。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生态化空间,学生是这个空间的主导者,学生具有整个活动绝对的支配权和主导权,能够以自我和团队为中心,推动活动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谋求独立完成整个活动,而不是聆听教诲和听取指导。教师在综合实践活动这个生态化空间里,只是一个引导者、指导者和旁观者。例如,“纲要”课开展研究性教学,学生分组完成话剧、微电影、演讲等项目,效果较佳。这极大地提升了“纲要”课的亲和力。

“纲要”课教师在讲解与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脱离大学生的

学习生活实践活动。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性,否则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生的思想体系中陷入空洞与抽象的泥潭,也会让学生将思政理论课教师的定位仅停留在理论知识的传输者,难以使学生主动亲近。^⑮

(三)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论由教学方法指导思想、基本方法、具体方法、教学方式四个层面组成。

“纲要”课传统教学方法使用的是讲授法,即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发展学生智力的方法。它是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论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和公式,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讲授法的优点是教师容易控制“纲要”课教学进程,能够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系统的科学知识。但如果运用不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易发挥,就会出现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局面。

目前,一些高校的“纲要”课仍以讲授法为主。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不但不能吸引学生注意,也降低了“纲要”课教师的亲和力,最终使学生与“纲要”课产生距离感。

为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可以使用新颖、灵活的教学方法,例如,翻转课堂教学;研究性教学等。

“纲要”课翻转课堂教学,是指学生在课前或课外观看教师制作的中国近现代史小视频讲解,自主学习,教师不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知识,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合作探究、完成学业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教师课前制作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和问题的短小精悍的小视频,例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西安事变、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多数的视频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比较长的视频也只有十几分钟。每一个视频都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视频的长度控制在学生注意力能比较集中的时间范围内,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征;通过网络发布的视频,具有暂停、回放等多种功能,可以自我控制,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完成自主学习之后,学生们如果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仍搞不清楚,则可以在课堂上与教师、同学交流,在辩论中弄清事实,发现真理,得出科学的结论。师生平等交流、讨论、辩论,加强了互动和联系,增进了了解,由此“纲要”课也提升了亲和力。

“纲要”课研究性教学,就是以“国史、国情,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等内容为中心设计问题、专题或项目,创设一种类似研究的情境或途径,把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获得、各种能力的

提高、人格情感的升华、社会责任感的提升融入对专题的研究中。

“纲要”课研究性教学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的课题研究和项目的设计中有更多的创造机会,让学生在创造中感受成功的体验,在成功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注重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知识获取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从而激发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为主动探究奠定基础。^⑩

北京科技大学“纲要”课自2007年春开设以来,经历了多轮研究性教学的改革与实践。在学校领导和督导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课程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亲和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四)善用高新技术手段

随着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纲要”课教学方法也应该进行改革创新,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推动传统教学优势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纲要”课应善用高新技术手段,占领网络平台,掌握虚拟平台话语权。推动“纲要”课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新媒体、网络,结合专题网站、微文化等增强“纲要”教学的吸引力与时代感,起到以文化人、润物细无声的作用。^⑪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多媒体的视觉效果来进行教学,利用一些网站平台、公众号、订阅号等给学生推送一些高水平的文章、经典的案例、与教学相关的短视频等,让学生在课外依然成为课堂教学的参与者,努力开创教学的新局面。^⑫

目前的大学生绝大多数“00后”。他们成长在信息时代,思想活跃,视角相对广阔。新时代的学生几乎随时随地在网上,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原住民”,随时关注新鲜事物,喜欢看流行文化,喜欢和朋友们在网上交流,有个性,独立意识强。所以,“纲要”课教师应走近他们的生活,利用课上、课间、课余时间经常与学生沟通,深入了解他们的需要。教师利用网络、微信、学习类APP等新媒介,将传统的“纲要”课堂教学借助大学生熟悉的移动互联技术开展起来,实现教学方式从传统的灌输式为主向新的互动式为主的转变。课堂之外,教师可以将原来只能在课堂上展示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理论,扩展到更广阔的平台,供学生课后随时回忆、多次学习。^⑬

(五)重视课外教学实践活动

课外教学实践活动是提升“纲要”课亲和力的重要途径。要改变过去那种拘泥于理论教学的“说教灌输”方式,提高对高校实践教学重要性的认识,真正把课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到实践中去看、到“活”历史中去学,将书本教材和

“活”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的“三贴近”原则。“纲要”课教师也必须将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课堂外的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外实践中,学校可以与一些企事业单位、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部门合作,教师可以组织大学生参观烈士陵园、纪念馆、革命圣地等,让大学生们在参观、调研、学习中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课堂上、校园内、社会中“三合一”的实践教学模式,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研究活动注入无穷的活力。“纲要”课教师还可以结合自己的授课内容及大学生党校活动的情况,通过组织参观、专家讲座、访问调查、主题研讨、纪念日活动等多种形式,帮助大学生们了解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艰辛探索,了解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从而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⑩

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会逐渐喜爱“纲要”课,理解“纲要”课,懂得“纲要”课,最终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

四、“纲要”课亲和力效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北京科技大学“纲要”课自2007年开始进行研究性教学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12年5月获得“北京科技大学第25届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2年12月获得“北京科技大学精品课程”称号;2013年6月获得北京科技大学首批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称号;2015年1月获得“北京科技大学第26届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伴随着研究性教学的改革,“纲要”课亲和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19年12月2~3日“纲要”课程组对材料专业2019级2、3、4、6、7、8、10、11、12等9个班共249名同学分发“北京科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亲和力调查”问卷,有效回收249份。问卷主要从老师的亲近感;理论功底;文化素养;谈吐举止;语言幽默;使用多媒体;语言表达;案例教学;研究性教学;是否与学生平等相处、坦诚相待、沟通顺畅、关心学生;是否激发学生兴趣和提高人文素养等方面对“纲要”课亲和力进行了调查。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通过“纲要”课的学习,90.76%的学生认为老师的理论功底深,8.84%的学生认为比较深;90.36%的学生认为老师的文化素养深厚,8.84%的学生认为比较深厚;87.55%的学生认为老师的谈吐举止大方,9.64%的学生认为比较大方;87.55%的学生认为老师和学生平等相处,10.44%的学生认为比较平等相处;85.54%的学生认为老师和学生坦诚相

待,12.85%的学生认为比较坦诚相待;90.76%的学生认为老师跟学生沟通时采用的方法很自然地让人容易接受;65.06%的学生认为老师有一种亲近感,26.91%的学生认为比较有亲近感;54.22%的学生认为老师对学生关心,27.31%的学生认为比较关心;61.04%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语言幽默,27.71%的学生认为比较幽默;88.76%的学生认为老师能将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11.24%的学生认为比较能表达;96.79%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媒介,2.41%的学生认为偶尔使用;79.12%的学生认为研究性教学能增加“纲要”课的亲和力,13.65%的学生认为比较能增加;81.53%的学生认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所用的案例有吸引力,14.86%的学生认为比较有吸引力;71.08%的学生认为“纲要”课增加了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兴趣,17.67%的学生认为比较增加了兴趣;76.31%的学生认为“纲要”课的亲和力会增加学生的人文素养,15.66%的学生认为比较会增加;64.26%的学生认为为提升“纲要”课亲和力,希望举办校园诗歌比赛、征文、话剧巡演等活动,15.26%的学生比较希望举办这些活动。

总体上看,“纲要”课亲和力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2.81%的学生认为老师的谈吐举止一般;9.24%的学生认为老师跟学生沟通时采用的方法是例行公事般的进行;7.63%的学生认为老师的亲近感一般;17.67%的学生认为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一般;9.64%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语言幽默一般;3.21%的学生认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所用的案例的吸引力一般;9.24%的学生认为“纲要”课只是一般增加了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兴趣。针对这些问题,课程组准备采取以下对策:第一,要求教师注重言行举止,做一个真我的人,能够严于律己;做一个严谨的人,能够约束自己;做一个气质高雅的人,能够在淡泊中修身养性。第二,加强与学生的沟通。“纲要”课教师与其他专业课教师有所不同,不仅要对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要对他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课上传授理论知识的时候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还需在课下和学生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系,既要做一名学生们课堂上的良师又要成为学生们课下的益友。在与学生的沟通过程中,从关爱学生的角度出发,对学生不责备、不抱怨、不攻击、不说教,互相尊重,绝不口出恶言,不说不该说的话。第三,师生互相信任地接近。第四,多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问题和困难。第五,关注互联网中出现的幽默桥段和网络语言,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第六,在教学中使用适合的案例,目标是启发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争论和进一步探索。第七,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内容的充实,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兴趣。

五、结 论

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专业能力、知识面、教学内容时代化和生活化、课堂教学方法、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职业责任感以及人格魅力,都是影响亲和力的重要因素。教师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拥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广阔的知识面,改革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贴近时代和学生生活,加强与学生沟通,关心学生的成长,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如此,方能提升“纲要”课的亲和力。

北京科技大学“纲要”课自2007年开始改革以来,亲和力得到了学生的首肯,但在教师的言行举止、与学生的沟通、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教学时使用幽默桥段和网络语言、案例教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内容的充实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 ① 李春.新时期高校德育亲和力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14.
- ② 陈桂蓉,练庆伟.反思与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价值和定位[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5):23-27.
- ③ 唐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及其内在逻辑研究[J].学术论坛,2018(6):170-175.
- ④ 马云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亲和力的提升策略探析——基于新媒体视角[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3):177-179.
- ⑤⑧ 黄丽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探析[J].现代交际,2019(9):167-168.
- ⑥⑦ 刘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591):15-17.
- ⑨ 习近平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www.mod.gov.cn/leaders/2016-12/08/content_4766073.htm.
- ⑩⑰ 刘茂玲.“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结构、纬度与形成策略研究[J].智库时代,2008(13):51-52.
- ⑪⑱ 白衣丽娜.教师角度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和针对性的路径研究[J].河套学院论坛,2019(1):1-3.
- ⑫ 王道骏,王汉澜主编.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
- ⑬⑱ 李静.简论新时代教师如何提升亲和力[J].当代教研论丛,2019(2):40.
- ⑭ 郭正红.“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概论”课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转化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6)80-82.
- ⑮ 刘云,刘梅,孙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亲和力提升路径研究.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11):73-78.
- ⑯⑳ 张北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178-179.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探析

李 建 刘羽曦

【摘要】 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就是要抓住思政课本质属性与任务,在高质量集约发展中落实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价值功能。新时代下全面提升高校思政课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要深入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本质意蕴,锁定新时代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结构要素。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把稳发展之舵、建设优质教师队伍落实育人使命、推动机制创新支持课程发展、建立考评体系助推教师成长共同发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 思政课;立德树人;内涵式发展;建设路径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思政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以‘概论’课程为例”(项目编号:JG20180308)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治理资源的开发”(项目编号:2072020103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李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羽曦,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办好思政课关系着高校学生的个人成长与成才,更关系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大问题。新时代呼唤新思政。立足新时代发展的新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318”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着重提出了“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要求。高校思政课是“担负着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需要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了“注重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要求。^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全局性安排，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②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实现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意蕴

内涵式发展是党和国家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对高校思政课提出的新要求，更是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应新使命而行、应新挑战而生的优化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③履行中国高等教育育人使命，促进国家对高校思政课程预设功能的实现，需要紧紧抓住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中心环节”和“关键课程”的功能定位，深化思政课程内在要素的改革创新，推动其实现“内涵式发展”。

（一）内涵式发展要突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功能定位与根本价值的统一

高校思政课不是简单的知识教育，而是在把握人的思想意识形成、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须紧紧把握党中央对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功能定位，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上突出思政课程“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价值。^④立德树人“关键课程”功能定位与根本价值的统一，是高校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的要求同高校“立身之本”融于思政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内生性前提，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就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中国大地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完善课程育人机制，在深化课程改革创新中增强高校思政课的穿透力、感染力和亲和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培养德才兼备

的接班人。

(二)内涵式发展要凸显知识育人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高校思政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载体,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高校思政课寓“教书”和“育人”为一体,展示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成果,是国家实施人才培养工程的基本单元。就其内容而言,其具有丰厚的思想性、显著的理论性、充分的科学性特征。这种特征同党的教育方针和新时代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凸显出知识育人与价值引领的导向作用。课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政课的内容理论性较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感抽象难懂,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着眼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实践,站稳立场、把好原则,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用强大的真理力量引导学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让学生真学真信、愿学爱学并从中受益。学生在理性思考和分析研判中汲取智慧,提升自身认知能力和思维素养的同时,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同感,坚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充分发挥作为新一代生力军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知识育人与价值引领的统一在高校思政课教师教授的每一门课程之中彰显着其内涵式发展的价值意蕴。

(三)内涵式发展要坚持高质量集约发展与协同互动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政策鼓励、支持、引导下,全国高校纷纷设立教学试点,思政课改革如火如荼,创新发展出一大批形式多样的品牌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思政课程教学与学生认知感性化之间的矛盾,但也出现了大量粗放发展和泛娱乐化的改革倾向。为了提升课堂抬头率,有的教师一味从学生喜好出发,高举改革大旗粗放“创新”,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分散与浪费,更严重背离了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要求。内涵式发展绝非忽视思政课程的思想性而过分追求外在形式的创新,其要义在于始终坚持高校思政课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方向,通过优化自身内生要素和结构,合理利用外在发展条件,才能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活力,落实时代赋予高校思政教育立德树人任务。任何抛开内涵建设谈创新,或将高校思政课当成迎合时代改革大潮时髦的佐料和配菜,都是一条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邪路,都不可能实现思政课真正的内涵式发展。在实践中,高校思政课融思政与社会课堂于一体,寓思政课堂与课堂思政于一身,其内涵式发展还需要做好与其他主体的协同互动。所以,一方面

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打造高校师资共同体。通过思政教师共同开发教学资源、编写适用性教学材料,实现思政课教师备课的集约化和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相辅相成。通过利用校内资源如校园广播、校园报纸、校园杂志等宣传媒介来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同时整合校外资源如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展览馆等文化场馆来打造社会理想信念教育阵地,形成资源融通、机制协调并共同发力、协同互动的大思政格局,使思政课以鲜活的时代感、严谨的学理性和丰富的实践性发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全方位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结构要素

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其发展也有多种表现方式,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手段的信息化、课堂规模的小班精英化、教学方式的专题化以及上述多种方式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思政课综合效益的提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新需求,迫切需要高校思政课从传统的形式改革的外延式发展走向更深层次的内涵式发展。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应当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科学处理好包括价值目标、师资队伍、学科支撑、育人体系等在内的多个要素,增强高校思政课使命担当和育人功能的内在动力。

(一)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

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是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思想之基与价值目标。高校思政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在学生思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⑤高校思政课集聚着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而非掘墓人的使命担当,体现着党和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的坚强意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是党和国家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提出的战略选择,其目的在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因此,各高校必须把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提到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后继有人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必须

牢固坚守而不可偏离的价值目标。唯有如此,才能使之在实践中外化为相应的教学文化和理念秩序,使学生在思政课教学的人文关怀中增强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薪火相传保驾护航。

(二)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

“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⑥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和立德树人的双重任务,他们既是知识、思想和真理的传播者,又是铸魂育人的工程师,使命重大而神圣。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和育人水平高超的德才兼备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是“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关键。推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是核心要素,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规模适度且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社会进步及人才培养需要的队伍尤为重要。教师队伍在科研工作中所展现出来的专业素养,以及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所展现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与周边的人,进而以“润物细无声”般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因此,必须把教师作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关键,通过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建设,做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引导学生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在内涵式发展中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大学生个体认识、经验、评价和习惯行为”,^⑦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三)高标准的一流学科支撑

学科建设是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基石和平台。根固则枝盛。高校思政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基础,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具有学科发展与追求人民幸福生活和国家的繁荣发展紧密联系的特点。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致力于实现培养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和引领时代进步的精英人才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其在发展中必须对标国内外一流高校标准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流学科。这不仅要求高校思政课要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跟党的最新理论、方针、政策,凝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点,避免片面追求课程设置的“泛”挤占其他学科的发展空间,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思政课堂内容的“精”使其更具针对性、阶段性和实践性,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生命力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以高标准的一流学科支撑,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还

要主动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强化顶层设计,突出学科特点,厘清学科实际,弥补学科短板,筑牢学科优势,推动中国特色高校思政课程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的融合,为党和国家真正构筑一个根基稳、信念牢、质量高、作用大的思政课程内涵式发展平台。

(四)完备的思政课程育人体系

在教育部强调的优化结构、内涵发展主导思想下,完备的高校思政课程育人体系是落实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的保障。围绕立德树人任务和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八个相统一”工作要求,完备的思政课程育人体系应包含思政课堂课程育人、实践思政课程育人、网络思政课程育人在内的“三位一体化”思政课程育人体系。其中,思政课堂课程育人就是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引导,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加快思政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上改革创新,提高思政课堂质量。实践思政课程育人就是要突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和“满堂灌”型教学模式,丰富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使思政课堂内容走出书斋,融入现实生活,在思政课程实践中使课堂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隐性价值取向。而网络思政课程育人就是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展网络平台,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以学生为主体、思政课教师为主导、研究型教学为核心的思政课“网络课堂”,从而形成线上线下融通的思政课堂网络阵地,掌握网络育人主动权。“三位一体”的育人课程相互促进,在融合应用中将高校思政课堂教育元素和育人功能覆盖到课程育人的全部领域,形成课内课外互动、线上线下融通的一体化的完备思政课程育人体系。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建设路径

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目的提高其立德树人的实效性,而这从根本上取决于思政课程内涵式发展的程度。作为一个复杂而又相对独立的立德树人关键课程,高校思政课改革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其建设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实践表明,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越深入,其思想性、科学性、理论性越彻底,立德树人的实际效能就越能得到体现。新时代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需要在把握其发展规律性基础上,做好如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党对思政课的领导，把稳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之舵

加强党对高校思政课的领导，既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又是推进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保障。一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高校作为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学术风潮的重要阵地，在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因此，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就要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开展，把稳高校思政课发展之舵，确保课程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深入推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二是发挥好领头羊的带头作用。为避免学科发展出现偏离，高校党委要把握好顶端设计，摆正新形势下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上。要建立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建设机制、明确责任、理清思路、形成合力，坚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三是把握党在思政课意识形态中的领导权。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推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利用好“马工程”高校思政课教材，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政治引领，担负起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和传播的重任，用科学理论培养人，用正确思想引导人，不断提高高校思政课对青年大学生的引导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育人体系。

（二）落实立德树人使命，建设一支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

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高校思政教师承担着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水平的重任，更肩负着新时代培养社会德才兼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⑧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使命，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一是教师队伍建设要直面时代问题，落实党中央对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提出的“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新要求，坚持学生主体地位，因材施教，在三尺讲台上建立良好思政课政治生态，使高校思政课教师真正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知识传授者、思想引领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护航者。二是把教师作为加强思政课建设的关键，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建立以师德师风建设为核心，以党委教师工作部和教师发展中心为平台，以高层次人才建设、青年教师培养、潜力人才支持为抓手的立体化教师培养支持体系。为保证队伍政治素质，要严把思政课教师队伍“入口关”，确保新进教师政治

过硬、思想端正、师德师风优良。三是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鼓励思政课教师挂职锻炼,引导思政课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普及,深入了解国情、社情和民情,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四是重视思政课教学技能的提升。为提升各高校思政教师教书育人的能力,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支持各地各高校搭建课程思政建设交流平台,分区域、分学科专业领域开展经常性的典型经验交流、现场教学观摩、教师教学培训等活动”。各高校应通过组织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组织“教学帮帮团”、创建“青年教师技能提升工作坊”、组织专家团队为课程教师磨课等途径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技能。五是要完善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成长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程度前所未有。为补充师资力量、尽快配齐思政课教师队伍,近三年来各高校在短时间内大量招兵买马聘用刚刚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政课教师队伍集中和扎堆现象,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课程资源分配不均,同一梯队人才培养“道路拥挤”等问题。对此,各高校要着眼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长远定位,尽快制定、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破除“五唯”现象,形成年龄、学历和科研成果相结合的多元评判方式,拓宽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职称晋升和快速成长渠道。

(三) 加快创新驱动,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机制创新

高水平的课程质量、丰富的教学内容和灵活科学的育人机制是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保障。思政课改革内涵式发展需要构建以一流学科为支撑、课程质量为核心、体制创新为动力的现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机制。一是在教材体例基础上,着眼于当代大学生差异化和自主学习需求,采取灵活的专题教学,改变流水账式、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将传统教材上的思政课内容转化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现代传播形式呈现出来。着眼于新时代思政课立德树人任务,淘汰媚俗化、低俗化和庸俗化的“水课”,打造一批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高度统一的思政“金课”,在“守正”与“创新”中提升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实效性。二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发掘校园优势师资共享资源,鼓励高校其他专业、学科高层次人才更广泛地参与到思政课程育人格局中,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共同发力、协同共进的现代思政课程体系。如厦门大学自从2018年开始推进“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立项工作,编写教学案例,开展经验交流,增强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研究生院、教务处联合相关学院,对这些课程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进行

宣传推广,引导所有任课教师都挑起“思政担”,让所有课都上出“思政味”,推动我校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浓厚氛围。三是以问题链为突破点,打破高校各门思政课程因独立开设而造成的横向无张力、纵向缺深度的窘境。各思政课程教学要突出其在教学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设置上的统领作用,建立以问题链为突破点,思政教学课程横向配合与纵向衔接相结合的内涵式发展教学机制,营造齐发声、凝合力的课程建设局面,在“主导”与“协同”中发挥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整体效能。四是打破高校“全包式”育人模式,推动建设各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⑨要求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教育活动中共同承担责任,合理利用各方资源进行有效联动,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尤其是针对目前高校思政课堂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家庭与学校共育意识不强、家风道德教育薄弱、学校与社会精神引领不足等现实问题,搭建学校、家庭与社会协同育人的合作互通平台,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共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实施多维考评,建立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

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是衡量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发展状态及立德树人功能实现程度的标尺。推进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必须建立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符合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规律的考核评价体系。一是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师德师风是考核评价体系的第一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⑩“树人”首先要“立德”,思政课教师自身职业道德和行为操守直接关系着高校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关键。在岗位聘用、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工作中,遵循师风师德一票否决制,净化教师队伍。二是围绕思政课程育人功能,制定融合质量、结构、规模、效益为一体的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法科学的课程教学育人评价机制。在考核教师的教学情况时,抓住思政课程质量这一核心,破除长久存在唯论文、唯学历、唯头衔、唯奖项、唯课题等弊端,建立教师教学多维考评、学生学业过程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三是发挥思政课程考核对学生开展主动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倒逼作用,将课程思政的执行情况、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全面跟踪评估学习成效,健全以思政课程立德树人功能为主线,能力与知识并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的思政课程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四是运用科学手段,借助互联网及思政教学大数据等先进信息化手段,突出育人导向,重视育人效果,建立以常态数据监测和多维教学质量评估监控为抓手的课程教学跟踪评价机制。健全

考核、反馈、评价制度,完善思政课程组织、政策、经费等保障,构建完整的思政课程内涵式发展的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9-8-15.
- ②⑨⑩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0-11-4.
- ③④⑥ 习近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2019-3-19.
- ⑤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9-23.
- ⑦ 温兆标.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21.
- ⑧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北京:求是,2020(17).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研究述评

刘攀

【摘要】近年来,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已成为一个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理论界对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提出的深刻背景与重大意义、基本内涵、标准、类型及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的原则方法与具体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刘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2018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第一次提出要建设“金课”。“金课”概念的提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契机。学界对思政“金课”提出的深刻背景与重大意义、基本内涵、标准、类型及建设思政“金课”的原则方法与具体路径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对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八个相统一”,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更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性作用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思政“金课”提出的深刻背景与重大意义

(一)思政“金课”提出的深刻背景

有学者认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诸多问题:学生参与度低;学生获得感低;课堂内容缺少“思政味道”;考核方式单一化。^①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部分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不起学习兴趣,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自己的专业课,是一种“要我学”的课程,课堂气氛沉闷压抑,学生“抬头率”不高,教学效果不佳。在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背景下,提出建设高校思政“金课”,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高校学生心中喜爱的关键课程、真正能对高校学生起到思想塑造和价值引领的作用。^②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其他渠道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系统化整合、导向和示范作用,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大学本质特征的标志性教育渠道。”^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关键。然而,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存在“主体缺位”的情况:教师讲解理论时照本宣科,灵活性不强;还有些教师不顾课堂纪律致使课堂教学管理混乱。^④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应运而生。^⑤

还有学者认为,重视政治建设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修养,召开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创新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级会议,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置于政治安全的高度看待。由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不仅仅是一门课的事,而是事关“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提出了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⑥

(二)思政“金课”提出的重大意义

有学者提出,思政“金课”,不仅可以解决学生的到课率和抬头率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真正深入学生内心,高校学生通过思政“金课”,既提高了思想境界,又树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⑦

长期以来,不少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机械的、呆板的、陈旧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实践性不强,教师的授课内容与学生的期望不匹配。^⑧有学者通过调查,“50.4%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一般,提出希望增加实践教学比例,改进“灌输”的教学模式。”^⑨思政“金课”的提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听课体验,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重大意义。^⑩

有学者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这一角度指出,建设思政“金课”,能培养学生新时代“主人翁”意识。从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走出去的青年,能够更立体地认识现实,并且有意识地自觉承担起新时代青年的使命。因此,思政“金课”在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上具有积极意义,这并不仅仅关系到一场教育“革命”,也会对未来中国的战略布局产生深远影响。^⑪

还有学者从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角度提出,伴随着成长于网络技术快速发展时代条件下的“千禧宝宝”开始进入高校学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果继续因循守旧,必然达不到立德树人的目的。“00后”大学生“自带网络基因,拥有个性需求,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实现,具有独一无二的代际特点。”^⑫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供给侧来看,需要建设思政“金课”,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同新时代大学生成长规律相契合。可以说,提出建设思政“金课”是教育的供给侧改革。^⑬

二、关于思政“金课”的基本内涵、标准与类型

(一)思政“金课”的基本内涵

思政“金课”内涵丰富,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金课”的科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高阶性是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创新性体现在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的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的探究性和个性化三个方面;挑战度指课程要有一定难度,需要教师花时间、情感、精力备课讲课,学生课上课下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和思考做保障。^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理解思政“金课”的“两性一度”,认为在高阶性上,要以培养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魂,加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和担当使命的历史思维的教学含量;创新性上要构建学生真心喜爱、倾心参与的教学情境为形,在思想内涵上做“加法”,在授课谋划上做“减法”;挑战度上要涵养学生知、信、行相统一的人格品

性,不断提升教学视角鲜度,使学生由“知”成“信”,由“信”躬“行”。^⑮还有学者认为,思政“金课”的高阶性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导向,培养的人才兼具科学精神、思想修养、探索精神、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创新性上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各学科和专业的协同创新,凝练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基因,借学科视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延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挑战度需要合理提升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实效导向等于一身,真正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⑯

有学者将“金课”与“水课”作对比来抽象出思政“金课”的内涵,认为“金课”是相对于“水课”提出的。“水课”,顾名思义,指教学内容陈旧,教学过程缺乏深度,课程枯燥乏味,课堂管理宽松,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获得感”。而思政“金课”,从本质上讲,以课堂为核心,涉及课堂内外、课程始终,培养学生高阶思维,提升学生素质,通过思想政治理论涵养、塑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⑰陆国栋提出“金课”是高质量课程的统称,除涉及课堂内外、课程始终外,还增加了师生角色、考核评价。^⑱

有学者将目前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密切相关者划分了四种类型:设计者、观赏者、讲授者、接收者。在探寻上述四种视角共性的基础上将思政“金课”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1.政治高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自身特殊的目的与要求,同时还要有纪律约束。2.内容为王。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还要融合多学科,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状态。3.讲授艺术。教学是一个“艺术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集编、导、演、剧务于一身,每个角色都必须“专业”。4.环境营造。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适应国家、社会的大环境,积极争取学校、互联网等中环境的改变,增强教师和学生小环境的主观能动性。^⑲

另有学者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课程教学理应具有新的内涵。具体到思政“金课”,在目标层面要准确把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在人格层面,不仅要培养学生健康健全的人格,青年学生还要努力成为人格榜样;在价值层面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进行培育,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构建和引领学生的精神世界、人文情感、人格品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作用。^⑳

(二)思政“金课”的标准

有学者认为,建设思政“金课”需要达到政治性、高阶性、创新性三大标准。政治性是思政“金课”的方向保障,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高阶性是思政“金课”的质量保障,提升课程挑战

度,使学生实现知识、能力、素养的全面进步;创新性是思政“金课”的发展保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持续性提升保驾护航。^⑲

有学者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提出“金课”的主体性、基础性、科学性原则。延伸至思政“金课”,则应该具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激活学生学习动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根据教学目标难度层次的差异动态进行设计、以全脑教学为支撑导向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三个标准。^⑳有学者从学生的角度提出教师授课水平、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程成绩是学生评价课程质量的主要因素。具体到思政“金课”,需要达到如下标准: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授课水平高超,业务能力强。2.教学内容新颖,实用性强,知识丰富。3.教学设计合理,同时兼顾到课堂要求和课后作业。4.考核标准“宽严相济”。^㉑有学者从思政“金课”与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内在关联分析,认为大学生担当精神状况是衡量思政“金课”的重要标准。^㉒还有学者以美食烹制进行类比来阐释对思政“金课”标准的理解。厨师烹制出来的“作品”能否得到认同离不开以下基本要素:需要、食材、厨艺及环境。由此推及,一堂思政“金课”也应当涵盖针对性的需求、丰富的内涵、有效的方式方法、良好的环境(课堂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㉓

有学者则认为,吴岩司长提出“金课”应具备的“两性一度”是思政“金课”要努力达到的标准。^㉔与其他学科相比,思政课还具有塑造“三观”的任务,所以思政金课除应符合“两性一度”的一般标准外,还应具备政治性与理论性双强、艺术性与引领性并重、前瞻性与实践性兼有等标准。^㉕

(三)思政“金课”的类型

根据教育部提出的下大力气建设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五大类型“金课”,学界对思政“金课”类型的探究基本上是围绕上述五种类型展开的。有学者认为,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下,线下思政“金课”将改变原有的“满堂灌”教学风格,课堂形式多样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学生共同开发课程教学,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魅力指数”;线上思政“金课”借助“互联网+”,整合优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学生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实现“个性化定制”;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金课”是对师生双主体教学的具体化,学生成为知识体系的“建构者”,教师成了引导学生的“脚手架”。最具代表性的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虚拟仿真思政“金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现代教学手段和技术的结合,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一种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典型事件高度相似的数字化环境,使学生足不出户就能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活动;社会实践思政

“金课”通过调研、宣讲等形式引导师生在亲身实践中增长知识才干,树立家国情怀,拓展了“知”与“行”相通的渠道。^⑳

有学者结合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将专题讨论、案例分析、课堂辩论、课题报告、读书报告等形式融入思政“金课”五种类型之中,以此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体性,真正让同学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既兴奋、又信服,达到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效果。^㉑

三、关于建设思政“金课”的原则方法与具体路径

(一)建设思政“金课”的原则方法

有学者提出,建设思政“金课”要转变脱离实际的空讲,内容既顶天更要立地,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至柔至刚、滋润万物的精神力量融通教师的每一堂课,贯穿学生的每一步成长;要重新整合教材内容,融入时代元素,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彰显向上的主流价值取向;要实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由课堂走向社会,注重搭建学生个性化学习平台,特别关注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和方法。^㉒

有学者认为,重点要从师生良性互动、关注“教”与“学”的过程、严格要求学生三个方面建设思政“金课”。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从“填鸭式”的灌输转向师生平等对话,从知识的单向传递向多向交流转变;有意识加强学生过程性考核的比重,通过课堂实践、论文写作、分组讨论等形式扭转学生功利化的学习心态;严格管理学生,不能模糊教师与学生的边界,要成为互相促进的教学共同体。^㉓

有学者总结,建设思政“金课”需着力打造“金师”、熔铸“金芯”、增进“金智”。^㉔以鲜亮的思想底色保障思政“金课”的成色;以鲜明的育人底线框定思政“金课”的航线;以充足的职业底蕴丰富思政“金课”的意蕴;以十足的自信底气接通思政“金课”的地气。^㉕

还有学者聚焦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探讨了建设高职院校思政“金课”的原则方法:1.转变教学观念,形成“金课”思维。2.提升教师水平,铸造“金课”基础。3.重构教学模式,对标“金课”标准。4.加强教学管理,提供“金课”保障。^㉖另有学者着重分析了建设公安院校思政“金课”的方法: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突出忠诚教育。2.推动教师队伍建设,课程突出公安特色。3.理论讲述与课余实践活动相结合,把铸魂育人落细落实。4.理论与实战相结合,使思政教育入脑入心。^㉗

(二)建设思政“金课”的具体路径

有学者提出运用“蓝墨云”教学平台来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思政“金课”。“蓝墨云”是一款即时反馈教学互动工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通过“蓝墨云”平台进行“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的教学活动。课前阶段以学情分析为核心;课中阶段以师生互动为关键;课后阶段以针对性辅导为重点。通过全方位的大数据分析,提升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研判,课下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辅导。^{③⑥}

有学者从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融合的角度提出通过精品思政慕课、课堂革命、教师教学共同体来建设思政“金课”。建好精品思政慕课是建设线上思政“金课”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品思政慕课的运用,一方面可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倒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进自身的课堂教学;推动“课堂革命”是建设线下思政“金课”的有力抓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开展“翻转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构建教师教学共同体,发挥教师专长,为思政“金课”建设提供师资保障。^{③⑦}思政课教师需不断优化思政课教学内容,可从网络热点素材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找准网络热点素材与思政课的契合点,使思政课紧跟时代节奏,“叫好又叫座”。^{③⑧}有学者专门就疫情防控期如何打造线上思政“金课”作了有益探析,一是制定接地气的教学方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取长补短;二是“共享老师”,不拘泥于一种学习方式;三是充分利用成熟的思政慕课资源。^{③⑨}

有学者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协作学习”视为建设思政“金课”的一条具体路径。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例,通过“师生共建历史坐标系”的方式,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协作学习”的有机融合。无论是教师、助教还是学生,都是打造这个“历史坐标系”的重要主体;教师要能化整为零,将课程的大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小目标;助教要能推动探究,将小目标落实为小组内部的协同并进;学生要能充分倾听,营造信息共享的学习共同体。^{④⑩}

有学者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八个相统一”总体要求的角度,提出运用“专题化设计+问题链导向+参与式互动”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来建设思政“金课”。专题化设计,帮助学生实现思政知识体系化;问题链导向,层层深入引发学生思考;参与式互动,让学生真正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④⑪}以“八个相统一”为原则打造思政“金课”,具体以“内容创新”为核心,构筑思政课的课程根基;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构建线上线下思政课学习平台;以“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为目的,构建多维思政课评价体系,真正把思政课打造成学生终身受益的“金课”。^{④⑫}

还有学者认为,混合式教学、转化教室场景也是构建思政“金课”的有效路径,通过学生全程参与整堂思想政治理论课来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团队协作的能力。^⑬另有学者结合自身学校特点探讨如何建设思政“金课”,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立足于法学强校的特点,依托其辩论比赛的悠久传统,将辩论式教学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达到引发学生问题意识和思辨精神的目的,以此形成一堂入脑、入心、入行的思政“金课”。^⑭

四、关于高校思政“金课”研究成果的评析

理论界对思政“金课”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条件下建设高校思政“金课”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思政“金课”研究成果的梳理,作以下几点述评。

首先,思政“金课”的相关研究涉及思政“金课”的本质内涵、建设标准、建设类型、建设路径、建设意义等,对思政“金课”的基础理论研究存在集中化倾向,其他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比如,思政“金课”的建设目标、建设技术、建设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思政“金课”与卓越人才的培养等问题有待专家学者研究探讨。

其次,应进一步深入探讨思政“金课”的已有研究成果。如关于思政“金课”的本质内涵研究,多数停留于“解读”阶段,对其基本概念存在模糊不清的理解,甚至有将思政“金课”误读为“慕课”“精品课”的代名词。所以,应该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不断深化其基本内涵的研究。另外,建设思政“金课”,归根结底看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近几年,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高度重视,学界对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式做了很多有益性探索,这对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无疑具有积极性作用。但应该看到,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相关研究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这应该是要尽量避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不仅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抬头率”,还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点头率”,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主体,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理直气壮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动承担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

最后,理论界的学者、教师对本高校建设思政“金课”的成功经验做过一定总结,对高校

间共建思政“金课”的研究还有待深化。以武汉大学思政“金课”建设为例,在全国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双一流”建设中,武汉大学把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创新作为重中之重,从制度保障、学科引领、内容改革、技术支撑、模式创新等多方面着手,实施“以教学效果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提升计划,建设思政“金课”取得明显的效果,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特别是武汉大学推出的“思政融课”“马上见”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思政融课”以“互联网+跨学科+思政”为导向,开辟了线上线下、课程内外、学科内外融合的新路径,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有趣的“金课”。对于此类思政“金课”建设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如何有效地结合其他高校的具体情况加以推广,需要学界作出解答。

总体来说,目前学术界对思政“金课”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切实认识和准确把握思政“金课”的科学体系,以促使在实践中有效地建设思政“金课”,仍是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①⑱⑳ 刘欣洁.以“蓝墨云”为平台打造高校思政“金课”[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
- ②⑩⑲⑳ 孙燕,李晓峰.高校思政“金课”建设:困境、标准与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19(4).
- ③ 余双好.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改革创新[N].新华日报,2017-07-26.
- ④ 陈珊.高职院校思政“金课”的打造[J].智库时代,2019(30).
- ⑤⑬⑳㉑ 谢首军,陈庆庆.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的标准与类型[J].中国大学教学,2019(2).
- ⑥⑧ 赵义良.提高思想认识努力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J].北京教育(德育),2019(3).
- ⑦ 冯晓青.以文化精髓打造医学院校思政金课[J].河南教育(高教),2019(5).
- ⑨ 沈壮海,肖洋.2016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
- ⑪⑳ 李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革命”与协作学习[J].思想教育研究,2019(2).
- ⑫ 项久雨.品读“00后”大学生[J].人民论坛,2019(9).
- ⑬⑭ 王石.用高职“思政金课”铸魂育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7).
- ⑭ 吴岩.建设中国“金课”[J].中国大学教学,2018(12).
- ⑮ 冯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要素探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9(8).
- ⑰ 陆国栋.治理“水课”打造“金课”[J].中国大学教学,2018(9).
- ⑲⑵ 夏永林,徐菁辉.基于多视角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内涵研究[J].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9(3).

- ⑳ 陈光磊.论“金课”的层面与维度[J].临沂大学学报,2019(3).
- ㉑ 崔佳,宋耀武.“金课”的教学设计原则探究[J].中国高等教育,2019(5).
- ㉒ 马浚锋,罗志敏.什么是大学“金课”:学生如是说[J].江苏高教,2019(5).
- ㉓ 王威峰.思政“金课”筑牢大学生担当精神的价值意蕴及路径[J].高校辅导员学刊,2020(3).
- ㉔ 赵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的建设标准与路径[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 ㉕ 王易.努力打造“高精尖”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金课”[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5).
- ㉖ 李明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8(4).
- ㉗ 马知辰.打造思政“金课”的路径探究——以民办高校《概论》课程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9(4).
- ㉘ 陈庆庆,李祖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10).
- ㉙ 严萍昌.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金课”建设的“四底”保障析论[J].学术论坛,2020(3).
- ㉚ 杨海涛.全力打造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政“金课”[N].人民公安报,2019-05-12.
- ㉛ 张立杰,冯洁玉.用活网络热点素材打造思政“金课”[J].人民论坛,2019(22).
- ㉜ 林静.疫情防控期“停课不停学”打造线上“思政金课”路径探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0(4).
- ㉝ 林静.立德树人视阈下工匠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路径探析[J].教育现代化,2019(33).
- ㉞ 晋利珍.“三位一体”融合式教学打造新时代思政“金课”[N].天津教育报,2019-04-12.
- ㉟ 赵爱琴,陈伟平.以“八个相统一”为遵循打造思政课“金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6).
- ㊱ 黄东,朱林.聚焦德法之思探索辩论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金课”建设的思辨之维[J].北京教育(德育),2019(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机理研究

邵龙宝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融入教材、融入课堂和学生血脉是立德树人的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打底色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明确融入的目标和意义、探明融入的机理和价值引领的内蕴。即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原则；搞清融入的切入点：一是在大学生人格培育七层次框架结构中融入；二是将“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私德转化为公德；三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和心理的“五理”中。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价值引领中引导学生理解知识、智慧与人品的辩证关系；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融入机理与原则；思路途经

【基金项目】 2017年上海市重点教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儒学精髓融入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5bks09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邵龙宝，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1209），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92）。

充分尊重传统文化,自觉尊崇民族历史,实事求是地整理挖掘,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然成为中华大地意识形态和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融入教材、融入课堂和学生血脉是立德树人的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打底色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融入的目标和意义;融入的机理或切入点;价值引领的理念和内蕴;实际做法;感悟和经验。

一、目标和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一个根本的目标即培养什么人?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顺应新的全球化改革开放大潮,能以自己的一份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有信仰、有科学正确的价值观、有知识、讲诚信、具有独立意志品格、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抗挫折力、有审美情趣、有智慧、善于冲破传统枷锁的束缚、善于开发自己的潜能;面对市场经济社会正在兴起的大量自由职业者的浪潮中得以重生;靠真才实学打拼、不去仰仗背景、学历、资源、人脉;依靠自己的特长,通过满足社会的需要,融入社会从事主动式创造性劳动以谋生;他们不愿意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甘当寄生虫,不相信依赖关系、后门、父母的人际资源打通关节和渠道,而是追求规则、契约、法律、自觉塑造社会主义法权人格,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增长自己的才干,通过讲求信用、完善人格获得信任、获取财富;他们并不凭空确立理想、信仰,而是遵循规则,维护社会秩序,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在此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他们不仅讲求独立的个性和人格,同时注重协作和共赢,善于合作、对他人有兴趣、甘于奉献;他们不仅善于生产和创造,同时懂得消费和享受,知道如何去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努力使自己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创造性人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至少有以下七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确立“四个自信”的坚定信念,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深刻意蕴;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中国元素和文化基因,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落细、落小、落实。其二,有利于确立两个根基:一

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根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党立国的根基;二是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经典是中国人文化生命体的根基。其三,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科学了解和把握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根基与当代价值的辩证关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精神和价值是人类多元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其四,有利于使大学生明了文化自信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他们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什么值得我们自信的精髓,同时懂得文化自信离不开一面镜子即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的参照和借鉴,懂得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就根本谈不上确立文化自信。其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之探索有利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化约在具体的课程教学的实践中,又可将教学实践中获得的心得、体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六,有利于帮助大学生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崇高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信仰。其七,有利于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以当代中国社会和大学生们的成长发展中的问题为导向,努力将三种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化资源有机结合、综合创新,突出教材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精神。

二、机理和原则

“机理”是指事物变化的理由与道理,即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的机理之内蕴包括以下三点: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精髓是什么,缘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中国元素?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当代转化,与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相融合,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使之服务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性质、目标之需要,符合时代潮流、社会需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其三,具体的思路、路径和方法。以下来展开讨论:

(一)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华文化“四个讲清楚”,他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③这些都是最主要的精髓,还涵盖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忠恕之道、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道法自然、中庸之道、经邦济世等价值理念、人文精神、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经创造性转化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大学生人格塑造的文化基因、中国元素和价值资源。

(二)创造性转化即融入的方法论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发展首先要历史地尊重传统文化的原来面貌,其次要明确转化的坐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第三,要以现实的问题即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和旨归。第四,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要有批判地反思,区分精华和糟粕,同时借鉴人类文明的积极因素加以融合创新。第五,应注重对“活着”的传统的调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应以时代精神为坐标,以服务于现实和学生的实际需要为旨归,力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接轨,与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相吻合,为实现大学生成人成才、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服务,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动因。融入不是简单移植,而是在回应解决大学生生存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困惑和问题与挑战。在融入时既不背离传统文化的原本意蕴和思维模式,又符合时代精神、满足大学生的需要,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才会“活”起来,体现其强大的生命活力。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恰恰是在时代变迁的扬弃和损益中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的。在文化的历史嬗变中,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流淌在血脉中,存在于我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中的历史文化被称为“活着的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即融入必须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海纳百川的心胸接受他者文化。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三种资源中处于灵魂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代表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源”

和“脉”，不是“主导”和“主流”。

三、思路与途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的切入点实际上是创造性转化的具体思路和途径：一是在大学生人格培育的七层次框架结构中展开；二是将“仁义礼智信”“五常”融入公共精神、社会公德之中，由私德转化为公德；三是在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和心理的“五理”中融入。

（一）在大学生人格七层次框架结构中融入

大学生人格建构七层次内容涵盖思想政治教育顶层设计的几乎全部意蕴。大学生人格框架的第一个层次——人格的灵魂维度：信仰；第二个层次是基石维度：德性；第三个层次是动力维度：价值观；第四个层次是心理维度：意志品质；第五个层次是境界维度：审美情趣；第六个层次是创造维度：智慧；第七个层次是当代维度：法权人格。

其中信仰体系的构建分三个层次：最高层是终极关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对中国社会最高社会政治理想的向往、期盼和追求；信仰体系的次极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信仰体系的底层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人格框架的第二个层次——人格的基石维度：德性。着重强调人之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特征。在实践操作上我们将其细化为“关键品格”（后面会论及）。人格框架的第三个层次——人格的动力维度：价值观。价值观看不见、摸不着，但指导、指挥着人的日常行动。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先做，对什么喜欢，对什么厌恶，做什么事应该化最大的精力和心血，什么事可以忽略不计，都有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决定。价值观、价值体系和一个人的信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核心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格框架的第四个层次——人格的心理张力维度：意志品质。当今社会，如何为人，如何生存和如何生活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越来越多的诱惑和越来越高的欲望摧毁了人的心理和意志力，大学生的现状是一次失恋或考试失利就有可能走上绝路。人的一生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对幸福的期望，对人生、世事难免的灾祸、坎坷和磨难，需要一种扛得住的心理能量、抗挫折力或意志力。某种程度上，这种心理品格、意志力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和素质。人格框架的第五个层次——人格的境界维度：审美情趣。美，是指能引起人们美感的客观事物的一种共同的本质属性，它包括生活美和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美学是人类关于美的本质、定义、感觉、形态及审美等问题的认识、判断、应用的过程之学问。审美情趣是一个人的审美倾向性，它来自于审美理想，

决定着审美标准。人格框架的第六个层次——人格的创造性魅力维度：智慧。智慧不是智力和智商，智慧是以道德和人文作为内蕴和前提的，是透过现象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一种睿智，是一种经由过去到当下去预测未来的一种觉慧。人格框架的第七个层次——人格的当代转型：法权人格。人格的当代转型即由传统人向现当代法权人格转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关键点。中西方人格的思想理论资源之于当下均属传统资源，这些资源的运用都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民人格即社会主义法权人格之建构。法权人格是指社会成员个体自觉维护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宪法和法律制度，做到知法、守法、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切实做到自己的行为能体现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汗牛充栋的思想资源精髓可以在人格培育中融入。

（二）将仁、义、礼、智、信等私德转化为公德

作为一个人，不可以没有恻隐之心、即“仁”爱之心和对社会的关爱。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不能不讲情义、道义和正义即“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能不遵守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仪式、规范，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品格——礼仪风范、精神状态，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之集合也就是社会风尚，同时又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此即“礼”。智即智慧，不是智力和智商，是以道德和人文作为基础，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能依据过去、现在推测未来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信”乃立人、立家、立国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今天的社会就是人与人的信任、信赖和社会诚信出现危机，这是最大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五常”之德，经现代转化，不仅要成为个体站立起来的德性基石，更要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社会公德；成为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并且可以转变为公共法规。

（三）在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和心理“五理”的辩证关系中融入

我们强调治理、管理、伦理、法理和心理的“五理并重”，主要是为辨明普遍性秩序规范的制度建设与道德人格的内在关联。政治精英的治理与企业家的管理一方面要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受到现代制度、政策和知识、理论的制约。在现实层面上，治理的才干、管理的艺术都有赖于法理、伦理和心理的人格水平。知识精英的教书育人，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也都仰赖人格成长的状况，反之亦然，人格的成长会受到制度建设和环境的制约。尤其在伦理和心理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性修养的资源是值得开掘的民族性的宝库，如为己之学、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忧患意识、成人、成己、立人、立己、养性、养心、养气、养情、养才、

用心、用智、用情、用身、用力以及“天爵、人爵”、民本、“政刑德礼”等理念均可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制度和人格都受制于传统理念,值得探究的是制度和人格怎样推动传统理念与时俱行,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和人心互动的过程。治理与管理所侧重的是法理的普遍性规范体系的制度建设,它处在优先的地位,但同时又不能忽视普遍性的规范体系的有效性基础是个体的德性人格,它与规范体系有着内在的互动性和同构性,比如儒家的“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的做人信仰可以经转化为“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作为自觉自愿地履行公平划分权利义务的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的道德人格之基础,将它作为现代社会对个体道德人格的一种普遍性要求,而且它还有着中国人的母体性、根植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性,最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崇高的美德可以与公共理性、公共精神结合起来,使‘良知’与公共道德规范相融合,成为一种应该优先的公共道德规范,同时又是中国人的底线的做人的人格要求”。^⑥

四、价值引领的内蕴

(一)知识、智慧与人品的辩证关系

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中进行价值引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的一个根本途径。大学生渴求在获得新知中得到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智慧的获得、素养的提升。价值引领应从学习观入手。我们在讲《绪论》第二部分“时代新人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做有理想有本领的时代新人”时以反思一种知识观引入:知识作为结果的幸福是因为获得了自由与尊严,知识作为过程的幸福是因为感受到“痛并快乐着”的心理体验,意在引导学生养成一种在听课、读书、实验室试验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于出现高峰体验的状态,尤其在大数据信息化时代太多的冗余或错误信息需要你学会如何迅速筛选,训练强大的分析能力,直达问题的核心。同时融入孔子的教育思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等,引导学生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知识含量的产品、服务和创造性劳动。这种知识观的确立还仅仅停留在对个人发展有好处上,马克思的知识观是一种为他人的幸福谋福利的知识观,他在23岁时写下的博士论文中令人震惊的发现:“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凝视他人的目光,倾听他人的呼吁,并立志为他人做些什么。”

引导学生懂得“知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智力,智力不如智慧和素养”。智慧不是小聪明,

是大聪明,是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觉解;智慧不仅有助于发现、发明创造,更重要的是他能参悟事物的内在机理,甚至是事物背后的物自体的灵性的东西。使学生明了,学习是为了求“道”即知道、悟道、证道和践道。“道”看似玄妙、高远,实际上每位学生每日每时都能感受到“道”的存在。我们不按照自然规律作息叫悖道而行,终究会得病,不走正道搞歪门邪道终究会败露,认识自然、社会、人生运行的规律是最高的认识境界。“道”是规律、是理想目标、是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是指导我们日常行为的原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是最高的智慧。人的品格是智慧的底蕴,一个缺德的人是邪恶的,根本谈不上智慧。没有知识、才能、智慧即没有本领是不能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的。在第四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三节“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中引导学生讨论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深刻认识唯物质主义、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危害,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而失去人类社会的根本方向,以使知识和能力的获得能滋养大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理解传统的“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深意;不是片面发展个人算计的智巧,而是用刻苦、勤勉、顽强的意志力、坚韧性、靠内在激励而非外在激励、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等非智力因素促进开发人的创造力,以德性主体促进智慧的获得。

(二)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

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社会、民族利益的关系是本课程第一章“人生的青春之问”之核心问题,在运用传统资源上,我们着力于首先如何做好自己,成就“小我”——成为当代君子。我们将当代君子与大学生“关键品格”结合起来。《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过107次,成为仁人君子是每个传统社会的中国人的理想目标。其一,君子是知识主体,对知识渴求到时刻将其作为追逐的目标;君子学习不是为了装饰自己的门面,而是为了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对待物质条件和学问的追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行,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其二,君子是德性主体。君子具有三种品格“三达德”即智仁勇: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力行“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三,君子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境界。其四,君子对待价值的态度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他们不担心自己的地位不崇高,而担心自己的德性不高;不担心自己的薪水不高,而担心自己的知识学问不高。其五,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前者“坦荡荡”,后者“常戚戚”;前者“喻于义”,后者“喻于利”;前者“成人之美”,后者“成人之恶”。实际上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阳明等人谈到君子怎样为人处世,如何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如何对待

名利和得失,如何学习和交友,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均已涉及到“大我”。儒家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厚的关于君子人格的资源,可以用来建构当代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在第二章坚定理想信念中也有关于“小我”与“大我”辩证关系的深化。大学生的信仰体系包含三个层次:如果未能确立“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的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信仰的理念和价值,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理念即共产主义理想是绝然不可能的。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的内蕴是追求“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为人生三不朽。”中国人的信仰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精神王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的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第四章)的现代精神融合起来,是信仰教育的根基。立德是中国文化最为崇尚的信仰和价值,这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宗教胜似宗教。在义利、得失、荣辱、德福、理欲等关系上,引导学生以义取利,在得失荣辱上去除私心,扩展心胸,深信德福终究会走向理想的境地——一致起来。理解“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道理;剖析“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也”的意蕴。虽然德福不一致(主要在经济利益上)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但从长远的观点和从文化和文明的趋势来看,德性差甚至败坏的人归根结底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他们的心灵得不到安宁,无法享受到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快乐和愉悦。

个人主义的“小我”是功利的、封闭的、缺乏精神追求没有信仰的世俗的自我,是追求一己之我的当下满足,虽然他从封建神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强调个人的尊严、独立自主,毕竟只是无所顾忌地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一旦遇到个人与他人、社会、民族、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会导致为外物所惑、迷失自我,只管追逐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伤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要使学生明了“实现自我”绝不是自私自利,不能脱离人的日常生活来高谈自我实现,也并不在于“制造产品、增加财富、事业成功之本身,而在于创造力的拓展、创造精神的开辟……一旦人为名誉而名誉、为权位而权位,便丧失求名誉与权位的原始目的,自我便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求名誉与权位的手段。”^⑦在此基础上,阐发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研讨如何追求科学高尚的人生,反对错误的人生观,成就出彩人生。

(三)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灵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课程的一根红线,道德和法律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二者是一个辨

证关系。大学生对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了解得比较模糊。两者都是规范体系,许多地方是重合的。从本质上看,法律以道德为其内在价值。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法不是良法,没有道德内涵的法规是徒劳的;失去信仰的法律就是僵化的教条。道德规范往往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拥有共同的内在价值:都把入作为最高目标;法律所讲的公开参与、客观、平等、公平等法治程序的形式要件本身是合道德的。因此,可以说道德是人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二者也有区别:其一,产生的时间、条件不同,法律远晚于道德。其二,表现形式不同,法条具体、细密、清晰,而道德比较原则、抽象、模糊。其三,调整范围不同,法律着重对违法行为加以调正,对动机和内心活动比较忽略。其四,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他律的,道德是自律的。其五,内容要求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道德是以义务为本位。其六,法律要求权利义务对等,道德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其七,道德的层次和境界更高,但约束力不足;法律的境界不高但约束力强。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道德与法律浑然为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孔子认为德治要高于法治,他有一段著名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用政令和刑罚治国理政,老百姓为了免于刑罚遵守法规却没有羞耻心,德性未有提升;而用道德来治理,用礼教来整顿,老百姓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孔子还特别强调了在治理中领导干部人格德性的率先垂范作用,同样是在强调德治为主。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荀子的隆礼重法看上去礼法并重,实际上仍然在肯定德的主要地位。在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以法治国的战略思想,提出“以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因为现代法律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社会主义法律中蕴含着公正、正直、普遍、统一,它不仅是一种规范、秩序,还是一种意识、理想和信仰,是一种理念和精神的存在,它存在于思想当中,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法也是一种信仰,使人们能据以指导行为、体验生活、衡量现实、解决矛盾,为实现合理的社会关系及自己合法的需要与利益而全力以赴。法律的广义内涵是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又具有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⑧关键的问题,一方面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在“法主德辅”的框架下如何看待道德的作用?就个体而言,德的状况和素养始终是能不能

守法的根本,法是德的形式,离开德的法是徒具形式、不牢靠的,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道德和信仰在人心中生根,对法的遵循就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丰厚的道德资源,可以建构一种寓道德于法律、德法兼治,具有高度主体性意识的良法善治辩证统一的法治形式。

五、实际做法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是所有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首先是责任到人、集体备课、分工负责。其一,明确每一章节的具体的融入目标;其二,探讨每一章节的融入策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定型后成为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应该在教改实践中做动态的调整。其三,依据融入的意义、目标、切入点和原则挑选融入内容,搜寻经典原文(释义)警言格言,同时包括有价值的历史故事。然后是更加具体地融入讲义,在各章节中先进行文本的融入研究,然后进行教学实验,再总结实验效果,进一步修改完善。

我们采取西方建构主义教学理念,组成学生“学习共同体”,在课前3至5人组成一个专题小组,收集资料、讨论、分工合作、做课件、准备演讲稿等,然后在课堂上登台亮相,由老师和学生评议、对话,进一步深入讲授,并带领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中进行价值引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沁入学生心中,使得学生既学会人格的修养,又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才能的训练。西方教育的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现存的、孤立的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为中介,是认识主体通过新旧经验与人际的互动、社会性协商,由主体间的共同参与和创造建构起来的。学习是意义的生成过程,是一个改变意义,创造新的认知结构的事件。学习的时机只有在参与者想要获得他人观点的社会互动中才会出现。尤其是思想道德、政治和价值教育更需要主体在积极参与教学的过程中,在师生、生生的对话中体悟价值,在实践中逐渐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教学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一个观点或理论真正理解的过程,是主体对之重新发明的过程。在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引导学生理解“天人合一”“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等理念,拓展学生的全球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国际眼光,使他们懂得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成为既有中国灵魂又有世界眼光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理念,也正是在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

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价值观的确立是在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中逐步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成人成才,在他们的社会实践和国际交往中推动文化创新不断绵延。真可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尤其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大丈夫气概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作用,以及与历史上涌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的关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关系。用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人物和故事把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有机结合起来,诠释“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爱国主义的内涵。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一统”理念诠释中华民族精神,深入理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引导学生懂得“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使学生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⑨

六、感悟和经验

(一)尝试建构中国话语、中国精神的教材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的尝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综合创新,以便寻求和建构一种根源于中华5000年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根基上的,具有中国话语、中国精神的大学生道德、法律教育教学的体系和形态。在教材内容体系的建设上、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方法的实践上努力体现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高度统一。

(二)尝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实际上是在尝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关键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关键品格包括:仁爱、自强、厚德、诚信、勤勉、公正、明礼、敬业。关键能力主要指:交流与合作、组织执行任务、独立性责任性、学习和思维、信息技术、团队精神、计划设计与解决问题、艰苦奋斗和创新进取、跨文化交流、自我发展。只有在充分汲取传统的思想养料,致力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思想超越和精神提升,才能真正使大学生入耳、入脑、入心。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的效果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经创造性转化后的价值理念、人文精神和传统美德满足大学生成长发展需要的程度。

(三)尝试价值观培育和信仰体系教育新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充分融入母体

性、根源性、民族性的中国元素和文化基因,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落细、落小、落实。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确立立党立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和中国人文化生命体的根基。引导学生懂得文化自信要建立在“和而不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的基础上。

(四)尝试组成学习共同体

采用西方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组成学习共同体,注重创造性人格的培养。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并具有创造性才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教学方式方法有利于形成“活力课堂”。以学生为主体组织教学,在课前学习共同体就开始进行研讨,并通过制作PPT课件,撰写演讲稿、小论文、辩论稿、心得体会文稿等形式,然后在课堂上登台演讲,由其他学习共同体小组对登台亮相的学生进行评议,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原来的教师满堂灌到现在的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在研究和对话讨论的过程中获得新知,形成道德观和价值观。

本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同学们写下许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小论文,针对一句格言、一段名句或一个价值理念,一个传统美德的故事阐发自己的感慨。同学们普遍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础”课教学后,了解了传统文化的常识,懂得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明白了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的重要性;明白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尤其是懂得“忠恕之道”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内蕴,明白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过时了,而是仍然能感受到它就活在社会生活之中,甚至就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渗透在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自身的成人成才很有裨益。通过几年的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于2017年9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2018年评为上海市精品课。

【参考文献】

- ①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155.
-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47.

- ④ 习近平.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EB/OL].(2013-11-26)[2018-11-19].<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26/c64094-23661987.html>.
-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99.
- ⑥ 邵龙宝.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何以现代践行[J].兰州学刊,2014(1).
- ⑦ 单波.如何表现人生智慧[A]//黄枏森编.思想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38-45.
- ⑧ 戴小明.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N].光明日报,2015-04-02.

关于学习

——在新四军干部晚会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

陈 毅

编者按：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新四军活跃于大江南北，转战于江淮河汉，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坚持敌后抗战，谱写了绚丽的抗日华章。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不断赢得对日斗争的胜利，与新四军注重文化建设，特别是与新四军领导人不断强调开展学习、以智建军有着很大的关系。新四军组建之初，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的副书记，他十分关心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学习生活情况。1939年4月，陈毅从苏南敌后战场回到皖南的后方军部，在新四军干部晚会上作了《关于学习》的报告。陈毅在报告中阐释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等一系列问题，对新四军指战员推进学习活动，提高军政素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毅在报告提出的很多学习方法对我们今天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们干部中缺乏的是学习的精神

这次回后方去，看到军直属队很快的走向正规化，设备周全，生活整齐，工作紧张，——新四军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军，目下有这样成就，是一种新的进步的气象。前次上海参观团到皖南来，曾经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XX日报社记者黄源先生对我们发表他在新四军考察以后，他自己增进不少的知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她的文章中称赞我们的医院，说

已经可以比得上上海的医院了。当然,这些称赞,都使我们愧不敢当。但我们的军队在一年多的建设中由简单到复杂,由散漫到有组织,由低到高,这是的确的事实,从总的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给以这样的估价。不过这不是说,我们军直属队已经完全没有缺点了;(,)他们的缺点还多得很。

这里我简单的指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缺乏学习的精神。在军直属队中,一切都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印象,我们军直属队中的同志们埋头苦干,努力迈进的精神是可敬的。但他们学习的精神怎样呢?学习的空气,在我们军直属队中一点也感觉不到。教导队的学生,把每天的功课都接受,但他们的课外活动怎样,他们会不会去翻参考书,找材料,却是一个问题。我住在图书馆考查,凡到图书馆的人,只看画报,新的画报一来,就挤成一团抢着看。其他的书籍就少人过问。我们出版的杂志上报纸上,除了我们首长应时的报告之外,那(哪)一位同志能够抓住一个题目作深刻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这样的文章就看不到一篇。还有更严重的情形:我们的图书馆是没有军事书的,我们的同志都不喜欢研究军事,参加新四军已一年多,依然是一个老百姓,一点不象(像)军人的样子,实在令人吃惊!无论如何,这样现象不应该继续。在我们团结支队,在各团,在前方就更差了,能够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的看完它,这样的同志很少有,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同志拿着书本在看。这个风气如果不严格的加以改正,对我们的实际工作实在有很大的妨害。我们的知识,技能水准的向上,是我们的工作资本。现在我们的同志,一般的都是依靠着上级的命令,首长的报告、号召和运动来进行工作,否则动不起来。常常我们在斗争中碰到新的问题,我们不能先机的解决,现实环境中经过流血或不流血的一切重大变动,都让他平平过去,我们少有能把它抓住去自动处理,我们已经陷落在可怜的事务主义的泥坑里。这是可悲的现象。现在我们不但要用手,用腿,而且要用脑。我们对新的看不见的问题,能够早发现,用不着等负责人员发警报,我们从下面可以提出问题,提出警报,能这样,一切意外的损害、打击,都不能侵入到我们的部队中来。许多事情已经在书本上记载着了,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了,我们现在不过类似的重复一遍。只要我们多研究,用工作和书本上的理论作对比,就能前进一步。我不是叫每个人都进学校,提倡学校式的研究。我所要求的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工作中拿书本上前人的经验来参考,把书本上的应用到工作中来,从这一点找到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少犯错误,少做冤枉事,少走歪曲路。比如我愈多读书愈发现过去斗争中是如何幼稚,心里常常想到:“假使早读此书我不会那样做,或者做得更好啊!”

二、学习的条件

学习有三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要有师父，有好的师父，才有好的徒弟，所谓强将之下无弱兵，在黑暗中摸索是不行的。二、需要工具，如书籍纸笔，参考材料。三、要有好的环境，可以安心学习。这三个条件不易具备，也有具备了条件而不愿学习的。学习的方向错了，或者所学的不适用，也是徒然。许多大学生书读得很多，可是越多越糊涂，越读越和实际脱离关系。在我们部队中，上面提出的三个条件都具备了。一、有好的教员，军事、政治、哲学，都有好教员，至少达到相当水平的。他们不拿薪水，不是雇佣得来的，是同志的关系，而且正迫切的要求着我们学习，我们的指挥员只要求下面的同志学习，比任何人甚至比他们自己都要迫切些。因为不学习的结果，工作要打折扣；工作不能由他自己一人去做，要分给所有的同志去做，要做得好，所以要求所有的同志都学习。大学教授可以对自己学生不负责，但我们的教授却不能不负责，许多工农出身的同志，在我们的部队中学习了几年，比大学生的造就还要多，其中的秘密正在这里。领导者希望同志学习的热情是无限度的，他愿意从各方面来帮助同志，甚至希望同志能赶得上他自己，他决不留下几分，不完全教给同志，怕回过头来打他个翻天仰。这个优越的条件，只有在我们革命的部队中才有。二、为了同志们的学习，我们公家决不吝嗇必要的帮助，甚至拿出一笔钱买书籍都可以。记得在南昌时参谋处有位同志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关于德法战争的书，但不能买，因为要五元钱的高价。我拿给他五元，对他说：“马上买来吧。只要愿意学习，拿出十元都没有关系”。以前学校里没钱买书，会向同学借书，现在书堆着却不看了。苏东坡说他自己青年时和隔壁的朋友借书来看，一晚把它读完，现在做了大官，书堆着，却又不看了。七八百年前就有同样的情形。外面的人，和我们接触，总是要求我们送给他几本书，我们自己有书，却毫不相干。我们确实辜负了这个好条件。三、我们部队有饭吃，而且发了零用，决不要学生自己拿出钱来。我们所学的又是实际的课题，与斗争联成一片，我们的学习不怕走错路，我们的学习有准确的方向。有的同志参加了长期的斗争，自觉太疲劳了，可以休息了，用不着学习了，有的同志自作聪明，旧的已经看过，新的平淡无奇。油印的不看，看铅印的，《抗敌》（、）《群众》不看，看《解放》。看作者的名字，不看文章的内容。我们部队中书籍多，会议多，师父多，同事多，专家也有些，这是最好的学习环境，可惜我们自己辜负了它。在我们部队住了几年，可以听一千个报告，参加几千次会议，阅读几百种书籍，参加几十百把次大小斗争，真是稍稍留心肯学习的人，一定能进步的，如其不然，只有怪你自己！

三、学什么

学习有多种,学习的兴趣也就各有不同。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共同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学问的种类多,都必须在一个共同点上统一起来。这就是民族革命,抗日救国。我们在一个政治的目的下行动,任何人都必须确定这政治的方向,确定革命的人生观。自然科学、文学、哲学、一切的学问都是好的,只要他对人类没有害,只要他不反动。比如军事,学的是杀人,刺刀要刺中要害,刺的深,一个炸弹最好炸死一百人,这本是坏事。但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杀我们的敌人杀得更多就更好,不会杀,反是坏事。如果一个军事家,其方向是反革命的,与其本领高强,倒不如差一点好,可以少杀几个人,多立一些功德。毛泽东同志说,学习千万要把握到正确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但对着我们的新四军,而且要对着全国全世界,因为我们的行动不但对着新四军自己,而且对着全民族以至全人类的权利负责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志都抓住自己愿意学习的部门,希望所有的同志在学习中创造自己,成为专家,但我们要求所有的专家都在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之下——为全民族全人类的福利而服务。大家应该学习政治,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不走上旁门邪道,这就是我所提出的学习的共同点。

四、依靠自己不断的学习

学习的方向正确了,学习的情绪很高涨了,但有些同志提出一定要进教导队,一定要进抗大。我们不否认学校的作用,但我们决不依靠学校,我们依靠自己不断的学习。而主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实际经验是最能够教育自己的。学军事的离不了打仗,打得仗自然成为军事家;学政治的离不了做革命的实际工作,革命工作做得多,自然可能使自己成为政治家。另一面我遇见一个青年,要求进学校,我对他说,进教导队好了。他说,不,要进抗大!我不客气的说,有五百元的路费是好的,否则转回去吧!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好高骛远,目的不在学习,而在文凭、资格,根本和学习的原则离开了。抗大是好的,教导队也不错,但如果不依靠自己,三个月,六个月的功课会叫你得到什么?

五、学习的方法

(一)要少要精要约,不要样样都来,结果什么都不好。看书要把它消化,要咬得烂,不要

打游击,这一本未读完又读那一本。自己愿意学习那一门,就必须对那一门作基本的研究,如学政治,起码要把马克思列宁的主要著作三民主义等书,在一个时间内作详细的研究。如学军事,起码对所谓典、范、令、战史、战略学、战术学等加以研究,真做到能了解。学习要有傻子的精神,世界上成功的科学家,都具备着傻子的精神,至少经过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的艰苦研究。我们千万不要自作聪明,人家不懂,自己先懂。诸葛亮观书但观大意,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恐怕指他学问已有根底,着重博览厚积常识而言,我敢断定他们还有另一面的细心研究的历史被人淹没了,我们不要被历史家欺瞒了!

(二)光读不行。要用思想,读了书,听了报告,脑子里想!这段说的什么?内容在那(哪)里?都必须确实的把握到。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这是一句好格言。每一本著作的完成都是作者经过了一番苦心才把它写成的。读者必须依据作者的思路在这著作里走一遍,达到它的高点,才能了解,否则简单地一过眼就把它丢开,等于不读。我们读了许多革命家的传记,知道他们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忙,总要争取几个钟头来读书,有时要忙里偷闲的散散步,或者发了呆,在思考许多的问题。英国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也在用脑子,一个不留神给汽车碰死了。他这种死是可惜的,但他这种用脑子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现在就要提倡这一点,读书要用脑子,执行命令要用脑子,工作要用脑子。革命家就要依靠这努力。现在我们同志只有体力没有脑力,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三)要多问。在英、法、俄,许多国家的文字,学习字义大都是靠努力,是把一件事重复的做,只有中国把“学”“问”连在一起,倒是中国式的优良的作风,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学”是照样的做,做不通的时候提出疑问,可以得到一个纠正,所以“问”是最讨便宜的,但是,有的同志认为问人家要伤面子丢丑,不知道问的益处,某些问题曾令人家栽过斛斗的,现在我问一问人家,就可以不栽斛斗。对高明的人发问,他回答的很高深,不一定听得懂,但也有益处,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向同等的人发问,容易了解,可以得到许多帮助,甚至争论而加深了解,向比自己差的人发问,听听他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到一个参照。就是最幼稚的意见,也有帮助。孔子说“不耻下问”,同样是中国做学问最好的经验,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白里安,曾经用他的手腕为法国建立了许多功绩,几年前他死了,现在看到希特勒这样猖狂,人们都要为法国惋惜,说如果有白里安在,德国一定爬不起来。有人问白里安:“你的外交是从那里学来的呢?”白里安回答:“我是向农民学的,你如果能够和八十个农民办交涉,什么外交都会了。”农民对于许多问题都是罗(啰)嗦,藕断丝连,缠夹不清,如果能

弄得清楚抓住他的中心,把他们安插妥贴,实在是天大的本领。列宁提出向群众学习也正是白里安向农民学习,中国孔夫子不耻下问的意思。现在许多同志是把“学”与“问”分开了,很少人对于一个问题提出疑问。我们首长作一个报告,发出一个号召,同志们无灵魂的依照着做,提出疑问的人很少有。我们要提倡多学,同时我们要提倡多问。

(四)精是重要的,但也不能不博。要使常识丰富,各种书都要看,广于浏览,留心一切的问题,学问的各部门都有他们的连(联)系性。我们的同志只懂得一部份(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别的都不懂,听到南昌陷落的消息,有一个同志问:“南昌在那里?在西班牙吗?”当天花盛行的时候,叫同志们种牛痘,死也不种,好像叫他种牛痘是得罪了他。虽然我们要有专长,但也要得样样懂些,不然也不会有专长。譬如学军事,如果不懂数理化,不懂得天文地理就不行。我们新四军是一个有特长的部队,通过封锁线,打据点,突围,一二人在敌后独立活动,在距离敌人二三里的地方宿营,都是特长,因为这把戏已玩了十多年。但一般的水平却很差,新兵器知识,新战术知识等等,有的根本就搅不清楚。前月打败了敌人,得了两个掷弹筒,却称它为小钢炮,一点常识也没有。我们谈到恩格斯关于批判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文章,我们便知道恩格斯是很留心当时文坛状况,对文学是很有研究。比如他说:“我在老巴尔扎克著作中得到的政治经济知识比在同时代历史的著作中所得的,还要丰富”。(我记得大意,恕无法引原文)这句话使我吃惊,又比如我们常常读斯大林的东西,每每发现他举出许多文学名著中的故事作例子,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仅有高深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博学多闻的精神,我们同志中那种抱残守缺的精神,应该立即丢掉。最好办法我们研究一门具备专长后,再留心一般常识的增加,我们如主张样样都懂得精深,这是痴心妄想!

(五)要动手。读书,听报告,发现新问题,都得动手记下来,写摘要,写笔记,写精粹的句子,脑子里死记是记不了的。真正读书的人,要象(像)秀才念八股一样,有上批,有下批,有旁批,有浓圈密点,把书本子弄得越糟越好,如看《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都非这样看不可。现在有些同志把书籍保存得很好,因为太珍惜了它,把它藏在箱子里,两年后就变成老古董。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他看报的秘诀是:“每字看,每事看”。常常被人忽略的地方得到解决问题的宝贵材料,这是重要的经验啊!

(六)要耐心复习。《论语》上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这一段话我记不清全文。我想用复习来解释它或用论语“温故知新”来解释它则更好。记得明朝王阳明相信格物致知的道理,知道研究东西,可以增加知识。他于是研究竹,为什么竹有节而中空,为什么竹要

发青,看竹看了三天,看出病来,结果是一无所获,这虽是王阳明的方法不好,但如果不因为病而中辍,再研究下去,也许可能有进境。我的经验凡遇想不通的应再想,再不懂的就记下来,到处问人,求得解释,还是不懂,就暂时丢开,因为再苦思,就要损害脑子,只好暂时放下,又去看别的书,经过相当时候偶尔回到以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忽然会遇着“一旦豁然贯通焉”的快乐。这是实情,因为知识是由积累得来,积累到每一程度,才能了解到更高深的问题,躐等是没有好处。我平生住学校,xx是吃躐等的亏,小学未毕业就进中学,中学住了两年,跑进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又住不终局,变成一个学校贩子。生平认为最苦之事,记得在三年游击战争时代。在山中仅有几本书大家反复阅读,项英同志最有耐心,一本书可以读上十几遍,我向他问:“你这本书读熟了,连纸都读得象(像)猪油渣那样熟透了!”他回答特别好,他说:“现在是仅有读书的时机,如果局面开展,我们走入实际工作,要有余时专门读书是不会的了。”这话是真动人的,果然到现在忙于实际工作,要专门研究就困难了!

(七)忙里偷闲来学习,一个实际工作人员的学习法就是忙里偷闲,抽功夫来学习。法国有一故事,一个人在吃中饭之前十分钟在饭厅外面等饭吃,他就利用这点时间,在那里留下一个簿子,一枝(支)笔,一瓶墨水,天天趁这十分钟去写几行,久而久之,成就一本有名的书。这个故事最好,我们最忙也可学他这样做。我现在也开始在临睡前看几页书,写几页日记,弄成习惯,坚持下去,一定有益。假如我在过去十年战争中能写下一本日记,现在拿出来看,恐怕可成为重要史料,然而过去我没有毅力,不会趁空作(做)事,于今想来,只是徒然!

(八)教人家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所谓教学相长,教人也是学。比如我们学习排的进攻,已经学会了,再去当一当排长,用所学的去教一排人,就可以更达到彻底的理解。遇到学生发问,不要急躁,不要生厌,不要乱答,回答不了,可以向学生预先声明,可以和学生进行讨论。

(九)保持中国的艰苦学习的优良传统,我们在上面指出我们中国把学问相印证,把博约相联系,又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又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都是中国关于做学问方面,最特色的作风,同时我还要指出,除这些道理而外,中国还有艰苦的实际学习精神,比如在《三字经》后半截就举了许多,例如“头悬梁”(、)“锥刺股”(、)“如负薪”(、)“如挂角”,如凿壁偷光、如映雪读书,我们想到古圣先贤这种学习的艰苦作风,真令我们青年人愧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民族的优良作风,世世代代享受无穷。

(十)青年更要学习,列宁对青年的指示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又说“青年的任务乃是学习社会主义”。我们现在青年的任务,应该一面参加抗战,一面学习抗战建国。青年人不可

能置身于抗战之外,应该在抗战中学习,我想没有人能反对这个道理。我们部队中青年最多,就在干部中也是三十岁以下的占多数,这正是好学习,做学问的时候。青年不学习,老大徒伤悲。我常向同志提及这两句话,我随时也用来警醒自己,我害怕自己落伍,时代进步最快,每天的新事物新问题多得很,常常使我自己耽(担)忧。我又有一个经验,我几个月不看书,几天不看报,别人谈话的内容,我就有些地方茫然,甚至不能完全懂得,要自己进步,只有学习自修一条路!我们不要想赶过一切,但我们至少要跟得上伴,否则由跑前而落伍,而落到最后,这是使人红脸的事!我们都是青年人,常有浅尝辄止和自作聪明的毛病。闻一知十,提头便知尾,这是形容词,不一定是真话。我也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天才,把天才解释成为所谓“长期的努力”是比较合理的,甚至我们可以承认天才家的禀赋比较我们不同,但绝没有不经过学习,生而为圣为贤的大天才。

以上所说,并不高深,平淡无奇,更丝毫没有宣传赤化的嫌疑,我所说的是自己一点浅薄的经验,我自己于革命的基本理论毫无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却碰过不少的钉子,栽过不少的斛斗,我自己常说打胜仗,十回九回没有我,打败仗就常常有我在。打败仗也是一种必具的经验,但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经验,不去学习综合一切经验的革命理论,这仅能表示自己的愚蠢,另一面有人企图自己从实际工作去作(做)天才创造,这种倾向也不好,不知道任何创造工作,是从前人的成就上去加以发挥开辟,绝没有凭空创造的事情,如果有,那只有神话中的记载。我自己深深感觉自己学识太不够,所以常常考虑学习问题。今天在欢迎教导队毕业同志的晚会上说出自己的感想,是想给同志们一个帮助,如果你们听了这些话,约略打动你们学习的心情,开始去研究讨论学习,那末(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东平记)

(原载《抗敌》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一卷第四号)

本文根据《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刊印,有些字词、标点与现行的汉字规范和标点符号用法相异,已在文中用括号标注。